

I 0 0
2
3

青年自学丛书

写作漫谈

复旦大学 中文系《写作漫谈》编写组
上海师大



上海人民出版社

A407876

毛主席语录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

《青年自学丛书》编辑说明

毛主席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满怀革命豪情，奔赴祖国的农村和边疆。他们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积极投入批林批孔，朝气蓬勃地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坚定地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了贡献，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不断涌现，一代革命青年正在茁壮成长。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按照毛主席关于“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的教导，为了适应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自学的需要，特编辑、出版这套《青年自学丛书》。丛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内容包括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自然科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和实用农业技术知识等。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学习起积极作用，有助于他们进一步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化科学水平，在又红又专的道路上阔步前进，更好地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

我们对大力支持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的有关单位和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欢迎广大读者对这套丛书提出意见和批评，以便改进。

上海人民出版社

目 录

为革命拿起战斗的笔·····	(1)
根深才能叶茂·····	(6)
主题是文章的灵魂·····	(12)
一以当十·····	(18)
量体裁衣·····	(23)
标题的艺术·····	(30)
在繁杂中求条理·····	(35)
在条理中见周密·····	(43)
波澜起伏 引人入胜·····	(49)
迈好第一步·····	(57)
最后的冲刺·····	(64)
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	(70)
语言要明确、简洁、生动·····	(76)
抓住本质 击中要害 ——大批判文章的写作·····	(88)

短小精悍 一事一议	
——小评论的写作	(96)
迅速及时 报道先进	
——小通讯的写作	(102)
总结经验 宣传典型	
——调查报告的写作	(108)
诗歌的构思和语言	(116)
散文的寓意和联想	(127)
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132)
戏剧中的矛盾冲突	(146)
谈文风	(155)

为革命拿起战斗的笔

当我们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毛主席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毛主席的教导，为我们写作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我们要为革命拿起战斗的笔，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所指引的方向，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大造革命舆论，推动历史的前进。

写文章，搞创作，历来都是为一定的阶级和政治路线服务的。历史上的一切剥削阶级都用他们的笔作舆论工具，为他们的阶级利益和政治路线服务。孔老二扯起了“克己复礼”的黑旗，炮制了一套从属于这个反动纲领的文艺主张，宣扬文艺是和“复礼”相呼应的，并亲自修订《春秋》，整理《雅》《颂》，为奴隶主阶级唱赞歌，为维护和复辟奴隶制度大造反革命舆论。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也非常重视写作这个阵地，在《“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中就有一条叫做“掌握舆论工具，开展政治攻势”。他为了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疯狂地大造反革命舆论。他把孔孟之道作为“座右铭”，居心险恶地鼓吹一批写政变的旧戏；他通过写回忆录，利用音乐、电影等艺术形式，歪曲历史，为自己树碑立传；他还炮

制反动诗词,猖狂攻击毛主席,为自己翻案。这些都是为他那条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

与一切剥削阶级相反,我们写作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也就是说,是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以京剧革命为开端、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把千百年来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再颠倒了过来,工农兵成了文艺舞台的主人。在革命样板戏的推动下,一大批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相继出现,使我国的文艺园地呈现出一派百花盛开、欣欣向荣的景象。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战胜了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使我们的文艺真正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工具。

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鲁迅,他用笔作武器战斗了一生。鲁迅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派以及他们的走狗——各种各样的反动文人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尤其在后期,他以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姿态,一方面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和混进革命队伍里的王明、刘少奇、周扬一伙叛徒、特务进行顽强的战斗,坚持和捍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从事写作,就要象鲁迅那样有明确的革命目的,而且始终不渝地为这崇高的目的而战斗。

今天,革命形势为革命舆论工作提出了新的战斗任务。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以及最近发出的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都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战略措

施。在这个斗争中，要把孔孟之道和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要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进一步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任务。我们为工农兵写作，就是要为完成这个任务而斗争。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批判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一方面要为无产阶级的新生事物大喊大叫。用我们的笔去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用我们的笔去赞扬工农兵的精神面貌，去反映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战斗任务，也是我们青年一代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

要为工农兵而写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写作，就必须认真看书学习，参加革命实践，努力改造世界观。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毛主席的这个教导，给我们指出了改造世界观的根本途径，也是对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有力批判。林彪曾鼓吹什么“搞创作的人要做到‘四边’，就是要边看、边想、边写、边改”，而根本不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写作的指导，根本不提作者要深入生活，参加三大革命斗争的实践，根本不提作者世界观的改造。说穿了，他的这套“四边”的黑货就是要把我们革命的舆论队伍引向邪路，变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吹鼓手，与无产阶级争夺舆论阵地。我们青年同志必须深入批判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社会，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和工农兵相结合，逐渐树立无产阶级

的世界观。

树立了为革命而写作的正确指导思想,就能有信心,有毅力,勇于实践,知难而进。

有些青年同志觉得写作很神秘,是“秀才”们干的;有的同志认为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写稿;也有的同志在写作中碰了几个钉子,就泄气了。总之是怕苦怕难。初学写作的同志,会遇到些困难,受到些挫折,这并不奇怪;只要认真对待,没有学不好的。斯大林曾经说过:“工人们不要说写作是他们所‘不习惯的’工作:工人作家不是现成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只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慢慢锻炼出来的。所需要的只是更勇敢地动手去干:跌一两次交,以后就学会写作了……”许多工农兵作者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如全国著名的女民歌手殷光兰,在旧社会是个童养媳,没念过书。解放后,她怀着对党和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写了许多优秀的民歌,四次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她在写作过程中遇到过不少困难:工作多,生产忙,家务重,文化低。但她从来没有向困难低过头。如时间少,她就利用上工路上、田头休息和晚上做完家务以后的时间来构思民歌,有时病在床上,也念念不忘为革命写作。她说:“尽管我遇到这些困难,但我想到党和毛主席对我的培养,想到宣传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想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我就要坚持战斗。”学习写作,就要象殷光兰那样,有一股顽强的战斗精神。

要坚持为革命而写作,一辈子当好无产阶级革命舆论队伍的战士,就要时刻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名利思想的侵蚀。要时刻牢记:我们手中的这枝笔是党和毛主席给的,是工农兵给的。一定要用这枝笔为工农兵服务,绝不能把它作为

获得名利的工具。我们不论是为报社、出版社写稿，还是为基层的墙报、黑板报、广播台写稿，都要想到这是阶级的委托，时代的使命。我们要做好本职工作，坚持业余写作，做工农兵的忠实代言人。

毛主席说：“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今天，我们虽然已经取得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但是要巩固这个胜利，并在全世界消灭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彻底清除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还需要作长期的艰巨的斗争。“小小笔杆重千斤，字字句句为革命。”让我们自觉地拿起战斗的笔，去扫除一切害人虫，去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实现壮丽的共产主义理想，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根深才能叶茂

树有根，水有源。工农兵火热的斗争生活是文章的土壤，是写作的源泉。我们只有投身到这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中去，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生活的土壤之中，才能根深叶茂，写出好的作品来，这是一条已被无数工农兵作者的实践所证明了的真理。

浩然同志在《为谁而创作》^①一文中谈到他创作《艳阳天》的经验时说：

我跟《艳阳天》主人公的原型有十八年的“交情”。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写他。我是农民出身，又从事农村工作，初到那里，他们正进行艰巨的社会主义改造，于是，我便参加了他们的斗争，跟他一起制定第一个社章，跟他一起同有落后思想的人谈心，等等。在这些活动中，我逐渐地了解他、学习他。同时他也在共同的生活和斗争中了解了我，把我当成自己的阶级兄弟和战友。他有什么话都对我说，包括处理家庭问题，也要征求我的意见。我有了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他也热情地批评和帮助我。……因此，我塑造肖长春这个形象，不仅比较了解，而且是带着叙述最亲的人那种抑制不住的强烈感情。写

^① 载《中国建设》中文版一九七二年第五期。

到主人公为胜利高兴的时候，我面对稿纸放怀大笑，
写到他那唯一的儿子被敌人杀害的时候，我的泪水
湿透了稿纸……

浩然同志的经验告诉我们，他所以能写出《艳阳天》这部
长篇小说，塑造出象肖长春这样有血有肉的无产阶级英雄典
型，是由于他长期地扎根农村，不是几天、几个月，而是十八年；
更是由于他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了一片。
所以在写作时，不但对主人公比较熟悉，而且倾注进了强烈
的无产阶级感情。

毛主席早就说过：“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
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
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
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
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
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这个指示虽
然说的是文艺创作的问题，但是对写调查报告、通讯报道等这
类文体也是完全适用的。就说写通讯报道吧，如果你对报道
的对象不调查，不研究，不到群众中去，关在屋子里怎样能写
出好的东西来呢？如果你到下面去了，只看材料，只听汇报，
也是不行的。一定要亲自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观察、体验、
研究、分析。报道王国福同志光辉事迹的长篇通讯《拉革命车
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①就是报道组的同志在生活第一
线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后写出来的。他们在一篇谈写
作体会的文章中是这样记述一次座谈会的情况的：

开始没人发言，过了一会儿，听到外面下雨；两

^① 载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日《人民日报》。

个老贫农忽然痛哭起来。一个说：“提起老队长来，我这心里搅得慌。过去每逢下雨，老队长就不睡觉了，扔下自己的老婆孩子不管，东家走，西家串，看谁家的房子漏雨没有……”老贫农哭得说不下去了，一个妇女接着说：“直到如今，我总思摸着老队长没有死，他还活着。昨晚上做梦我还跟俺当家的说，你听，咱们老队长敲钟了，该上工啦！……”又一个老贫农说：“老队长一心为公，心高得没法量啊！全村人都住上了新房，可你看他住的‘长工屋’，还不如俺家那柴禾棚！……”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谈起来，越谈越热烈。全组十二个人，十个人发言的时候泣不成声。

通过这次调查会，他们不但看到了贫下中农对王国福同志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对已经掌握的材料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而且还获得了许多新的材料和线索。会后他们又根据新的线索，分头进行了个别采访，还派人到山东省汶上县专门调查了王国福同志的家庭历史。这篇通讯所以写得这样感人，是和报道组的深入生活、调查研究分不开的。

可见，深入生活，调查研究，对写文章是多么重要。但是，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却鼓吹什么写作“需要特殊的天才”，要有“如同电石火花，稍纵即逝”的“灵感”，作者不必深入三大革命斗争实践，只要与“社会上各种人”“聊天”就够了。他们反对毛主席关于“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的教导，反对写作中的唯物论的反映论，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文章到底是从现实生活中来的呢，还是几个“特殊的天才”关在屋子里想出来的，这是在对待写作问题上的两条路线

的斗争。他们在写作中拚命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是为了引诱作者脱离实际，闭门造车，写反革命文章，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服务。我们必须彻底批判这种谬论，揭穿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坚持深入生活，用唯物论的反映论去指导写作。

有些青年同志也许会说，我们生活在三大革命斗争的第一线，每天和群众生活在一起，不存在什么深入生活的问题。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生活在工农兵群众之中，只是为写作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但绝不能以此为满足。因为和群众生活在一起，不一定就了解群众，生活于三大革命之中，也不一定就理解和熟悉工农兵的斗争生活。这里还有一个怎样认识生活的问题。鲁迅说过：“即使‘熟悉’，都未必便是‘正确’”。有些事情在生活中是大量的，但不见得一定有典型意义，有些事情虽然看起来很普通，但却能反映生活的本质。不但要熟悉生活，而且还要认识生活，这就不是每个生活在工农兵群众之中的人都能做到的，不是还有“身在宝山不识宝”的现象吗？

要“身在宝山能识宝”，就必须“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努力了解各种人，熟悉各种人，了解各种事情，熟悉各种事情，培养自己对生活的敏感。我们还必须在生活中和工农兵打成一片，拜工农兵为师，努力改造世界观，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方面来，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去观察生活。《拣煤渣》创作组的同志在一个钢管厂深入生活时，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有个同志被分配在后勤组拣煤渣。开始他认为干这活很容易，拣拣煤渣，谁还不会。由于对节约不重视，把能烧的“二煤”也当作煤渣丢掉了。老工人发现这个问题，便主动和他聊起拣煤渣的意义，还几次三

番地把着手教他识别没烧透的煤渣：有的煤渣一面烧枯了，把它翻过来，另一面还没有烧透；有的煤渣从外表看全部烧透了，掂掂分量便可以知道里面还没有烧透。这位老工人还说：旧社会我也拣过煤渣，那是剥削制度所造成的，今天我是为了革命事业拣煤渣。创作组的同志正是从丢煤渣这样的小事中，接受了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同时也获得了创作的源泉。创作组的同志在谈到深入生活的问题时深有体会地说：“只有当你投身进去，洗涤自己身上的污泥浊水，才能尝到泉水的甘美。”这个体会确实是很深刻的。

如果我们缺乏工农兵的思想感情，不是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去观察生活，那么真正的宝藏也许就在我们身边而不能被发现。这里，采写《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共产主义战士——记共产党员杨水才同志的光辉事迹》一文的报道组的体会对我们也是有教益的。报道组开始写了个初稿，自以为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可是，念给贫下中农一听，却没有通过。贫下中农说：“你们是够辛苦了，可俺听着不象杨水才。水才常说‘小车不倒只管推，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干革命！’他活着为俺贫下中农操尽了心，掏尽了力，一直到他临死前的一秒钟，还在想着革命，想着贫下中农，这个意思你们没写上。”“小车不倒只管推，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干革命”这句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话，报道组在采访过程中多次地听到过，那么为什么报道组却掂不出这句话的分量呢？他们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我们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没有彻底改造好，和贫下中农的观点不同，立场不同，感情不同，对问题的认识也就必然不同。因此，也就不可能理解杨水才同志‘小车不倒只管推’这句话的深刻意义。”这说明世界观对于

认识生活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广大革命的知识青年战斗在三大革命斗争的第一线，有着极其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为写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我们只要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那么，在这个土壤上就一定能够结出丰硕的果实来。

主题是文章的灵魂

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诗人欧仁·鲍狄埃写了一首无产阶级的战歌——《国际歌》，它的主题是：召唤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英勇战斗。一个世纪以来，《国际歌》气势磅礴、雄伟庄严的歌声，把无产阶级的革命真理传遍五洲四海，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在今天这首歌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毛主席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号召我们高唱《国际歌》，这对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鼓舞革命斗志，更好地完成我们在国内国际各方面的任务，具有重大意义。这首歌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威力呢？主要是因为它宣传了革命的真理，有一个革命的主题。

可见我们为革命作宣传、造舆论，就首先要使所写的作品有一个革命的主题。主题就好象是文章的灵魂，它直接决定一篇文章的质量和战斗作用。

那么，什么是文章的主题呢？简单地说，主题就是作者通过文章所要宣传的最基本的观点，也就是文章的中心思想。我们无论写一个人、记一件事或论述一个问题，都必须明确地表达作者的观点。如果只罗列材料而不出观点，就不能发挥文章应有的宣传教育作用。所以，我们在写文章之前，就一定先要有一个明确的主题。然后，才可以根据主题的需要来选择

和组织材料,决定表现方法。主题就好象一根红线,把材料串连起来,构成一篇有说服力的文章。明确主题是写文章最起码的要求。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认识不足,他们写一篇文章,却不明确通过它要告诉人们一个什么基本观点,因此往往是想到那里,写到那里,结果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求我们写文章要预先研究,预先准备,把一篇文章的主题想清楚了,然后才动笔去写。

一篇文章不但需要有一个明确的主题,而且这个主题还应该是深刻的,有教育意义的,所以主题还要进行选择 and 提炼。在选择和提炼主题时要特别注意如下两点:

首先,要从当前斗争需要出发,有针对性地确定主题。我们写文章必须密切配合党在各个时期的宣传中心,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象列宁所提倡的那样,要选政治上重要的,为大众所注意的,涉及最迫切问题的主题^①来写。

比如我们写通讯报道、调查报告、大批判、小评论,就要考虑报道什么、批判什么、评论什么,都要根据党的基本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工作任务来确定文章的主题。只有这样,文章才有战斗性和针对性,才能发挥它的作用和力量。这个问题比较容易理解,但要做起来却也并不简单。如怎样抓住方向性的问题,怎样发现运动中出现的新问题,老典型怎样报道出它的新特点,老问题怎样评出新水平,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反复思考的。有时文章写出来了,但感到一般化,主题不新,这就是因为我们对形势的特点缺乏了解,对党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理解不深,对群众中出现的新问题调查不够。所以要使文章的主题更好地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必须努

^①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论列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力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分析形势的特点，加强调查研究。

写艺术作品也是一样。要使文艺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就必须提炼具有时代特点的重大主题，迅速反映现实的斗争生活，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姚克明同志在创作《区委书记》^①的过程中，为了使主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紧密配合形势，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曾进行了多次提炼。开始是想描写某党政机关中的一位领导干部甘当人民勤务员的故事，歌颂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但是这个主题觉得“不新”，把它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写，甚至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写，都未尝不可。第二次提炼的主题是：歌颂以群众代表身份担任了领导工作的新干部与群众的鱼水关系，歌颂文化大革命以后国家机关的改革。这个主题比上一个“新”了，但只停留在一般的歌颂上，没有能够配合形势，针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值得注意的思想苗子，尖锐地提出问题。也就是说，没有写出“为大众所注意的，涉及最迫切问题的主题”。后来，作者从路线斗争的高度对原有的生活素材进行了再分析、再认识、再提炼，最后确定了作品的主题。这个作品通过在对待人民来信问题上的两种思想的冲突，塑造了一个具有高度路线斗争觉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新干部的典型形象。这个形象告诉我们：担任了领导工作的群众代表，永远不要忘记，是谁培养、教育了我们，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群众代表更要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坚持群众路线，使我们的党组织和红色政权同人民群众

^① 见《短篇小说创作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永远血肉相连。这个主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同时又触及了现实生活中有关路线斗争的重大问题，具有一定的深刻性，能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

其次，要对题材进行深入的开掘，提炼出能反映事物本质的主题。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写文章不能只停留在事物的表面上，而要对所写的事物作深入的分析研究，透过现象，抓住本质，这样文章的主题就深刻，就有普遍意义。

例如，一个先进人物，总有各方面的特点，当你要把他作为一个先进典型写成一篇通讯时，就得对这个典型的各方面的特点进行分析研究，弄清楚什么是他的最本质的特点，从而确定文章的主题。比如张铁生同志，有许多动人事迹：他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坚决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决心在农村中干一辈子革命；他在农村中大搞科学实验，在从未种过水稻的地区试种水稻取得成功；他与为非作歹的坏人作斗争，终于把一个坏人揪了出来；他提倡新风尚，反对旧传统；他为革命报考大学，并在物理化学考卷的背后写了一封“发人深思”的信，等等。但是张铁生最本质的特点又是什么呢？应该从什么角度去报导这个典型，提炼文章的主题呢？《敢于斗争的年青人》^①一文的作者分析了这个典型，认识到张铁生的许多事迹，集中到一点，就是他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敢于同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敢于反潮流的精神。敢于斗争，敢于反潮流，这是张铁生最可贵的精神，是这一典型最本

^① 载一九七三年九月十日《人民日报》。

质的特点。抓住了这个特点，也就提炼出了文章的主题。《敢于斗争的年青人》这篇通讯用这个主题去报道张铁生这个典型，就比较正确、深刻。

文艺作品是通过典型化的手法塑造人物形象来反映生活的，所以要使文艺作品有深刻的主题，就要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对所写的题材进行深入的开掘，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努力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反映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在这方面，电影《闪闪的红星》的创作实践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电影《闪闪的红星》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但是，从小说改编为电影，不单是艺术形式上的改变，而是在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一次认真的再创作，特别是在主题的提炼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小说着重描写了潘冬子在闪闪的星星的照耀下，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不断成长的过程。但由于没有抓住路线斗争这个纲，所以主题的深度显得不够。在改编过程中，创作组对原著提供的题材重新进行了分析研究，从路线斗争的高度对题材加以深入的开掘和提炼，从而使主题思想和英雄人物形象都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小说中，潘冬子活动的范围很广，时间也很长。电影则集中写潘冬子在老革命根据地柳溪乡一带斗争和成长的过程，又把这过程放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尖锐复杂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背景下来写。开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后来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使革命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红色政权“得而复失”。遵义会议后，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根据地党组织遵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领导群众与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使红色政权“失而复得”。潘

34

四机

冬子的英雄性格,就是在这样的典型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从而使人们通过冬子的成长过程,认识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坚持还是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关系到中国革命成败的根本问题。我们必须坚定地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勇敢地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使革命先辈用鲜血夺来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这个主题就比小说原著深刻多了。同时因为从路线斗争的高度来看问题,所以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也注意突出党的正确路线对冬子成长的决定作用;克服了原小说中冬子形象身上偏重于个人自发斗争的倾向,而突出了他在正确路线教育下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成功地塑造了“顺着革命的路子走,按着革命的需要长”的无产阶级少年英雄的典型。这样,冬子的形象就比原小说中的形象显得更高大、更完美、更典型。在当今“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历史任务面前,冬子这个形象是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所以,电影虽然写的是少年儿童的历史题材,但却表现了重大的主题,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社会内容,更典型地反映了生活的本质和规律。

由此可见,主题的选择和提炼并不是一个技巧问题,而是一个怎样认识生活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事物,分析生活,这样才有可能在革命斗争生活中提炼出好的主题来。

一 以 当 十

种庄稼要间苗，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拔掉多余的苗芽，才能使壮苗舒展肢体，茁壮成长。要是舍不得把多余的苗芽拔掉，这也不想留，那也想要，密密麻麻一大片，挤得不通风，不透光，结果肥源分散，光照不足，使棵枝瘦小，结实不多。间苗可以提高产量，贪多反而所得甚微。这是讲的种庄稼，但对写文章也颇有启发。

写文章要有材料。在生活中获得的原始材料，我们叫它素材。根据主题的需要进行选择 and 提炼以后的素材就叫题材。选择和提炼素材就好象间苗一样，要拔掉一些多余的苗芽，当然选材比间苗更复杂些。选材时要根据主题的需要对素材进行反复的分析研究，而间苗却只要进行粗略的观察分析就行了。间苗是把一小部分秧苗去掉，留下的却是大部分；而选材往往要去掉比较多的素材，只留下几个对表现主题有典型意义的材料。所以题材与素材比较起来，不但数量少，而且质量精。

写文章是为了向人们作宣传的，而不是为了摊材料，亮家当。如果写文章时把所有素材都一古脑儿地放进去，就会显得臃肿庞杂，不得要领；有好的材料也会被淹没掉，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有好的主题也得不到鲜明、突出的表现。这就好象种庄稼不间苗一样，收不到良好的成果。文章中的材料总

是以个别反映一般的，想要在一篇文章里写尽事物的全体，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所以，文章中的材料必须以少胜多，一以当十。

什么样的材料才能够以少胜多，一以当十呢？让我们先看看《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①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有一节“她做的好事俺们数不清”，作者并没有把四十多天调查得来的材料都写上去，以显示“数不清”。文中只选用了三个材料，其中的一个是：在一个下大雨的深夜里，李月华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开门一看，北头生产队的叶大娘站在雨地里，浑身淋得湿透。她已经敲了两次门，在雨地里等了好长时间了。原来他的儿子王春得了急病，肚子痛得在床上直打滚。经过李月华的急救，王春的病好转了。但这件事却引起她一连串的联想：“如果病人得了更紧急的病，我醒得晚了，不是很危险吗？怎样才能不耽误时间呢？”她想到了叶大娘家喔喔报晓的公鸡，鸡能叫明，狗叫不是也能给人报信吗？于是，她家里就养起了一条小黄狗。从此，只要有生人进院子，小黄狗汪汪一叫，李月华屋里就点起了灯。这个材料看起来很普通，在农村里养一条狗算不了什么，然而这个材料对于说明李月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来说，却是深刻的。因为，这些事情虽然随时可能发生在在一个农村医生的身旁，却未必能象李月华那样想得这样深刻，这样细致，这样周到。这件事虽然只是李月华所做的“数不清”的好事中的一件，却反映出了李月华思想的光辉。这样的材料对于表现李月华的思想境界，对于说明文章的主题，具有典型意义，它能以少胜多，一以当十。所以，选择的材料，只要能说明事物的本质，并能确当

^① 载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地表现主题的,它就是典型的材料;而典型的材料就能起到一以当十的效果。在文章里与其写上许多一般性的材料,倒不如用上一两个典型的材料,它既能说清楚问题,又可使文章写得简洁明了。

在论说文里,所要论证的观点也需要有一定的材料来加以说明。如果材料选得典型,就可以增强论说文的说服力和战斗力。例如有一篇叫做《称霸与偷骗》^①的杂文,用了两个非常典型的材料:一个是,苏联驻法国大使馆的空军武官在巴黎的航空展览会上偷了外国公司展览的自动驾驶仪和激光零件,当场被抓住;另一个是,在同一个航空展览会上,一架苏联最新设计的“图-144”超音速客机在作飞行表演时,当众坠毁。近年来,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干的丑事、坏事真是成千上万,在一篇短小的杂文里当然不可能全摆上去。作者选择了这两件事来作文章,收到了很好的表达效果,说明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本质。他们一方面为了标榜‘发达的社会主义’是如何如何的‘发达’,极力炫耀自己军事科学技术的高明;另一方面则是一副奴才相,对外国的军事科学技术垂涎三尺,看得眼红,能偷则偷。这两个材料看来似乎矛盾,实际上却是统一的。去偷,去骗,目的都是为了改进武器装备,增加扩军备战的资本,以争夺世界霸权。作者透过现象看本质,把这两件事与争夺世界霸权挂起钩来,从政治上进行分析,引导读者从偶然中看到必然,从丑恶现象看到苏修反动、腐朽的本质。因此,文章抓得准、批得狠,起到了打击敌人,教育人民的作用。

典型的材料并不是俯拾皆是,随手可得的,而是经过作者

^① 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三年第七期。

辛勤的劳动,选择提炼出来的。而要有选择提炼的余地,就必须作深入的调查研究,掌握丰富的素材。如果手头原始素材很少,也就谈不上什么选择和提炼了。所以,我们调查时要“以十当一”,材料掌握得越多越好。有了调查时的“以十当一”,才会有写作时的“一以当十”。大家可能读过魏巍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①吧,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只选用了三个材料。第一个材料写松鼓峰的一次战斗。在这次战斗中十四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与敌人进行了八个小时的顽强搏斗,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反扑。最后子弹用光了,他们就摔碎了枪枝,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战后,烈士的尸体保留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的,有掐住敌人脖子把敌人摁倒在地上的。有一个战士,手里还紧握着一个手榴弹,弹体上沾满了脑浆;和他死在一起的美军鬼子,脑浆迸裂,涂了一地。另有一个战士,嘴里还衔着敌人的半块耳朵。在这次战斗中,战士们都壮烈牺牲了,但却歼灭了三百多个敌人,完成了上级交给他们的任务。这个材料说明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因此,作战时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第二个材料记述一名叫马玉祥的青年战士,不顾自己生命的安危,几次冲进被大火燃烧着的房屋,英勇抢救朝鲜人民的事迹。这个材料表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对朝鲜人民的热爱,充满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深厚感情。第三个材料写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为了祖国人民能过和平幸福的生活,在朝鲜吃的是一把炒面一口雪,住的是阴暗潮湿的防空洞,生活虽然艰苦,但他们以苦为乐。战士们豪迈地说:“只要能使人民得到幸福,也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这个材料展

^① 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现了我们的战士有着非常崇高的精神境界,对人民无限热爱,对祖国无限忠诚。这三个材料从三个不同的侧面回答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为什么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这个问题,把志愿军战士最本质的东西写出来了。所以,这样的材料是非常典型的。魏巍同志所以能获得这样典型的材料,是由于他在朝鲜长期生活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中间,耳闻目睹了许许多多有关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原先他曾从所掌握的材料中选了他认为最生动的二十多个材料,写了一篇《自豪吧,祖国》的通讯。后来感到不好,“因为例子太多了,好象记账,哪一个也说得不清楚,不充分”。以后写《谁是最可爱的人》时,就对这二十多个材料进行了分析比较,从中选了上述三个材料。这就告诉我们,因为有了调查时的“许多个”,才会有写作时的“这三个”。有的人写文章,调查时蜻蜓点水,不肯花力气,弄到一点材料就轻下结论,忙于动笔。临到写的时候,又恨不得把手头的一点材料统统塞上去,结果材料多是多了,却未必精。我们务必克服这种不良的作风,重视调查研究,详细占有材料,并认真进行分析、选择,使文章的材料少而精,具有“一以当十”的作用。

量体裁衣

有一幅摄影，题目叫做《对！就这样撒》^①。画面是在一块平整如镜的水田里，两个知识青年正在撒稻种，一位老农民紧挨在他们身旁，以赞许的眼光看着一位女知识青年的动作，脸上露出满意的神情，仿佛在说：“对！就这样撒。”这是画面的主体。在他们背后的稍远处，是一片春水盈盈的水田，还可看到有一两个人正在春耕春播。照片通过三个人物的动作和表情，生动地反映了知识青年在老贫农的热心教育下，已学会了难度较高的农活，正在可喜地成长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生力量，也反映了老一代贫下中农对知识青年的亲切关怀和希望。显然，照片正是因为突出了这几个人物，才能使主题表现得如此鲜明、深刻。如果把生产队所有的社员和知识青年全部摄入镜头，让这几个人物淹没在众多的人影里，甚至把田边路旁的树木、房子、拖拉机等等都摄进去，那就很难明确地将这主题表现出来了。

这对我们写文章是个很好的启发——当我们有了一个好的主题和比较典型的材料后，在表达过程中，还必须根据主题的需要，作精心的剪裁。正如做衣服，有了好的料子，还必须根据人的大小长矮量体裁衣，这样穿起来才合适。处理题材也要服从主题的需要，有关的用上，无关的舍弃；能充分表现

^① 载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八日《文汇报》。

主题的要强调，起辅助陪衬作用的就略写；有些事情虽生动，但对表现主题关系不大，就该“忍痛割爱”。如果样样都想写，不分轻重主次，反而不能出色地完成表现主题的任务。好象做衣服，如果舍不得剪掉多余的料子，根本就成不了衣服。材料的选择剪裁，这里面也有辩证法，取舍、详略、主次、轻重、虚实等都是辩证的统一。有所舍才能有所取，有其次才能见其主，要紧的是要根据主题的需要而作恰当的安排。重点部分不妨多写、详写，次要部分可以少写、略写，可有可无的部分就坚决不写，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突出重点，阐明主题。

《雪山雄鹰》^①这篇人物通讯，写的是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东旺公社革委会主任七林旺丹同志的事迹。主题是表现他二十年来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激烈搏斗中的顽强革命精神。全文分三个部分：一颗红心如烈火（主要写一九六〇年以前与阶级敌人搏斗的情况）；雄鹰不怕风暴狂（主要写六〇年以后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与走资派斗争的情况）；继续革命不停步（写当了公社革委会主任和云南省革委会委员后的继续革命觉悟和优良作风）。全文虽是按时间的顺序来排列的，但不是记流水账，三部分各有重点，又都紧紧围绕着主题，鲜明地突出了七林旺丹同志高度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和顽强的战斗精神。

以第一部分“一颗红心如烈火”来说，主次详略就安排得很恰当。这部分重点写他一九五七年与叛匪的斗争。这年冬天，反动的农奴主策划了武装叛乱，一股叛匪突然包围了我办事处。七林旺丹和联防队员、工作队员跟叛匪浴血奋战，打退

^① 载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

了匪徒几十次的进攻。晚上，匪徒向旺丹喊话：

“七林旺丹，你是藏族人，不要跟汉人跑，快出来投降。”

旺丹听到叛匪的嚎叫，气得直咬牙。他爬上房顶，大声回答：“我七林旺丹的命是毛主席、共产党给的，我们翻身农奴和‘金珠玛米’是一家。要我投降，办不到！”

由于敌众我寡，领导同志决定让旺丹带信到解放军驻地求援。不幸路上被一个阴险的叛匪用枪打伤了右臂，打穿了腹部。旺丹熬着剧痛与那凶恶的敌人搏斗，终于把叛匪从悬岩打落深渊。那末负了重伤的旺丹怎么样了呢？

旺丹立刻解下藏靴上的扎带，把右臂的伤口包扎好，正想赶路，猛觉小腹痛如刀绞，怎么办？是站起来，还是躺下去？是前进，还是后退？他想，八十多个阶级兄弟正等着解放军支援，我决不能在这里倒下去；只要把信送到，我死了也心甘。他用受伤的右手按住腹部伤口，左手抓着积雪，侧着身子艰难地向前爬去。碰着深沟，绕着沟走；遇到下坡，就顺势滚下去；饿了，就抓把雪充饥。在爬一个七十多度的陡坡时，挣上去又滑下来，一连爬了四十多次，衣服磨碎了，手上的肉磨烂了，雪地上留下了一条血染的红线。从早到晚，昏迷了几次，也没有爬上去。

冰雪盖地，狂风呼啸，旺丹又一次从昏迷中醒来了。部队首长给他讲过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率领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英雄情景，出现在他眼前。旺丹用手撑着直起腰来。看！当年毛主席率领的红军，

就是从前面的纳亚雪山走过的。心中想着毛主席，浑身是力气。他咬紧牙关，终于爬到了山上的雪山丫口，远远看到一个砍柴的妇女，他想喊，喊不出声，又昏过去了。

.....

文中对这段过程作了详细的描述。因为在这场生死的搏斗中，最能看出旺丹对党、对革命的赤胆忠心，所以把它作为重点来写，从他斩钉截铁的语言、惊人的毅力、内心的活动等各方面，表现了他的“一颗红心如烈火”。

其他如旺丹过去受农奴主压迫的苦难生活，以及他遇到解放军后如何懂得了革命的道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等情况，不是反映他顽强斗争精神的主要材料，但对说明他为什么有如此高度的阶级觉悟和坚强的革命意志，却有密切关系，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基础，如果完全略去，就不妥当。所以把它们放在次要地位，采用略写的办法，使之与主要材料相配合，把人物的性格表现得更充分、更完整。

这篇文章的其他两部分，在题材的剪裁上，也有同样的优点。由此可见，题材的取舍安排，应作统盘的考虑，在主题思想统帅下，一方面须对材料作高度的概括，一方面又须在重点处作细致的加工，做到主次分明，详略恰当。人的活动，虽好象长河流，年年月月，没有止息，但写入作品，却不能象一本流水账。有时数年生活只消一笔带过，有时从一地可一下跳到另一地，不必烦琐地交代是怎么去的；但有时即使是一个小动作，一个小场面，也要细加描绘。这都要根据主题需要来决定。这样才能繁简适宜，详略得当，使主题表现得更鲜明突出。

根据主题的需要来决定主次详略，这是处理题材的原则。

但有时候,许多材料,对表现主题几乎是有同样的意义,遇到这种情况,除了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外,还可采用“点面结合”的办法。如《一堂课》^①这篇短文,通过参观“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阶级教育展览会的所见所闻,愤怒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反动派的伪善和残酷。文章先是简要地介绍了这个育婴堂的概况,然后把重点放到一幅一个三岁的孩子被打断了腿的照片上,根据讲解员的讲述,将这孩子惨遭残杀的经过情况作了详细的描述,仿佛在读者眼前放映着一幕幕电影,使读者看到憔悴的母亲如何忍痛把孩子送进育婴堂,可怜的孩子如何凄惨地嚎哭,残暴的刽子手如何打断了他的腿……。此外,作者又以简明的语言介绍了其他几幅图片:

看! 这只深井,填满了婴儿的尸骨;
看! 这是刽子手虐杀婴儿的凶器;
看! 这是从婴儿身上榨取的钱财;
.....

在整个展览会里,每一幅图片都浸透了婴儿的斑斑血泪,每一幅图片都从不同角度记录了帝国主义分子的血腥罪行,每一幅图片都是对这些伪善的魔鬼的有力揭露和控诉。这里当然不可能、也无需要把所有图片都一一介绍出来。文章对那个三岁孩子惨遭杀害的经过作了详细介绍,使人对育婴堂虐杀婴儿的罪行有了一个具体而深刻的印象。但仅只一例,内容似嫌单薄,加上对其他几幅画的概括介绍,就可使人对育婴堂这人间地狱有更全面的认识——帝国主义豺狼,他们杀掉了多少无辜的婴儿,他们用了些什么凶器,怎样残酷地虐杀婴儿,他们干了那么多惨无人道的勾当,却在“仁慈”“救济”的名

^① 见《中学生记叙文讲评》,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义下诈骗了那么多钱财！从而使人们对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产生了更加强烈的仇恨。这里采用以讲述一点为主，以概述其他各方面为辅的写法，就可以用较少的文字表达较丰富的内容。从这里可以看出，为了把主题揭示得更深更透，重点详写部分固然是主要的，起辅助作用的略写部分也是决不可省的。象这样的记叙文，如果换一幅画作中心，如以“深井”或“凶器”作重点，也同样可以有力地表现主题，但在剪裁和表达上仍然需要有主有辅，有详有略，才能把主题揭示得更为深刻。

谈到这里，可能有的同志会问：那末，象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①这一类文章，写了那么多事情，这又是根据什么来剪裁的呢？不错，有的文章看起来似乎重点并不突出，但仔细一剖析，可看出它各部分莫不是直接或间接地与主题有关；有的是直接表明主题的，有的则作为对照、烘托之用，要看你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通过作者儿童时代两种不同生活的对照，表现了作者对自由生活的热爱和对不合理的封建教育制度的批判。这里，后者是重点，前半篇是对后半篇的衬托。写了百草园中天真自然的乐趣，更可看出束缚儿童身心的封建教育制度的不合理。写在三味书屋的读书生活，看起来好象都是些琐事，实际上是从各个方面对封建教育进行了讽刺和批判：没有孔老二的像，便向一幅鹿的画行礼，算是对“万世师表”的尊敬，这是对孔老二和尊孔派的极好讽刺；问“怪哉”一事，是对那些不学无术的封建“宿儒”的讽刺和对不许学生提问只许学生死读书的教学方法的抨击；关于读书情形的描写，更是生动地揭露了旧教育的腐朽和虚伪——老师要学生读“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① 见《鲁迅全集》第二卷《朝花夕拾》。

而老师自己却读“铁如意，指挥倜傥(tì tǎng 涕淌)，一座皆惊呢……；金叵(pǒ)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啻……”并且极其形象地刻划了他沉醉得意的神态……。这样就从各个方面揭示了封建教育的反动和腐朽，重点是很明确的。这篇文章我们读起来并不感到它散漫琐碎，就是因为作者能根据主题需要，严于选材，善于剪裁。即使是美女蛇的故事吧，也决不是闲笔，它给孩子们乐园笼罩上一层恐怖阴森的气氛，“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这仍然是从属于反对黑暗的封建势力的总主题的。至于孩子们在上课时偷偷去玩耍、画画等，则是对严厉的私塾学规的“造反”，表明不合理的旧制度，并不能真正束缚生气勃勃的儿童，孩子们总有他们反抗的办法，新生的力量是压制不住的，这完全符合生活的辩证法。这样不仅把现实生活中封建旧势力与少年儿童之间的矛盾冲突写得更加逼真，而且也使主题思想显得更加深刻有意义。

由此可见，在一篇文章中，哪些该写，哪些不该写；哪些该详，哪些该略；哪些宜正面描写，哪些宜侧面烘托；哪些应放主要地位，哪些只起辅助作用……都须根据主题的要求来决定。前面谈到的三篇文章，在题材的剪裁安排上，各有特点，总的来说，都是为了把主题思想表现得更鲜明突出，生动有力。

标题的艺术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日在《河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南崔庄依靠贫农实现全村合作化》。这是一篇写得很好的文章，它生动地记录了这个地方的党组织，坚决支持贫苦农民的办社要求，走合作化的道路，在和富裕中农的竞赛中取得了胜利，由小社变大社，年年增产，不到三年，实现了全村合作化的过程。这篇文章的标题大致上是概括了它的内容的，缺点就是比较一般化，战斗性和生动性都差些。后来，这篇文章被收进《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标题改为：“谁说鸡毛不能上天”。这个标题改得确实好。要把几千年来的个体经济引向合作化的道路，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事，必然会受到反动阶级的反抗，旧的习惯势力的阻挠。富裕中农说话了：“穷光蛋想办合作社哩，没有见过鸡毛能上天。”鸡毛能不能上天的议论，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谁说鸡毛不能上天”这个标题抓住了斗争的焦点，从路线斗争的高度点明了文章的主题：“**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它立意高，思想深，倾向性非常清楚，立场十分鲜明，因而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战斗性。同时，这个标题又很生动形象，读来感到新颖，很有启发性。有人把文章的标题比作眼睛，好标题确实具有象眼睛那样传神的作用，“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不是把文章

的精神都传达出来了吗？

鲁迅十分重视标题的选择，他的文章的标题，新鲜多样，生动活泼，寓意深刻，引人入胜，具有强烈的战斗性。例如《为了忘却的纪念》^①这篇文章是鲁迅为纪念“左联”五位烈士而写的。标题上说是“纪念”，而又要“忘却”，这不是矛盾了吗？实际上鲁迅是不能忘却他们的，正因为不能“忘却”，所以才写“纪念”。那么为什么又是“为了忘却”呢？因为两年来悲愤时时袭击着作者的心，从没停止过，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化悲愤为力量，更好地投入战斗。另外，五位作家遇难时，当时报上一点消息也没有登载过，对于一般人，可能真的要“忘却”他们了，作者写这篇文章正是为了让人们永远纪念他们，永远不“忘却”他们。这个标题充分体现了作者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坚韧顽强的战斗精神，它的含意是十分深刻的。

看了上面两个标题，我们可以体会到，标题是文章的题目，它反映作者的立场、观点和对事物认识的深度，对吸引读者看文章和帮助读者理解文章有很大的作用。标题的好坏影响一篇文章的宣传效果，所以文章的标题也是应该讲究的。

文章的标题有各种不同的类型，有的点明主题，如“牢记党的基本路线”、“谁是最可爱的人”；有的标明文章所要阐述的内容，如“谈谈科学种田”、“小靳庄十件新事”；有的以所写的主要人物或故事发生的地点为题，如“高玉宝”、“沙家浜”；有的说明写作的时间，如“新年献词”；等等。从表现方法看，有的标题偏重于科学概括；有的标题偏重于形象表现。总之，不管采取哪一种类型，运用何种手法，写作标题的基本要求是：准确、鲜明、简洁、有战斗性；再则是新鲜生动，引人注目。

^① 见《鲁迅全集》卷四，《南腔北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准确就是要题文相符。如新闻、通讯、评论等文体的标题一般要直接体现文章的主题或概括文章的内容，通过标题把文章的基本观点、主要内容、宣传意图准确地告诉读者。这需要认真地分析稿件，对稿件的内容分析透了，标题就容易定得准确。

鲜明就是要有倾向性。写文章要爱憎分明，对新生事物必须满腔热情地赞扬，对腐朽没落的东西应该无情地揭露和批判，这种爱憎的感情最好在标题中就能表示出来。如一九七四年八月十日《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报道山西省昔阳县年轻共产党员茁壮成长的通讯，标题是“大有希望的新一代”。这个标题很鲜明，表明了作者对这一新生事物的态度，充分说明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锻炼的我国青年一代是大有希望的，我们党的事业是兴旺发达，后继有人的。如果把标题改为“昔阳县年青共产党员在成长”，就没有原来的鲜明。

简洁就是要言简意赅(gāi 该)。恩格斯认为标题“愈简单、愈不费解，便愈好”。有一篇叫《中共遵化县十区委员会贯彻“书记动手，全党办社”的经验》的文章，后来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对原文作了较大的删改，标题也改为“书记动手，全党办社”。文章批驳了下令大批解散合作社的右倾机会主义，满腔热情地赞扬了“书记动手，全党办社”的精神。修改后的标题比原来的标题更简洁、更鲜明地点明了文章的主题。这个标题简明易懂，言简意赅，并带有号召性，因而也就增强了战斗性。

准确、鲜明、简洁是标题的基本要求，这三者是相互联系的。准确是基础，离开了准确，也就谈不上鲜明和简洁，而准

确的标题一般也总是比较鲜明的。准确、鲜明的标题往往也比较简洁，标题冗长拖沓，鲜明性也就会差些。

为了使标题准确、鲜明、简洁，有的文章在正标题之外再列副标题。副标题就是加在文章正标题下面或后边的标题。它的作用往往是指出文章内容的范围或写文章的原委。例如《人民日报》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发表了一篇报道山西省昔阳县抗旱斗争事迹的通讯，这篇通讯的正题是：“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正标题之外又列副标题：“山西省昔阳县抗旱斗争纪实”。正题用了一句既概括又生动的群众语言，点明了文章的主题，非常好。为了使读者明了文章的基本内容写的是些什么，就加上了副标题。如果不用副标题，而把它的内容概括在正标题中，标题就会显得不够鲜明、简洁了。这篇通讯比较长，中间又列了几个小标题：“千里百担一亩苗”，“一心靠社会主义”，“干部站到第一线”，“最可贵的是风格”，“大旱大干促大变”。这些小标题既概括了每一部分的内容，看起来非常醒目，文字又简洁、匀称，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

在准确、鲜明、简洁的基础上，还要求标题写得新鲜生动，引人注目。就是说标题要有新意、有特点、不一般化，并且具体形象，有吸引力。例如在一九七三年第一期《自然辩证法》杂志上登了一篇谈天体的起源和演变的文章，它没有用“关于天体的起源和演变”，或“论天体的起源和演变”等这些比较一般化的标题，而是用了“天体的来龙去脉”这样一个标题，这个标题通俗、亲切、新鲜、活泼，很吸引人。这篇文章的小标题也很精采，如“我们是在地上，还是在天上？”、“是地动，还是天动？”、“恒星从来不恒”、“万物生长靠太阳”等等，看了叫人喜欢，使人要读下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工农兵写的许多文章，不但内容好，标题也很生动活泼，使人爱看。就以小评论来说，如《赞“笨鸟先飞”》、《“跌个跟头抓把泥”》、《论“黄毛丫头十八变”》、《要“撒种子”，不要“放鹞子”》的标题都很形象生动，有生活气息和时代气息，用的是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所以读了以后感到很亲切。象《要“撒种子”，不要“放鹞子”》的标题用了两个比喻，形象地点明了文章的主题：革命家长对待自己上山下乡的子女，要象撒种子那样，把他们撒到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去，让他们开花结果，为社会主义多作贡献；而不要象放鹞子那样，手里拉着一根“私”线，动不动就把他们从三大革命实践中拉到自己家庭的小天地里来。这个标题用得很贴切，反映的思想也很深刻，读来感到新颖、生动、引人入胜。如果改为“革命家长要鼓励自己的子女到农村去”这样的标题，就显得平淡了。

所以，写文章应该要讲究标题的艺术。但是有些初学写作的同志对于标题往往不够重视，不下功夫，写完文章就随便加上一个标题。这样就使得有些文章老用雷同的标题；有的是题目大，文章小；有的是题不对文。还有些初学写作的同志对于标题往往过于雕琢，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结果标题浮泛夸张，不贴切，不准确，同样不能起到标题应起的作用。所有这些都是定标题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当然，一篇文章的好坏并不决定于标题，但是一篇文章如果有了好的内容，又能配上一个好的标题，它的宣传效果就更大了。

在繁杂中求条理

文章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现实生活虽然是纷繁复杂的，但任何事物总有它发生发展的过程，有它本身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所谓文章的条理，就是事物的这种内在联系和规律在文章中的反映。不过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和规律，往往是隐蔽在复杂纷繁的现象里的，写文章时，我们必须对这些复杂现象进行分析、概括和整理，然后根据主题的需要和事物本身的内在联系对材料进行剪裁和安排，这样才能有条不紊(wěn 稳)地把它们讲清楚，并通过它们展示主题。

在处理题材时，我们往往在众多材料中，选取那最能体现事物内在联系的事物来作为组织题材、开展情节、安排层次的线索。这样，就可使题材更集中，中心更突出，条理更清楚。例如《延安的种子》^①这篇小说，就是以寓意深刻而又双关的“种子”为线索，概括了新老两辈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战斗历程：在革命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在延安宝塔山下，纪延风的父母曾用毛主席亲手培育的南瓜种子种过南瓜。以后，又带着这延安的种子随军南下，到皖南一带打游击，并在那里种下了南瓜。不久，延风的爸爸参加了淮海战役，她妈妈留在皖西坚持战斗，纪延风就在这炮火纷飞的年代里诞生了，部队留下的南瓜，就成了她们母女的主粮。二十多年后，纪延风长大

^① 载小说散文集《延安的种子》，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了。她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怀着满腔热情奔赴农村这广阔的天地，走上新的革命征途。临行前，她父亲把珍藏了多年的宝贵礼物——一本油印的《关于重庆谈判》和延安的南瓜种子送给她，希望她做一颗革命的种子，在三大革命的斗争实践中生根、开花、结果。但纪延风虽有革命的热情，却缺乏实际的锻炼，到农村后不久，她有些不安心。是春风峪（yù 育）的贫下中农帮助和教育了她。特别是“选种”一节，田大爷以种子成长的规律启发延风，语意双关，感人至深，使延风受到极大的教育。经过三年多的锻炼，纪延风终于在田大爷等贫下中农的帮助教育下，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起来。

四、五十年来，英勇的中国儿女，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前仆后继，经过了多么曲折复杂、雄伟壮丽的战斗历程。小说巧妙地以“种子”为线索，将新老两辈人的革命经历联系起来，说明今天千百万知识青年奔赴农村广阔天地的革命道路和老一辈在延河岸畔、皖南山区走过的战斗道路是一脉相承的，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胜利前进的；老一辈的光荣事业，正由象纪延风这样的革命青年继续着。小说还说明，革命的种子，必须有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有三大革命运动的肥沃土壤，有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才能茁壮成长。

由此可见，选择线索要从有利于表现主题着眼，同时还要看它能否体现事物的内在联系。在这里，“种子”的意义是深长的。作品以“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为指导思想，把来自延安的毛主席亲手培育的南瓜种子和来自延安的革命者的后代联系起来，把老一辈在革命战争年代遵循毛主席教导在人民群众间生根、开花的光荣传

统和今天青年到祖国广阔土地上去生根、发芽的现实联系起来,把植物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生长规律和年青一代的成长规律联系起来,突出地反映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虽然小说所反映的时代包含了国内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两个时期的漫长历程,所反映的生活内容又是如此生动丰富,但人们读后毫无散漫凌乱的感觉。显然,在这作品中,以“种子”为线索贯串全篇,对题材的剪裁、组织和主题的集中、深化,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还有一种情况是以贯穿全篇的主要事件为中心线索。中心线索要力求单纯、明确。如《生命线》^①这篇通讯,是以抢救贫下中农一病孩为线索而组织全部题材的。这篇文章牵涉到从张家口到北京的许许多多人和事。这里有张家口车站设法抢救病孩的繁忙景象,有北京铁路分局调度列车的紧急措施,有“特别货车”工作人员沿路护送病孩的感人情景,有铁路工人检修车辆的紧张战斗,有解放军派汽车来接送小孩的动人故事,有北京工农兵医院医务人员抢救病孩的战斗场面和特写镜头等等;中间还插叙了列车司机老曲对解放前苦难生活的回忆和老专家徐医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感受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紧紧围绕“抢救贫下中农孩子”这一主要事件而开展的。因而通过抢救孩子这个过程,也就充分反映了这样的主题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但是小孩得救的生命线,而且也是指引全国人民思想革命化、使一切工作取得胜利的生命线”。《生命线》这篇通讯线索单纯明确,因此,虽然情节复杂,穿插丰富,但写起来仍能有条不紊,并使主题鲜明突出;否则,象这样复杂的题材,写起来就很容易杂乱无章或顾此失彼。

^① 载一九七二年三月七日《人民日报》。

有了明确的线索,还必须考虑如何有步骤、有层次地把全部思想内容表达出来。层次的安排,主要应以有利于表现主题和体现内容的内在联系为原则。在论说性文体中,一般是按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样一个过程来安排的,因为这体现了人们分析事物的一般思想认识过程,这样安排比较容易说明问题,也容易被读者理解和接受。

如《中庸之道是政治骗子的哲学》^①这篇评论文,首起两小段是一层意思,开门见山地摆出问题:孔老二把中庸之道奉为最高道德,林彪称中庸之道是“合理”的。两个骗子,一脉相承。

下面就针对这问题进行分析、论述,又分几层:

第一层,先说明什么是中庸之道?有没有中庸之道?——按孔孟之徒的解释,中庸之道,就是不偏不倚的意思。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一切意识形态、道德观念,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根本没有什么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这一层,从理论上说明中庸之道不过是骗人的弥天大谎。

第二层,从历史上反动统治者的言行来看,中庸之道是一种骗人的哲学——孔老二鼓吹中庸,目的是为“复礼”,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等级制;曾国藩称中庸是“圣人之言”,却“杀人如剃头”;蒋介石一面高喊中庸之道,一面却挥舞屠刀大杀革命人民;林彪鼓吹中庸,却在暗地磨刀霍霍,妄图搞反革命政变。由此可见,鼓吹中庸之道不过是反动派镇压人民的一种欺骗手法。这层紧接上文,说明为什么中庸之道是骗人的弥天大谎。

第三层,用阶级斗争观点进一步揭露林彪鼓吹中庸的阴

^① 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二期。

险目的,是想用它来麻痹革命人民斗志,放弃同帝、修、反和国内地、富、反、坏、右的斗争,以便让他们可放手去搞反革命复辟,把我国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第四层,从哲学上看,说明中庸之道在哲学上就是折衷主义、调和论,在尖锐的阶级斗争面前似是而非、模棱两可。机会主义者是混在工人阶级队伍里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是革命队伍里的蛀虫,所以他们需要这种骗人的哲学,给自己脸上贴金,以蒙蔽人民眼睛。林彪一伙有句自白:“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足见其骗人哲学的反动实质。手法是为目的服务的。这层紧接上层,更有力地揭露了林彪一伙反革命的罪恶用心。

通过上述分析、论述,最后,针对骗子哲学表明我们的态度——共产党人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谋私利,光明正大,特别是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更是旗帜鲜明,敢于斗争。并指出孔老二和林彪虽已垮台,但批判中庸之道,仍然是当前一项重要的战斗任务。

这篇文章的层次,基本上是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个程序来安排的。前面提出的问题,是后面几层分析论述的基础,最后的结尾,又是前面几层内容发展的必然结果。各层次之间,紧密衔接,从理论和事实、目的和手段各方面揭露了中庸之道这骗子哲学的反动实质。

可能有的同志会说,都是按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样的过程来安排,会不会变成公式化,老一套?其实不然。因为提出问题可有各种各样的提法,如可以直接提出自己对问题的看法,也可以先拎出对方言论中的错误或矛盾,也可以从一件具体事实或以讲故事的方式入手提出问题。不同

的问题,又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分析,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论述;因此仍然可以写得生动活泼,丰富多样。

在记叙性文体中,则往往是按照时间先后的顺序或事物发生、发展、结局的过程来安排的。因为这过程大体上也反映了事物本身的内在联系和规律,这样写使人看后对事情的来龙去脉有个清楚的印象。这就是为什么记叙性文体常用“顺叙”方式的缘故。

顺叙是完全按照时间先后或事情发生发展的过程来安排段落层次的一种写法。如鲁迅的《故乡》^①,开头是写将近故乡时所见农村景象和“我”的内心感受,顺便交代了回乡的原因;接着写到家后见到母亲的情形,又因母亲的话引起“我”在少年时期与闰土交往的一段回忆;第三层写杨二嫂来讨木器家具;第四层写闰土带着水生来访时的情景;最后写离别家乡时的情形和感想。这种按照事情发展的先后次序来写的办法,容易做到条理清楚,但写得不好,也容易平铺直叙,所以写作时特别要注意主次详略。如《故乡》中,对闰土的回忆和与闰土见面时的情况这两段是全文重点,正是通过这两部分的对照,反映了旧中国农民受三座大山压迫的深重灾难;杨二嫂的情况是旧中国另一个生活侧面的写照;最后部分的感想,起了加深主题的作用;所以这几部分写得较为详细。至于其他亲友的来访及家里琐事就略而不谈或只一笔带过。这样写详略得当,条理清楚,能很好地表现深刻的主题思想。

有时,为了加深读者对结局的印象,也可以把结局提到开头来写,这种方法叫倒叙。但写完结局,仍得用顺叙方法来写事情发展的过程,以便让读者对整个事情有个完整的印象。如

^① 见《鲁迅全集》卷一,《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鲁迅的《祝福》^①，开头便是写在鲁镇除夕“祝福”的热闹气氛中，“我”在河边遇到了已经沦为乞丐的祥林嫂，以及第二天听到祥林嫂死讯时的心情，使读者对祥林嫂临死前的悲惨境遇先有一个深刻的印象。然后再回过头来叙述祥林嫂生前是如何地受尽了封建势力的摧残和迫害。采用倒叙方式要注意倒叙部分与顺叙部分的交接和过渡，要使读者感到转换得很自然，不会产生错乱模糊的感觉。如《祝福》中，就以“然而先前所见所闻的她的半生事迹的断片，至此也联成一片了”一语作转折，下面用顺叙方式写祥林嫂的不幸遭遇。最后，以“我给那些因为在近旁而极响的爆竹声惊醒……”表示顺叙部分的结束，回顾篇首，整个层次结构就十分清楚。

在主要事件的叙述过程中，有时需要暂时把叙述的线索中断一下，插进有关的另一件事的叙述，这叫插叙。如《故乡》中当母亲提到闰土时，便引起“我”对少年闰土的一段回忆，就是插叙。应注意的是，插叙部分必须与表现主题、刻画人物或情节发展有密切关系，否则就会变成节外生枝。此外，插叙部分的起讫处，也应有所表示，使它不致与叙事的主要线索相混。如对闰土的这段回忆，便是以“这时候，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和“现在我的母亲提起了他，我这儿时的记忆，忽而全都闪电似的苏生过来……”两句，表明插叙的起讫。插叙完了，仍须回到原来叙事的主线上来。这样，既有利于丰富内容、深化主题，又能保持叙事的连贯性，使事情发展的脉络清晰可辨。

总之，现实生活是纷繁复杂、丰富多采的，但我们完全可以找到它们本身的内在条理。正如大地上的河流港汊(chà)，

^① 见《鲁迅全集》卷二，《彷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看起来纵横交错,其实都有一定的流向,一定的规律,抓住它们的主流,也就不觉错综复杂了。客观生活里的复杂现象也如此,若能掌握它们发生发展的过程,了解它们与其他事物的联系,弄清它们的本质的意义,抓住贯穿整个过程中的脉络线索,则就不难将它们有条有理地反映出来。如果还能讲究一些表现的方式方法,如用顺叙还是倒叙,层次如何衔接,哪些地方须交代,哪些地方须过渡,某些细节如何穿插等等,那就不但能写得有条理,而且还能写得周密细致了。

在条理中见周密

写文章不但要条理清楚，而且层次段落之间的衔接要妥贴周密，尽量做到没有破绽(zhàn 站)，没有疏漏，没有阻隔，让读者能紧紧跟上作者的思路，使文章的结构成为完整严密的有机体。

要达到条理中见周密，首先要靠段落层次之间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必要时还可以运用过渡和照应等办法。

碰到哪些情况，要用“过渡”的办法呢？

1. 意思发生转折的地方。如《红雨洒遍任屯村》^①，开头两段是写今日任屯村欣欣向荣、繁忙欢乐的景象，反映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给任屯村人民带来的幸福生活。下面文章就安排了这样一段过渡：

谁能相信，这个“春风杨柳万千条”的美丽村子，

解放前竟是个“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地方！

文章紧接着叙述解放前任屯村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摧残下，血吸虫猖獗流行，大地满目荒凉，人民过着贫病交加的悲惨生活。当中有了这段过渡，不但使上下文衔接得很自然，而且使任屯村的今昔对比也显得更为鲜明强烈。

2. 内容进展幅度较大的地方。如《故乡》中，写到闰土临走前拣了几件东西，第二天便领了水生回去了。接着，以“又

^① 载于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文汇报》。

过了九日，是我们启程的日期。闰土早晨便到了，……”转入下文。这九天中的事情，没有一一交代的必要，但马上写闰土的到来，又似乎衔接不上，故以“又过了九日……”作过渡，以避免上下文的脱节，而显示情节的连贯。

3. 表示事件或场面的转换。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在叙述完第一个故事——松鼓峰战斗后，有这样一段：

我们的战士，对敌人这样狠，而对朝鲜人民却是那样地爱，充满国际主义的深厚热情。

然后接下去讲第二个故事——救护朝鲜孩子。这个过渡段，就好象一根韧带，把上下两个故事联系起来，成为上一个故事的结论和下一个故事的提示，分别暗示了两个故事的主题——对敌人的狠和对朝鲜人民的爱，对突出全文的主题思想也起了很大作用。

4. 由总述到分述，或由分述到归结的地方。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第一段中说：“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接着，第二段，只一句：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然后转向下文，分别对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及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作了详细的分析。这里以一个问句为过渡，不但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发人思考，有力地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所要论述的问题上来，使我们读到这里，都能以关切的心情去注意下文的分析。

当然还不止上述这些。总的来说，哪些地方该过渡，主要还得靠作者在写作时随时根据具体情况，留心琢磨。作者总要

时时为读者着想，譬如引人走路，拐弯时要打个招呼，过河时要架桥摆渡，这样才能使读者跟着你顺利前进，到达目的地。

从上面这些例子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好的过渡，不仅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对分清层次和突出内容的思想性也有很大帮助。

至于用什么方式过渡，除了前面例子中所用的过渡段的形式外，也可用一两句话作为过渡句，放在一段的开头或结尾的地方，以表示承前或启后的意思。如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在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因为要说明“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所以有必要把什么是知识的问题说明一下：

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

这里，就以“什么是知识？”一句为过渡，表示承接上文的意思。说明了“知识”的确切含义，也就可以教育那些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明白自己的缺点，懂得接触实际、向工农学习的重要性。

也许有的同志要问，前面所举《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第二段：“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与这里的“什么是知识？”两句在形式上很相象，为什么前者独立成段，而后者仅作为一段的开头呢？这是因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一句，总领下文好几个段，所以把它独立成段，放在下面各段之前；而“什么是知识？”一句，只关系到一个段，因而不须独立成段，附在该段前面即可。这样更能体现文章内在的逻辑关系。

一篇文章的结构，不但要求各层次间衔接紧密，过渡自

然,而且还要使文章中的有关内容,前后能互相照顾,互相呼应。有时,前面说的话,后面没有着落,就易使人产生疑问;有时,后面说的事,前面没有交代或暗示(也称伏笔),就会使人感到意思来得突然,摸不着头脑。照应得好,可使全文脉络更清楚,结构更周密,也可使主题思想表现得更充分、更深刻。

照应通常有下列几种情况。

一种是首尾照应。这种方式可使人对结构产生圆满完整的感,对主题或主要事件留下深刻的印象。如鲁迅的《一件小事》^①,开头是:

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甚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

但有一件小事,却于我有意义,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使我至今忘记不得。

下面是叙述人力车夫满怀阶级感情地扶起被撞倒的老妇人的事情。结尾处是:

这事到了现在,还是时时记起。我因此也时时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这里,“时时记起”跟前面的“忘记不得”;“文治武力……背不

^① 见《鲁迅全集》卷一,《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上半句了”跟前面的“所谓国家大事……都不留什么痕迹”，都是前后遥相呼应的。“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则比“忘记不得”更进一层。“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点明了“于我却有意义”的具体含义。有了这结尾处的照应，就把这件“小事”的重大意义表现得更充分，给人以更深刻的印象，并且强烈地表现了作者尊敬劳动人民和严于解剖自己的革命精神。

一种是围绕中心思想或中心事件，在文中多处相互照应，相互补充、发挥，使结构更为紧凑，主题更为鲜明。如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①，在开头的“解题”中就提出“打落水狗”的论点：“总而言之，不过说是‘落水狗’未始不可打，或者简直应该打而已。”到第二节末了，又说：“总之，倘是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水中。”到了第三节，又提出对那些貌似公允、折中，而一味讨“贵人”欢喜的叭儿狗，“尤非打落水里，又从而打之不可”。第四节中告诉我们：“不‘打落水狗’是误人子弟的”，因为“狗性总不大会改变的”，决不能因它落水而有丝毫仁慈怜悯，否则它一旦上岸，疯狂咬人，贻害无穷。第六节中则指出，不打落水狗自然也非绝对不可以，不过要看清对手，要有区别：“无论其怎样落水，为人也则帮之，为狗也则不管之，为坏狗也则打之。”这样多处照应，互相补充，就把“打落水狗”的意思发挥得更加充分、全面，贯穿了对敌斗争的辩证法，帮助读者更好地领会“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

从前面两例中可看出，所谓照应，决不是内容、文字上的简单重复，而是互相呼应、补充、发挥，把意思说得更透彻，以

^① 见《鲁迅全集》卷一，《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便加强文章的表达效果。

还有一种是关系到整个情节发展的某些重要细节，应当在恰当的地方加以交代和照应。如《智取威虎山》，在第一场中，从杨子荣的话里交代了“我们奉命化装侦察，在偏僻的山坳里，救了个哑巴孩子。经他父亲指点，我们到了黑龙沟……”的一段经历，为第三场“深山问苦”作了伏笔。有了前面的交代，后面常猎户说的“前几天来的那两个皮货商，说咱们老家来了共产党，帮助穷人闹翻身，不知是真是假？”及小常宝说的“爹，那两个皮货商，可是好人，要不是他们在雪地里救了我，我早就冻死了！”等话，才有依据；常猎户和杨子荣见面时的惊疑情绪和一些对话，也就使人感到很自然合理。如果没有前面的交代，后面的话就没有来由；如果没有后面的戏，那么前面说的在雪地里救了哑巴孩子一事也就失去了作用。前后照应，才见出其中脉络，结构也显得更紧凑严密。

从上面这些例子可以看出，过渡、照应等方法的运用，对完成一篇作品来说，虽不及主题的提炼、典型事例的选择、形象的刻画等来得重要，但却是使条理清楚、结构紧密的重要手段。正如有了桌面和桌子脚，如果接不好榫(sǔn 笋)头，就成不了桌子；有了衣料裁片，如果不缝好针线，也成不了衣服。因此我们在写作时一定要认真对待，不要因一处疏漏而影响全局。

波澜起伏 引人入胜

人们常说，“文似看山不喜平”。一篇文章如果写得平铺直叙，象记流水账，读者看了就会感到没味道；若能波澜起伏，富有变化，就能引人入胜，激起读者读下去的强烈愿望，收到较好的宣传效果。但波澜起伏并不只是个形式技巧的问题，而是客观生活现象的一种反映。我们的现实生活本身就充满了矛盾斗争，是生动活泼，曲折变化的，文章的波澜，实际上是生活中的矛盾曲折的反映。

要使文章波澜起伏，引人入胜，首先，要以客观事物的矛盾发展为基础，不要违背生活的客观规律，故作曲折离奇。革命样板戏在情节结构的处理上，所以能生动曲折，又合情合理，正是这个缘故。而这点，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反映论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的重要区别。例如在《智取威虎山》中，所以决定打入匪穴，采用“智取”的办法，这决不是作者故作惊人之笔，而是解放军追剿队分析了当时敌我双方的主客观条件和形势而决定的。杨子荣打入匪穴后，经过几番斗争，一切部署得当，只等百鸡宴会师，偏偏这时栾平上山来了。这一节既出人意外，又完全符合情节的发展。因匪徒们下山掠夺而致小火车遭劫，使栾平得以乘机逃跑；栾平逃后，必然投奔威虎山，因而威虎厅上杨子荣与栾平的一场面对面的生死斗争也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这时人们不禁要为杨子荣捏一把

汗，全神关注着杨子荣的安危和整个作战计划的成败。那栾平逃上山来，就凶相毕露，一口咬定杨子荣是“共军”，整个场面就更加紧张起来。可是杨子荣胸怀朝阳，临危不惧，机智勇敢，抓住栾平不敢说出曾被我军俘虏的心理，先发制人，步步紧逼，又利用座山雕与侯专员的矛盾，激起座山雕对栾平的怀疑和憎恨，对敌人进行分化瓦解，终于化险为夷，克敌制胜。并利用已经赢得的有利形势，借座山雕的枪处决了栾平，使整个作战计划得能按照预定方案进行下去，夺得最后胜利。这段情节，犹如重峦叠嶂，层层推向高峰，步步紧扣人心，生动地反映了当时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杨子荣的光辉形象也因此得到充分的表现。

从这里我们可体会到，波澜曲折一定要符合现实斗争的规律，符合情节发展的逻辑，符合人物的性格，而不能凭主观的臆想任意虚构。这就要求在构思时必须根据现实生活本身的矛盾斗争及其发展规律来选择和安排情节，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才能曲折生动而又自然合理。

波澜起伏，应该以客观事物的矛盾发展为基础，但这并不排斥恰当的艺术加工。相反，当我们根据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通过概括提炼，使它们更集中更典型之后，便应抓住矛盾，充分开展矛盾，并在情节发展的曲折变化处，特别是矛盾发展的关键处多用笔墨，用各种艺术手法把它们强烈地表现出来，使事情的波澜曲折显得更为明显。

例如自传体小说《高玉宝》中“半夜鸡叫”这一节，从玉宝发现“鸡叫”的秘密，向长工叔叔们揭露这秘密，到痛打“偷鸡贼”，整个故事情节都写得很曲折生动。

每天晚上，伙计们睡下不久，鸡便啼了，周扒皮就来赶伙

计们上工。长期以来，大伙儿心里虽很恼火，但也弄不清这鸡为什么啼得这么早。有一天晚上，玉宝在黑暗中发现有人轻手轻脚地走近了鸡窝，这时小说在这里插进了一段关于玉宝心理活动的描写：“这人一定家里没有办法了才来偷鸡，我要喊了，不就坑了他了吗？……玉宝有点替他担心地想：小心点呀！叫周扒皮听见，把你抓起来就坏了。……”小玉宝是如此好心地护着这个“偷鸡的人”，谁知这个偷鸡的人却学起鸡啼来了，玉宝心里怪纳闷的，再一看，这人竟是周扒皮呵！前面这段心理描写，不但反映了小玉宝的天真、富有阶级同情，而且使周扒皮的突然被发现，更加出人意外，更加使人愤恨。这时玉宝满可以上去一把将他抓住，戳穿他学鸡啼明的鬼把戏。但玉宝却是“又一转念，不行……不如把这事告诉刘叔叔和伙计们”。这一“转念”，表现了玉宝的机智，也使情节得以进一步开展。放了周扒皮，正是为了进一步和他斗争，并使周扒皮的丑恶表现得更充分。

然而玉宝并没有马上告诉伙计们。及至伙计们被周扒皮喊醒了，大家气呼呼地边骂边去上工时，玉宝才悄悄地把周扒皮学鸡叫的“笑话”告诉了叔叔们，这一讲，可更把大家气坏了。在这里，玉宝对这件大可气愤的事，不是怒气冲冲地讲，而是当作“笑话”讲，这反映了玉宝对周扒皮这种剥削手段的极端鄙视，在情节发展上，这样写又收到了“欲张故弛”的效果，好象在油锅里泼了一瓢水，使伙计们压在心头的怒火顿时爆发出来，从而引出了“到地头去睡觉”的对抗办法。接着又插入一个周扒皮送饭的故事。周扒皮哪有这样的好心惦念伙计们的饥饱？原来他看伙计们没回来吃早饭，心想“伙计们还一定给我赶活呢，我何不叫人把饭给他们送去，叫他们在山上吃

了，省得来回走，耽误工夫，好多给我铲点地”。不料一到山上，伙计们都在睡觉，他就拿着棍子狠狠地把大家打醒了，又叫老李头把饭担了回去。——这个插曲揭示了周扒皮的剥削心计和吝啬暴戾(力)的性格，也在伙计们满腔怒火的心头添了一盆油，大伙儿因周扒皮又打又骂又不给吃饭，都气得炸开了。这样，通过周扒皮的逼上早工，玉宝的揭穿“鸡叫”秘密，到周扒皮的打、骂、不给吃饭，把伙计们的愤怒情绪一步步推向高潮，形成与地主周扒皮之间的尖锐对立。而就在这时，玉宝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大家一听，都哈哈大笑起来。这办法居然能使伙计们的满腔愤怒化为哈哈大笑，显示了玉宝和伙计们在这场尖锐斗争中的智慧和力量，也使读者怀着急切的心情想看下去——这到底是啥好办法呀？

到“捉贼”一场，受压迫的伙计们化积愤为力量，由消极对抗转为积极斗争，并完全取得了这场智斗与巧斗的主动权，使地主周扒皮落得个搬起石头压自己的脚的结局。伙计们利用周扒皮家立下的“贼来必抓”的规矩，可以满有理由地放手痛打，可以理直气壮地咋呼老东家：“打的就是你，看你再来不来偷鸡！”不但自己打，还可以叫他的儿子来打老子：“保长呀，快起来，有贼啦……”，更妙的是这一叫又把在西厢房睡觉的鬼子军官叫了出来，而且用他的手枪叭叭两枪把周扒皮打得鲜血直流，叫周扒皮顾头不顾腚，直往鸡窝钻，弄得满脸是鸡屎，有苦讲不出，真是大快人心。

“抓偷鸡贼”是整个故事的高潮和中心。但前面几处心理活动的描写，可抓而不抓的计略，“地头睡觉”和“周扒皮送饭”的插曲等，都是为这高潮和中心服务的，为高潮的出现作了合理的烘托与铺垫，也使情节的发展更见得有波澜。如果玉宝

一发现这是周扒皮学鸡叫,马上喊起伙计们来打,或者在山上大家合力把老吸血鬼痛打一顿,这样也未尝不可以解解大家心头之恨,但整个情节就缺乏起伏变化,也就不可能出现最后的一场高潮。而在最后一场中,如果一下子就把周扒皮整住,就不能充分开展矛盾,不可能把周扒皮的丑态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也就不可能充分表现出伙计们在这场斗争中的主动地位、战斗的智慧、团结的力量和胜利时的痛快心情。所以,抓住了矛盾,还必须尽可能调动各种艺术手法,引人入胜地写出这矛盾发展的曲折变化,这样才有利于表现作品的主题和人物的性格。

再如《水浒》中“武松打虎”这一节也写得很生动。小说先写武松的惊人的酒量,喝了十八碗烈性酒,再写酒店伙计对他的劝告,又写他三次看到县府通告冈上有虎的榜文,但他都若无其事;这些都为其后打虎的高潮作了烘托与铺垫。及到将临高潮,却又以“欲张先弛”的笔法造成一种不平常的宁静气氛:一路上冈来,但见空山落日,只道:“那得什么大虫,人自怕了,不敢上山。”请看,一场与猛虎的遭遇战,作者不是先来创造紧张险恶的气氛,却写出一片山自安宁、人自镇静的情景。这种欲张先弛的写法,不但是为了突出武松的大胆,也使吊睛白额虎的突然出现,造成猝(cù 促)不及防的紧张形势,使仓卒应战的武松显得更为勇猛。接着写武松与猛虎搏斗,使故事陡然进入高潮,但作者又不是马上写他如何打得准、打得狠,一口气把老虎打死;却写他一再躲闪,正在紧急处,偏偏又一棒打在枯树上,将哨棒断做两截,从而把情节进一步推往险处,形成险上加险的局面,使读者全神凝聚,关注着武松的命运。而这意外的失手,又使武松不得不陷入与猛虎徒手搏斗的困境;

通过徒手搏斗，终于打出转被动为主动的优势。在这段过程中，作者集中笔墨写猛虎的扑、掀、剪、咆哮、挣扎，直到最后动弹不得；写武松一再躲闪，一棒失利，到赤手空拳尽平生之力揪打，直到把老虎打死。两者反复较量，几经曲折，使矛盾得到充分开展，武松的性格特点也从而得到充分表现，故事也就能始终紧紧攫(jué决)住人心。

有些作品所以会写得呆板平淡，往往是由于作者把事物生动曲折的发展过程看得太简单了；或者是抓不住矛盾，刚一接触，马上回避，草草收场，不能使矛盾得到充分开展；或者虽然能抓住矛盾的发展，但只知平均用力，不善于在关键曲折处多用笔墨，借各种艺术手法把事物矛盾的生动性和复杂性充分表现出来，结果形成平铺直叙，使人看了乏味。

文艺作品是如此，那末，其他文章是否也可写得波澜起伏，引人入胜呢？前面讲到，波澜起伏是客观事物的矛盾曲折在文章中的反映，因此，别的文章也可以做到这样。例如《到实践中去求真知——桑毛虫皮炎调查的体会》^①这篇文章虽然从头到尾用的是朴素的顺叙方式，但作者不是平铺直叙，而是在深入群众、反复调查研究和科学实验的基础上，抓住认识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透过现象迂回曲折、步步深入地探索桑毛虫皮炎的秘密：当前流行的皮炎，是螨(mǎn满)这种小虫所咬而引起的吗？可是患病群众反映根本未被虫咬过。那么，又是什么呢？是桑毛虫吗？为什么有的人接触桑毛虫的毛后发病，有的人却不发；有的部位发，有的部位不发？原来桑毛虫身上的毛有刚毛、毒毛，接触刚毛不发皮炎，凡接触到毒毛都引起皮炎。但为什么把皮炎组织切片放到显微镜

^① 载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文汇报》。

下却找不到毒毛呢？为什么在几十个患者中，只有一个小孩身上找到毒毛呢？毒毛又怎样到人身上的呢？……文章有时以直接提问的方式，引起人们的注意，有时忽因线索中断而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悬念，有时遇到意外情况而使人迷惑，有时以科学的分析消人疑团，读来真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这里的“曲折离奇”，正是通过反复调查研究，反复实践检验，不断排斥表面现象，剔除偶然因素，抛弃错误设想，逐步获得真知的过程。文中每提出一个疑点，分析一种可能，获得一次进展，都一一体现了从“不知”到“知”的过程，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实践出真知的道理，又能使读者体会到其中的曲折与甘苦。

事物的发展常常不是一帆风顺的。这就是说，生活本来就是波澜曲折，充满矛盾斗争的。生活的洪流也总是汹涌澎湃的。文章要写得有波澜，这正是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所以，要避免平铺直叙，首先要能看到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曲折、起伏变化，把它们加以概括集中，抓住关键，然后以适当的艺术手法，把事物内在的这种矛盾、曲折、起伏、变化强烈地显示出来。我们常见的许多艺术手法，如结构上的出人意料的情节安排，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情节开展，各种必要的穿插（包括心理描写、环境描写、事件的插叙等），欲张故弛、欲扬先抑等笔法，及渲染、描绘、烘托、对照等手法的运用，等等，都有助于打破章法的平板，使事物的内在矛盾更明显地反映出来。但各种艺术手法莫不来源于生动复杂的客观现实，特别是阶级斗争的现实，并为反映这些矛盾和斗争服务的。所以归根结蒂，文章要写得生动，关键还在于作者要能熟悉“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这样在写作时才

能根据内容的需要，适当地、创造性地运用各种艺术手法，将人们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生动的斗争生活和崇高的精神面貌深刻地反映出来。

迈好第一步

善跑的健将在起跑时，总是根据距离的远近而决定起步的大小和速度，朝着既定的目标而迈出关系着全程的第一步。写文章也是这样。作者在动笔前心中总要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对所表达的内容要有个统盘的考虑，然后根据主题需要，对准下文角度，为全篇定好调，开好路。开头好，文章就能顺利地写下去；开头不当，往往会越写越别扭。

只要我们对各种文章稍为留意一下，不难发现，开头可以而且应该是各种各样，不拘一格的。在记叙性文体中，可以从一开头便介绍人物的姓名、身份、环境入手；也可以从某一个场面的描写开始；或用倒叙形式把结局调到前面来写；如果作者想先谈谈自己的写作意图或抒发自己的感想也无不可。在论说性文体中，可以开门见山直接摆出自己的论点或对方的论点，然后进行分析、论证，使读者一开头便对中心问题有明确印象；也可以从讲故事、打比方入手进行论述，以引起读者的思索；如果问题比较复杂，则可以将全文的主要内容或有关方面的情况作简要说明；有必要的话，还得把时代背景、现实意义等介绍一下，以帮助读者理解文章内容。总之，开头并没有固定的写法，要根据具体情况创造性地去探索适当的形式。但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都需要注意开头与整篇的关系。开头要想到后面，为全篇的开展迈好第一步。

好的开头，第一要切题，第二要生动。二者不能截然分开，而切题更为重要。

所谓切题，就是说要与主题或主要内容有密切关系，不要偏离，更不要游离题外。细说来，又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开头便揭示主题或尽快接触主题，不要兜圈子，不要让各种无谓的文字挡住甚至扰乱读者的视线；一是虽不直接表明主题，但实与主题血肉相联，与总体密切结合，是全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是可有可无的帽子。

《要反潮流，不要随大流》^①这篇大批判文章，一开头便摆明了作者的观点：

在一种错误倾向出现的时候，是敢于反潮流，还是甘于随大流，对我们每个共产党员来说，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高不高、无产阶级党性强不强的严峻考验，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试金石和分水岭。

《坚持革命坚持进步就是胜利——记昔阳县最近两年在路线斗争中的事迹》^②这篇通讯，一开头就揭示了主题：

山西省昔阳县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最近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回顾过去两年所走过的道路，都有一个很深的体会，这就是：坚持革命，坚持进步，就是胜利。

这种开门见山的写法，好处就在能使读者一看就明白文章所要说的基本观点，简洁明了，亲切易懂。有些文章一开头便喜欢空发议论，或作烦琐的交代，或作冗长的描写，结果等

① 载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文汇报》。

② 载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

于在读者眼前设置重重障碍，使人产生“雾中看花”、“隔靴抓痒”的感觉。

当然，不是说所有文章都以一开头便摆明观点、揭示主题才算切题，有些文章开头之所以意味深长、引人入胜，却正因为它不是简单地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而是根据阐明主题的需要，从有关问题入手，谆谆善诱，步步接近中心。如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开头是以人都要从幼年到老年到死亡的过程，来说明阶级、国家、政党也都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入大同境界。但需要时间和条件。资产阶级怕说自己的阶级、国家、政党的消灭，而我们则公开宣称，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造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消灭这些东西的条件。然后文章回顾了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说明我们只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派的种种谬论，宣称我们就是要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最后才论述到问题的中心——什么是人民民主专政和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性。这样开头，看来“源远流长”，其实恰似浩浩江水，奔腾千里而一脉相连。文章开头把问题提到人类远景上来说明，这正是教导我们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来认识当前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意义。

所以切题不切题，不在于是否在开头便摆明观点，而在于一开头是否就对准问题核心。好似以箭射的，若对准靶心，虽百步亦能中的，否则，近在咫(zhǐ 止)尺亦不能中。

好的开头，还处处与全文相照应，成为开展全文的有力基础。例如《“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①的开头：

^① 载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

今年春天，在昔阳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昔阳县去年整整大旱了一年。接着又是一冬无雪，一春无雨。持续十七个月的干旱，使县内五条大河断流，水库大部干涸（hé 河），百分之八十的土地因为含水量太少而难以开犁下种。但是，严重的干旱，并没有吓倒昔阳人民。他们抢时间，争速度，在四、五月份的五十天时间里，挑水二千六百多万担，适时地刨坑点种了二十二万多亩玉米、高粱和谷子。

这个开头，以极概括简练的语言叙述了昔阳“大旱”的严重灾情，交代了昔阳人民“大干”的艰苦环境和条件，介绍了“大干”的光辉业绩，对表现昔阳人民战天斗地的精神面貌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为全文叙事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亦为文中的议论提供了依据：正因为是“整整大旱了一年。接着又是一冬无雪，一春无雨”这样持续十七个月的大旱，所以在人们面前就出现了“是靠天等雨，还是靠人大干”这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昔阳县委决心丢掉任何幻想，号召人民继续发扬“天大旱，人大干”的革命精神，于是出现了“千里百担一亩苗”这样人定胜天的光辉事迹。正因为是以这样的“大干”，战胜了这样的“大旱”，所以昔阳人民在战胜了天灾的同时，也战胜了那些不承认“奴隶们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论者。正因为是这样的“大旱”，人们不难想象，在昔阳，水，是多么珍贵。但在贫下中农眼里，更可贵的却是以大局为重，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的共产主义风格。……全文有许多地方都与开头所提供的情况密切相关。这样的开头就显得与全文血肉相连，一脉贯串，简洁扼要而意义深长。

开头不仅要求切题，而且还要求尽可能做到生动新颖，不落常套，有独创性，能引人入胜。

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先进事迹，报上曾多次报道，全国人民都十分熟悉，但《好八连三进南京路》^①这篇通讯，读起来仍使人感到十分新鲜。作品除了能从新的角度写老传统外，它的结构形式也很新颖，特别是开头更为别致：

一九七二年早春，上海下了一场大雪。

黎明前，副连长戴大喜披上棉大衣起来查铺，战士们个个睡得正香。他蹶(niè 聂)步走近窗前，突然望见窗外飘着鹅毛大雪。“呵！瑞雪兆丰年。”第一个闪念之后，紧接着第二个闪念：南京路是交通要道，可不能让雪积起来。一声哨子响：“扫雪！”战士们一个个从热被窝里跳起来，拿扫帚，扛铁锹，生龙活虎地奔上南京路。

一会儿，市民们也跟战士们并肩战斗了。人们边扫边问边议论——

他们是谁？似曾相识又面生，真象当年南京路上的好八连。

通讯的开头，通过这个清晨发生的扫雪的小故事，深刻地反映了人民子弟兵与人民休戚相关血肉相连的鱼水之情，又从扫雪时人们的议论，一下子把好八连介绍给读者，使读者感到十分亲切，而且仿佛也参加了议论的行列，打心里惊喜地问道：好八连又回来啦？！

散文《钟》^②的开头也很生动：

① 载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② 见散文集《珍珠赋》，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当当，当当……

湛(zhàn 战)蓝的天空刚刚透出一抹光亮，温榆河两岸，便响起了一片钟声。

在这广袤(mào 帽)无垠(yín 银)的平原上，虽说村村有钟，但专门铸造的并不多。河东，是个炮弹壳壳“钟”；南桥，是个钢轨“钟”；杏林的“钟”呢，是一段铁管子。不过，最罕见的，还要数梨园了。

初到梨园的人，走过村前的大柳树，看到吊在树杈上的村钟，准得惊异地说：

“呀，是个水车轮盘呐！”

这时，热情的乡亲，就会自豪地讲起它的来历。看，炮弹壳“钟”，钢轨“钟”，铁管子“钟”，这已经是够新鲜而有意义的了，但最罕见的还要数梨园的，那到底是什么钟啊？水车轮盘怎么会变成钟啊？读者不禁会在脑海里产生一连串问题，急于想看下去。

各式各样的文章，有各式各样的开头。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可发现有些文章开头所以生动新颖，不落常套，最主要的一点，在于作者能从事物的某些特点着眼，从自己的独特感受着手；其次，是善于启发读者的想象，让读者自己去想见其情状，进入其境地，思考其问题，这样才能引人入胜。如《好八连三进南京路》正是根据二十三年来好八连成员多番更换而精神不变的特点，以一个小故事引起人们“他们是谁？似曾相识又面生”的悬念。《钟》的作者，正是对劳动人民创造性地使用这些“钟”有特别新鲜而深刻的感受，才能在丁丁当当各种“钟”的合奏声中介绍这水车轮盘的来历，这就比单从水车轮盘说起动人得多。再就大家所熟悉的鲁迅的《祝福》来说，

这篇小说的开头所以有巨大吸引力，不仅在于写出了鲁镇除夕的热闹气氛以衬托祥林嫂的悲惨结局，更主要的还在于通过鲁镇和鲁四老爷寓所的描写，勾画了封建社会的缩影，并在这背景下安排了“我”和祥林嫂在河边的一段关于灵魂有无的对话，让读者一起来思考：是回答她“有”好，还有“没有”好呢？祥林嫂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的问题呢？从而更深地去体会祥林嫂这种生无告慰、死亦摆脱不了痛苦的悲惨处境，更深地去思考迫害祥林嫂的是一种怎么样的社会力量，也让读者带着一种隐隐的然而沉重的不祥预感来倾听小说关于祥林嫂命运的诉述。

开头确是要花些功夫的。但这也没有什么神秘。只要我们写作时能从主题的要求和题材的特点出发，在“胸有全局”的基础上，从自己感受最深之处入手来考虑，是不难找到合适的开头的。

最后的冲刺

跑步将近终点时，如果以为即将胜利了，马虎一点也不妨，结果就会功亏一篑，导致最后的失败。因此优秀的运动员总是全力以赴地进行最后的冲刺，以最大的努力去争取胜利，创造优异的成绩。我们写文章写到结尾处也应如此，要全力以赴，争取文章有一个最理想的结束。

一篇文章结尾的好坏，对突出主题，深化思想，加强文章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有一定的作用。结尾好，全文为之增辉；结尾不好，就会美中不足。所以认真的作者对待结尾决不肯掉以轻心。

结尾也是各式各样的，应与整篇的内容和形式相适应。一般来说，结尾主要应从下列两方面来考虑：

第一，要有利于突出主题，深化思想，帮助读者加深对文章的理解和感受。

小评论《提倡“找米下锅”》^①评的是这样一回事：安徽芜湖造船厂船体车间想造一个焊接平台，但没有材料——“无米下锅”；厂领导要他们等有了材料后再造——“等米下锅”。这样，十几年过去了，平台还毫无踪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大大激发了工人的积极性，他们提出要主动“找米下锅”，结果大家利用废料，奋战四天，终于把平台建

^① 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三年第三期。

成了。

文章指出我们应该当革命的“动手派”，找米下锅。假如“缺米”时双手一伸，向上要“米”，或胳膊一抱，坐等“米”来，都是缺乏工人阶级主人翁思想的表现。在论述了应该“找米下锅”，不应“等米下锅”之后，最后结尾处写道：

“找米下锅”与“等米下锅”只有一字之差，却反映了两种世界观的斗争。“等米下锅”，不仅往往等不到“米”，而且越等人们的革命意志越消沉。“找米下锅”，越“找”人越勤，革命精神越旺盛。工人们说得好：“找米下锅”找来的不只是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找来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

文章最后把这种现象提到世界观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上来分析，指出“等”与“找”虽只一字之差，却是两种世界观的反映，引导读者从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度来认识问题，更加突出了“找米下锅”的重大意义，使全文的主题显得更为明确、深刻。

我们写文章是为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为了加强文章的战斗性，文章的结尾，不但要有助于主题的鲜明突出，而且还应该有力量。有些文章在结尾处常常以火热的阶级感情和磅礴的革命气势给读者以有力的鼓舞，或者集中火力，以冲决一切的气概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鲁迅的文章就往往有这样的特点。例如《灯下漫笔》^①，在抨击了吃人的旧社会后，最后向青年们发出了战斗的号召：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

^① 见《鲁迅全集》卷一，《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又如在《忽然想到(五至六)》^①中，鲁迅痛斥了反动势力对新生力量的压制，最后厉声疾呼：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在这里，鲁迅几乎是把自己对反动势力的深切痛恨，对被压迫人民的热忱关怀，对革命青年的殷切期望，全都熔铸在一起了，从而迸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成为全篇的最强音，使文章在打倒孔家店，铲除旧礼教的革命运动中，发挥了强大的战斗作用。

《天下大乱形势大好》^②这篇评论文，以马列主义观点，阐述了今天的世界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天下大乱，正是这个时代的各种基本矛盾愈益激化的表现。最后结尾处写道：

“山雨欲来风满楼”。在世界进入一九七四年的时候，各种矛盾继续激化，世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风暴更加猛烈了。新的一年，将是一个更加激烈动乱的年头。

在这个动乱的世界中，人民战士犹如暴风雨中的海燕，展翅翱翔，呼唤风暴的来临。他们在动乱中失去的只是枷锁，而得到的将是一个新世界！

这个结尾，不但对全文作了有力的概括，而且以充满无产阶级

① 见《鲁迅全集》卷三，《华盖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② 载一九七四年一月十日《人民日报》。

激情的诗一般的语言,展示了斗争的前景,给斗争中的人民以巨大的鼓舞力量。

从前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结尾的力量,决不是来自空洞的口号或激昂的言词,而是来自无可辩驳的逻辑结论,来自作者强烈的阶级爱憎。只有这样,才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第二,要生动、含蓄、发人深思。

结尾要给读者留有余地,使读者看完后忍不住要去回味,琢磨,思索,唤起想象和联想。这样,读者所受到的启发和获得的印象就可能更为深刻。读过鲁迅《故乡》的人,对它富有诗意和哲理的结尾,总是久久难忘: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
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这段结尾告诉人们一个真理——路是人走出来的。它表现了作者对新生活的憧憬,同时又发人深思,鼓舞人们在没有路的地上去闯出新的道路,寻找新的生活,意义深远,含蓄有力。

《比赛》^①这篇短文的结尾也写得很有意思。文章写的是红卫兵小将参加三夏劳动的一个片断。开始是写“我”与阿根哥的割麦比赛,结果“我”因割破了脚而被迫下“火线”了。没多久,天空突然阴沉下来,暴风雨即将来临。顿时打谷场上人声如潮,社员们畚的畚,掬的掬,扛的扛,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抢着把麦子搬进仓去,“我”也不顾脚痛,积极投入战斗。这时,原先“我”与阿根哥的比赛,就变成了“我”、阿根哥和贫下中农

^① 见《中学生记叙文讲评》,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跟“天”的比赛。结尾处写道：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柴多火焰高。”场上的小麦，很快就运进了仓库。霎时，一道闪电划破天空，接着“轰隆隆”雷声震耳，一会儿，“哗哗哗”大雨倾盆而下。但经过一场比赛，大家兴高采烈地说：“老天，下吧，你输啦！”

这结尾的第一句，非常概括而生动地反映了群众同心协力热气腾腾抢收麦子的过程。“霎时……；接着……，一会儿……”一句，有声有色地写出了雷雨来临时的速度和声势，虽然如此，但它还是赶不上人们抢场的速度，可见群众的干劲和力量，也可见胜利时的喜悦心情了。这个结尾虽极简短，但很能发人想象。使人仿佛又一次看到了抢收时那种紧张而热烈的场景和气氛，仿佛看到社员们挥着汗、喘着气但由于麦子已进仓而感到十分轻松愉快的神情，仿佛听到他们怀着胜利的骄傲讪笑着老天：“老天，下吧，你输啦！”这声音是那么响亮，那么豪迈。这一句点明了“人定胜天”这一深刻的主题思想，使人读后感到：这是一场多么有意思的比赛呵！

如果把这个结尾改为：“经过一场奋战，大家终于赶在雷雨之前胜利地完成了抢收任务。”那就要差劲多了。

从前面两个例子可以看出，结尾要写得生动含蓄、发人深思，必须注意两点：一、结尾的意思应是从前文自然引申出来暗示给读者的。这样，作者不必明言，读者却能意会。二、结尾的语言要力求具体形象而又概括凝炼。因为读者的思维和想象是不能凭空产生的，要依靠作者以具体形象的语言表现一定的客观事物，为读者提供产生思维和想象的基础；而这语言又必须是概括凝炼的，这样才有启发性，可让读者通过反复

吟诵、思考，深刻体会其中含义。

有的作者常喜欢在结尾处用上一个删节号，仿佛有很多意思要读者去思考、领会似的。但仔细读后，却又体会不出更多的意思。因为文章的“余意”、“余味”，不是靠删节号能代替的，而要靠语言文字给读者以启发和暗示。还有的作者，唯恐读者不能领会，喜欢把话讲尽，甚至不厌其烦，讲了又讲。如有一篇文章，写的是一个生产队长的先进事迹。文章已经通过这位生产队长自己的言语行动，说明他如何勤奋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坚决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带领社员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深入群众，关心集体，重活累活干在前，……。从人物刻画来说，这老队长的形象是有不少感人之处，但作者好象总不放心，唯恐读者不领会，到结尾处又把人物的性格特点概括地介绍了一遍，并说自己是如何如何地受到感动和教育。这样的结尾就是“画蛇添足”了。所以我们写文章一定要相信读者的想象和思考能力，给读者留有思索的余地，让读者通过结尾的启示，领会到更深刻、更丰富的意义。

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

学习语言,首先,“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群众的语言,是一个巨大的宝藏,它丰富、生动,很有表现力。它是文学语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

今天,我们写文章是为工农兵服务,这就要求我们要努力地学习人民群众的语言。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情况确是这样。如果我们脱离群众,不熟悉工农兵,不懂他们丰富而生动的语言,这样写出来的文章,必然是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词儿,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甚至还会关在小房间里“闭门造车”,生造出一些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这样的文章,工农兵群众肯定不爱看。

对人民群众语言,学与不学,大不一样。有一所城市里的中学,语文课上要学生写一篇作文,反映贫下中农在旧社会的悲惨生活。然而学生们对农村并不了解,可以想象,文章怎么能写好呢?其中有一篇作文,这样写道:“当旧社会还被反动派进行统治的时候,贫下中农生活十分苦,被地主十分厉害地剥削和压迫着。……”后来教师修改成:“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贫下中农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饥寒交迫,衣服褴褛,受着地主阶级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修改稿比原稿句子通畅,

还用了一些成语,这虽也略为提高了一点表现力,但基本的路子没有变,“学生腔”没有变。在课堂讨论中,师生们对这两稿都不满意,认为写得抽象、空洞,没有血肉。于是他们就结合学农,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向贫下中农学习。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了解了过去农村的许多情况,受到很大的教育,也学习到了许多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后来再回过头来修改那篇文章,文章就大大改变了面貌。他们用了许多人民群众语言,使文章有了生气。例如,用“风扫地,月点灯”“吃的猪狗食,干的牛马活”“汗水掉在地主的田埂头,泪水落在自己的灶前头”来形容“饥寒交迫”“水深火热”,用“厚的地方千层布,破的地方肉裸露”来代替深奥难懂的“衣服褴褛”,用“穷苦人头上两把刀:租子重,利息高”“粗糠里要挤出水,石头里要榨出油”来说明“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经过社会调查和集体讨论,这篇文章就修改得比较深刻和生动了。

运用人民群众语言,要进行必要的加工和提炼,注意语言的纯洁健康,力求规范化。人民群众语言是丰富的、生动的、富有表现力的,但当它还未经过加工时,也包含着粗糙不纯的成份和暂时的、偶然的東西。例如谚语、歇后语,绝大部分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内容健康、形式活泼、富有风趣;但也有一部分反映着落后的思想意识,这就需要加以淘汰,或者只是在某些特定的场合下(如刻画具有落后思想的人物时)使用。我们写作时,要从人民群众语言中汲取养料,提炼精华,剔除糟粕,不能单纯记录,生硬套用。

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还要正确处理方言土语的问题。写作中适当地吸收方言土语中一些生动活泼、富有表现力的因素,对丰富语言是有帮助的。某一地方性的概念,在全民语言

中没有相当的名称,或者虽有相当的名称,但不能准确地表达出地方色彩和感情色彩,这时使用方言土语就是合理的。但是,一般说来,在文章中对方言土语的应用,要严加控制,不宜滥用。过多地采用方言土语,特别是那些生僻的语汇和特殊的语法,外地人就不容易懂,这会影响文章的宣传效果和民族共同语的推广。例如,四川方言中的“锅魁”(烧饼)“抄手”(馄饨),北京土话中的“油毛窝”(雨鞋)“取灯儿”(火柴)等,只是在特定的地区通行,而在普通话里有完全同义的词可以代替,就不应该写进文章里来了。广东话说“畀钱你”(给你钱),苏州话说“济南到快哉”(快要到济南了),这种语法结构,别的地方的人就不懂。有一位作家在小说中用北京土话写一个人“从凳子上出溜下去了”,(意思是说,这个人突然病了,从凳子上滑了下去。)有位外地的读者写信去质问那个作家:“这个人溜出去了,怎么还在屋子里?”这种误解,就是由于滥用方言土语带来的后果。

革命样板戏在吸收人民群众语言方面,创造了成功的经验,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革命样板戏的文学语言,朴素自然,清新明快,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生动地反映了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思想感情、性格特征和时代气息。例如《龙江颂》中江水英在《为人类求解放奋斗终身》这段唱词中有这么两句:“咱怎能好了疮疤忘了痛?更不能饮甜水忘记掘井人!”江水英用这两个通俗而深刻的谚语来教育大队长李志田,不要忘记三年前龙江村遭到大水灾时,帮助重建龙江村的阶级弟兄的深情厚谊,不要忘记毛主席的恩情,启发李志田懂得“为人类求解放奋斗终身”这个道理,认识本位主义思想的错误和危害。又如在《红灯记》

中，李玉和用“你我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啊！”这句铁路工人中流行的俗语，拒绝了日本侵略者鸠山的甜言蜜语的拉拢，同鸠山划清了鲜明的敌我界限。当鸠山推出叛徒王连举来诱降，并用“刑法无情”来进行威胁的时候，李玉和用“水中捞月一场空”这一民间歇后语坚决回击了鸠山，告诉敌人：你软硬兼施，威胁利诱，一切都是白费！表现了李玉和正气凛(lǐn)然、巍然如山的革命英雄气概。在《海港》中方海珍对韩小强说：“码头能停万吨轮，为什么拴不住你的心呢？”这是从工农兵语言基础上引发出来的精警语句，用的是码头工人普通的语言，却包含着丰富的含意，体现了方海珍对韩小强这个工人后代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革命样板戏剧本的文学语言，既来自群众，又作了认真的概括和提炼，因此，显得简洁、凝炼，而且读起来铿锵有声，富有节奏感。例如，在《杜鹃山》中，柯湘洞察到隐藏的阶级敌人温其久的阴谋活动，就对战友们“意味深长”地说：“蚂蚁上树，预示着满天风雨，蝼蛄钻洞，能毁掉百里长堤。”《龙江颂》中江水英说过一句体现“龙江风格”的警句：“手心手背都是贫下中农的肉，山前山后都是人民公社的田。”这些语言，都是生动活泼、具体形象的群众语言，经过提炼概括，就更加谨严、流畅、优美，更富于音乐性。这样的语言已经不是人民群众语言的自然形态，而是经过加工的文学语言了。这样的文学语言，源于群众语言，又比实际生活里的语言更精练，更规范，更富于表现力。

要学习人民群众的语言，必须深入生活、认真改造世界观。同志们都读过一篇很有教育意义的人物通讯《拉革命车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记无产阶级优秀战士王国

福》。据写这篇通讯的同志说，这篇文章的前几稿，在文字上下了很大功夫，但词藻华丽，空论很多，缺乏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显得浮泛、枯燥。后来他们深入王国福同志所在的大白楼生产队，向贫下中农学习，把稿子念给老贫农听，虚心地征求他们意见。例如形容大雨成灾后的情景，原稿写的是“白水汪汪，茫茫一片”，老贫农说：“我们这儿不这样说。都是说‘蛤蟆撒尿也成涝’，沟满壕平，到处是水。”又如写王国福同志动员大家注意节约，原稿上写得很干瘪。老贫农说：“这不象老队长的话，老队长讲节约的时候都是说‘一个钱要掰(bāi)成两半儿花’！”原稿堆砌了许多形容词，也没有把王国福同志的高大形象描绘出来，老贫农几句话就把王国福同志艰苦奋斗、一心为公的崇高品质勾画出来了。他们说：“王国福同志当干部，没有睡过一个晌午觉，没有多吃过集体一口粮，没有多拿过公家一根草。干重活，他总是第一个；分东西，他总是最后一个。……”写这篇通讯的同志深有体会地说：“到群众中去改造文风很重要。文风的问题实际是世界观的问题，是向英雄学习，改造自己，还是按自己的面貌去塑造英雄形象的问题。……‘改换语言’是典型报道中必须进行的一场革命。”

的确，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必须深入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和工农兵打成一片，认真改造世界观，虚心当群众的小学生，学习工农兵中的先进人物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质。只有这样，才能熟悉人民群众的生活，理解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才能学会人民群众的语言。

叛徒、卖国贼林彪，根本没有创作实践的经验，也不懂写作的规律，却要冒充内行，大谈什么搜集词汇的方法，胡诌什么“研究什么问题，写什么文章，就搜集什么词汇”。这是典型

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方法，是旧社会的“现贩现卖”的生意经。他还形式主义地把词汇比作苏州刺绣的丝线，“颜色的花样很多”，写文章就是“选出那些浓淡相宜的颜色，‘织’成最美好的作品”。他根本不谈作者世界观改造的问题，不谈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谈作者的思想感情问题。根据他的“词汇万能”论来写文章，必然是堆砌词藻，华而不实，装腔作势，无病呻吟，一定会写出危害革命的大毒草！林彪所宣扬的这套谬论，是诱骗知识青年在写作上“投机取巧”、步入歧途的所谓“捷径”，对他的这一套，我们坚决把它丢进垃圾箱里去！

语言要明确、简洁、生动

写文章，主要的是要有正确的立场观点、丰富的革命实践和深入的调查研究。此外，语言问题也是十分重要的。

列宁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作为一种工具，刀要锋利，钟表要准确，那么，对写作中的语言应该有什么要求呢？——要求明确、简洁和生动。

一、语言要明确

威廉·李卜克内西曾经这样称赞马克思：“没有人具有比他更高的明确表述自己思想的才能。语言的明确是由于思想明确，而明确的思想必然决定明确的表现方式。”由此可见，我们要达到语言明确，首先必须做到思想明确，具有正确的思想方法，具有对客观事物的深刻了解。

我们写文章，要尖锐、泼辣，旗帜鲜明，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要达到这一步，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就是语言要明确。

初学写作的同志，不注意的时候，有时会写出一些不明确的句子，有时甚至会是非颠倒，违背本意。例如：

①密切联系群众，深入调查研究，可以避免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

这句话把意思完全弄反了。“避免”和“不犯”两个之中要删去一个才对。

②解放前，反动政府不修水利，淮河两岸人民常受洪水之害，淹没了万顷良田，夺走了无数的生命和财产。

谁来“淹没了万顷良田”？谁来“夺走了无数的生命和财产”？作者本意是“洪水”，但是字面上的意思却是“淮河两岸人民”，完全违背了本意。可以改为：“解放前，反动政府不修水利，淮河经常泛滥，淹没了两岸万顷良田，夺走了无数生命和财产。”让后面三个分句，都由“淮河”作主语。

写文章要为读者着想，尽量写得清楚明白。有时作者自己心里是清楚的，但是写得不清楚，读者就觉得费解难懂，弄不清作者究竟要讲什么。如：

③过去自己总认为反正把问题说清楚就是了，其实不然，谁不知我的文化水平低呀！

这个句子内部关系不明确，看不出“把问题说清楚”与“文化水平”有什么因果联系，人们读后，一时很难理解作者的原意。

④江南地区因雨水过多，要注意排水工作，雨后要发动社员锄草，以保持土中水分，使土质疏松干燥。

这句话不好懂。一会儿说“要注意排水工作”，一会儿又要“保持土中水分”，又要“使土质疏松干燥”，不知到底是怎么回事。猜测作者的意思，可能是说：“江南地区雨水很多，雨后一方面要注意排水，另一方面又要发动社员锄草，使土质疏松，以保持地下水分”。

有些不明确的话，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这种有歧义的模棱两可的语言，常常会造成误解。如：

⑤这个观点，在最近的一些论文中曾提出了批评，我

认为是对的。

什么是“对的”？是观点对，还是批评对？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作者的本意是想说：“对这个观点，最近的一些论文曾提出了批评，我认为这些批评是对的”。

⑥国棉九厂的女工朱爱霞和上钢一厂的老工人陆子强夫妇到少年宫来了，他俩准备向小朋友们作回忆对比的报告。

读前边时，以为来少年宫的有三个人：朱爱霞和陆子强夫妇。看到“他俩”，才知道朱爱霞和陆子强是夫妇。全句可改为：“国棉九厂的女工朱爱霞和她的丈夫上钢一厂的老工人陆子强来到了少年宫，他俩准备向小朋友们作回忆对比的报告”。

我们反对语言不明确，但要注意，不要把某些修辞手法误当作语言不明确。

例如修辞上的“倒反”手法，说者口头的意思和心里的意思完全相反，有时还含有嘲弄讽刺的意思，这就是通常所谓的“说反话”。《红灯记》中，李玉和与鸠山有这么一段对话：

鸠山 不会喝？唉！中国有句古语：“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哪！正所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李玉和 （鄙视地吹灭火柴）是啊，听听歌曲，喝点美酒，真是神仙过的日子。鸠山先生，但愿你天天如此，“长命百岁”！（讽刺地掷火柴于地）

李玉和讲的是讽刺性的“反话”，是对敌人进行战斗的斗争手法，是对敌人的揭露和打击。这样的“反话”用得很好。

修辞上有一种“婉言”手法，不是正面地、明朗地直说，而是委婉含蓄地表达。如在《沙家浜》中，胡传魁讨老婆，到处敲榨勒索，阿庆嫂当着胡传魁、刁德一的面不便直说，而是说：“刘副官通知各家各户‘自愿’送礼了”。这种表达方式，读者一看就懂，比明朗直说有更好的效果。

还有修辞上的双关手法，利用词语在特定环境中产生的多义现象，同时关照两种不同的事物。这是“一箭双雕”而不是“模棱两可”。《智取威虎山》第八场中，座山雕用所谓“军事演习”来试探杨子荣，匪副官长在旁帮腔说：“可不是吗，我也真当是共军来了呢。”杨子荣机智双关地接着说：“来了好啊，我这儿正等着他呢。”这句双关话，表现了杨子荣在敌人心里斗争的大智大勇，表达了人民英雄杨子荣对革命战友的深情怀念，盼望他们按预定计划准时前来，好与他们里应外合，彻底消灭这股罪恶累累的顽匪。

总之，我们提倡语言明确，反对语言含糊。但是，一些修辞手法的运用，可以增强语言的表达效果，和语言的含糊、不明确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

二、语言要简洁

语言简洁，是无产阶级革命文风的特点之一。毛主席教导我们：“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鲁迅也说：“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

我们有些同志写文章时，常有同义重复的现象，有不少多余的字句。如：

①任何工作，只要是对人民有利的工作，这些工作都

是光荣的工作。

“工作”一词前后出现四次，后面三个是多余的。可以改为：“任何工作，只要对人民有利，都是光荣的。”

②这个村子里早就没有不识字的文盲了，现在又来了一批有文化的知识青年。

“不识字”作“文盲”的修饰语，“有文化”作“知识青年”的修饰语，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应删去。

有的同志写文章翻来复去，噜噜嗦嗦。如：

③在他的思想中，还或多或少存在一些“自来红”的思想，当然并不十分严重，但却是客观存在的，这种思想自己如果不去积极克服并与之进行不调和的斗争，那么它就会长期存在下去，决不会在短时期内自行消失的，那将会妨碍而不是促进他去自觉改造世界观，只是永远背着“自来红”的包袱长期停滞不前，不能进步。

写这篇文章的同志，主观上也许是想写得“全面些”、“严密些”，实际上却很烦琐。很简单的事情，不必讲得那么复杂。可以改为：“他还存在一些‘自来红’思想，这会妨碍他自觉地改造世界观。”

还有的同志写作时语言不朴实，滥用长句子，追求所谓“文艺笔调”、“理论色彩”，结果写得怪里怪气，使语言不简洁。如：

④那位女同志就是谢文静的曾经当过包身工、做过童养媳而今天却是一个纺织厂革委会主任的姐姐。

这个句子，读到后面时，前面的那个相连的成分早已忘记了，势必回过头来再去找它，因此文句不畅，读起来十分吃力。这句话可以用短句子来表达，改为：“那位女同志就是谢文静的

姐姐，她曾经当过包身工，做过童养媳，而今天却是一个纺织厂的革委会主任。”

⑤世界观改造的长期性，这一问题的提出，不是消极的，而是表示世界观改造这一问题的严肃性，及在工作上的主动性和艰苦性。世界观改造对于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时间性，因为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特有的、区别于其他人的环境，由于客观条件的直接影响，形成改造的先后及快慢。

这里出现了“长期性”“严肃性”等五个“性”。有人以为“性”越多，理论色彩就越浓。这是一种误解。“特有的”与“区别于其他人的”，“先后”与“快慢”都是同义重复，可删减。“改造的快慢”不单纯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主观能动性也起很大作用。这句话可以改为：“世界观的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各人因为主观努力和客观环境的不同，所以改造的快慢也不一样。”

我们提倡语言简洁，但这要划清两种界限：一、苟(gǒu 狗)简不是简洁；二、修辞上的反复不是不简洁。

简洁有一定限度，如果过了头，就变成了苟简。烦冗(rǎng)和苟简是两个极端，都是简洁的对立物。毛主席曾经批评一些同志的写作“有时废话连篇，有时又尽量简古，好象他们是立志要让读者受苦似的。”“简古”就是一种苟简。如果不把话说清楚，省略了不应该省略的部分，就会使人看不懂，甚至发生误解。例如，“一九七四年是根据一九七三年的实际情况来拟定的。”这个句子由于苟简之故，以致文理不通。“一九七四年”用不着谁去“拟定”，它是自然会到来的。作者的本意可能是指“一九七四年的计划”吧。

写文章有时候为了要达到某种表达效果，故意利用修辞上的反复手法，这不能看作是烦冗累赘。例如鲁迅先生在《马上日记》中描写北洋军阀横冲直撞的“显赫声势”时写到：

少顷，看见大路上黄尘滚滚，一辆摩托车驰过；
少顷，又是一辆；少顷，又是一辆；又是一辆；又是一辆……。车中人看不分明，但见金边帽。

这里故意利用重复的句子，写出北洋军阀的嚣张和霸道，写出群众对他们的烦腻和厌恶。如果写成“许多辆摩托车开了过去”，效果就差了。这种修辞上的反复与语言的简洁不是矛盾的，而是相反相成，从不同的角度来提高表达效果。

三、语言要生动

文章的语言生动活泼，才能引人入胜，才能为工农兵所喜闻乐见，才能取得最大的宣传效果。毛主席十分重视语言的生动性，教导我们说：“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毛主席还批评说：“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我们写作时要牢记毛主席的这些教导。

要使语言生动，主要的是应该具有朝气蓬勃、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和深厚坚实的生活基础。这是决定性的因素。此外，还应该注意语言表达方面的问题。运用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和语言形象化是使语言生动的两个重要方法。关于学习人民群众语言的问题，上一篇文章已经说过，这里主要谈谈语言形象化的问题。

语言形象化，可以让读者如历其境，如见其形，如闻其声。这样，文章就生动活泼，有生气，有感染力，人们就爱听、爱读。

这里，我们看一段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的唱词：

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
挺然屹立傲苍穹。
八千里风暴吹不倒，
九千个雷霆也难轰。
烈日喷炎晒不死，
严寒冰雪郁郁葱葱。
那青松逢灾受难，经磨历劫，伤痕累累，瘢迹重重，
更显得枝如铁，干如铜，蓬勃旺盛，倔强峥嵘。
崇高品德人称颂，
俺十八个伤病员，要成为十八棵青松！

这一段唱词非常优美，十分感人。如果这里只是说：“泰山的青松很崇高很坚强，我们必须学习它。”就比较抽象，一般化，缺乏感染力量。而《沙家浜》中的唱词却是采用形象的描绘，写泰山青松在“风暴”“雷霆”中的坚强表现，写它在“烈日”“冰雪”中的蓬勃生机，写它在“逢灾受难”后更显得“倔强峥嵘”。通过对泰山青松的形象描绘，热情歌颂了青松的崇高品格。作者用巧妙的构思，隐含的比喻，使读者自然地联想到，这傲然挺立、倔强峥嵘的泰山青松，就是在敌后排除万难坚持抗日斗争的工农子弟兵的英雄形象。

又如鲁迅在小说《祝福》中，写“我”回鲁镇时所见到的祥林嫂：

……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象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

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如果把这一段写成：“祥林嫂比五年前更衰老、更贫穷、更麻木了。”就显得概念化，是一般性的叙述，没有具体的形象。而鲁迅却用具体的描绘，来刻画祥林嫂。对她的衰老、贫穷和麻木是用可感知的视觉形象来表现的：头发由花白变成了全白，面庞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象木刻似的没有表情，只有当她眼珠偶而转动一下时，才知道她还活着；竹篮中的碗不仅是破的，而且是空的；连一根象样的拐棍也没有，只是用一根下端已经裂开的、比身体还要长的竹竿来支撑住身体，她已经完全沦为一个乞丐。这就形象地写出了生活在封建社会里的祥林嫂，在残酷的封建制度和反动的孔孟之道的束缚和迫害下的悲惨遭遇，揭露了封建宗法制度和孔孟之道对人民的精神上的奴役和虐杀。这样的描写对读者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激起读者对善良而勤劳的祥林嫂的无限同情和对万恶旧社会的无比仇恨。鲁迅这里的形象描绘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量。

是不是只有文艺作品中才能运用形象化语言呢？不是。形象化是文艺作品的重要特点，所以文艺作品当然很强调形象化语言。但这并不是说形象化语言只能运用于文艺作品中，而不能运用于其他文体中。例如在说理文章中，形象化语言也是达到生动性的一种重要手段。

毛主席所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题目本身就是一个形象的比喻，预言了革命斗争的光明前途和新生事物的必然胜利。文章的结尾则用了“航船”“朝日”“婴儿”三个形象

来比喻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这段文字象优美的抒情诗，通过丰富的联想，寄托了作者满腔的革命热情和坚强的革命信念，对林彪一类政治骗子怀疑“红旗究竟能打多久”的悲观失望情绪作了有力的批判。

毛主席写评论文章，还往往通过具体描绘，使语言形象化，如在《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一文中写道：

……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佛郎哥、蒋介石等人的政府取消了或者索性不用那片资产阶级内部民主的幕布，是因为国内阶级斗争紧张到了极点，取消或者索性不用那片布比较地有利些，免得人民也利用那片布去手舞足蹈。美国政府现在还有一片民主布，但是已被美国反动派剪得很小了，又大大地褪了颜色，比起华盛顿、杰佛逊、林肯的朝代来是差远了，这是阶级斗争迫紧了几步的缘故。再迫紧几步，美国的民主布必然要被抛到九霄云外去。

这里，把复杂而隐蔽的政治现象作了具体的生动的描写，把资产阶级内部民主比作一片“幕布”，法西斯专政所以要取消这片幕布，是为了怕人民也利用这片幕布去“手舞足蹈”。美国虽然还有一片“民主布”，但是已经“剪得很小”，并且“大大地褪了颜色”，当阶级斗争进一步激化时，这片民主布也会被“抛到九霄云外去”的。通过这样的形象描绘，对资产阶级的虚伪“民主”，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光辉文献《共产党宣言》是这样描

写资产阶级的：

……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这里用了生动的语言，形象地描写出了资产阶级在它取得统治的地方，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资本主义剥削，代替了用宗教幻想和政治欺骗所掩盖着的封建剥削，把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共产党宣言》在批判“封建的社会主义”时写道：

……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做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似乎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声讨资产阶级。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其中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

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这一段写出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当无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时候，被资产阶级暴发户打败了的英国和法国的封建贵族，就趁机出来混水摸鱼，但是他们已没有力量进行严重的政治较量，只好挂出“社会主义”招牌来进行文字斗争，他们装腔作势，似乎是为了工人阶级利益在声讨资产阶级，但实际上他们是在梦想复辟封建制度。由于他们是不合时代潮流的没落者，因而他们的言论和行动都显得滑稽可笑。

《共产党宣言》有许多生动而形象的语言，表达了博大精深的革命内容。

今天，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来改造世界观，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如果同时我们也留心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和准确、鲜明、生动的革命文风，这对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也是有很大帮助的。

抓住本质 击中要害

——大批判文章的写作

革命大批判文章是我们用得很普遍的一种文体，是我们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的有力武器。这种文章要求旗帜鲜明，尖锐泼辣，犹如一把把锋利的钢刀，无情地刺向敌人的心脏。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是取得胜利、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来反对已被打败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绝迹、没有停止反抗、反而加紧反抗的资产阶级。”这就要求我们牢记党的基本路线，运用大批判的武器，不断地向阶级敌人发起进攻。只要阶级斗争还存在，我们手中的大批判的武器就不能放松。我们要在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毛主席指出：“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所以，革命大批判文章的写作是阶级斗争的需要，是革命的需要。

要提高革命大批判文章的质量，最根本的是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增强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

力。同时我们也要掌握写这类文章的一些基本要求。这些基本要求是：

第一，抓住要害

一篇大批判文章的质量高不高，首先要看它是否抓住了批判对象的关键。“打蛇打七寸”，能打在七寸这个要害上，就可以把蛇打死。写大批判文章也是这个道理。所谓要害，就是指集中反映批判对象的反动本质的主要问题。抓住了本质，也就击中了要害。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现象和本质。“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斗争十分复杂，阶级敌人往往打着“红旗”反红旗，故意制造一些假象，把真相掩盖起来。我们在批判的时候，必须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这样才可以把批判对象批深批透、批倒批臭。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写的《林彪与孔孟之道》^①一文，从林彪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以及策略原则等几个方面与孔孟之道的关系，说明反动的孔孟之道是林彪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文章指出，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林彪鼓吹孔孟的反动哲学，是为了反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林彪玩弄儒家权术，是为了在组织上搞分裂、结党营私，在策略上要两面派、搞阴谋诡计。这就抓住了本质，击中了要害，使文章具有强大的战斗力，给予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要抓准要害，就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

^① 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二期。

方法，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这样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比如毒草戏《海瑞罢官》和《三上桃峰》，如果我们不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观点去剖析它们，就会看不清其要害所在，最多也只能发现它们在创作上的某些缺点，作为一般的文艺创作问题来批判。如果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去观察，并同它们出笼的政治背景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到《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三上桃峰》的要害是为刘少奇翻案，它们都不是一般的文艺创作问题，而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可见，抓要害对于写革命大批判文章十分重要。

第二，充分说理

在抓住了批判对象的关键要害之后，还必须通过分析说理，把道理讲清楚，告诉读者它为什么是错误的、反动的，为什么这是它的关键要害所在，叫人理解和信服。我们写大批判文章既要有鲜明的观点，又要有充分的材料，把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用材料说明观点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分析的过程。要分析得好，最主要的是要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锐利武器，进行阶级分析。在这个基础上，还要运用一些具体的分析说理的方法：

1. 摆事实，讲道理

事实胜于雄辩。把客观存在的确凿的事实摆出来，略加分析，就可把谬论批倒。人们常用这种方法开展大批判，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比如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用自己在农村锻炼成长的事实，批判林彪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的谬论；广大“五·七”战士用自己在干校学习锻炼的事实，批判林彪所谓“变相失业”的反动黑话；广大工农兵群众用

自己的革命实践批判林彪的唯心主义的“天才论”以及孔老二的“上智下愚”的反动谬论等等，都非常有说服力。有时我们用批判对象的具体反革命罪行来揭露他的反动本质，也是一种摆事实的方法。例如《林彪与孔孟之道》一文中，揭露林彪在写下“克己复礼”的同时，又告诫他的死党要“当务之为急”，他们的“当务之为急”究竟是什么呢？下面就是事实：

一九六九年冬，林彪亲笔题书“王者莫高周文……”的条幅，挂在床头，自称“人主”，自比“文王”，急于要实现当皇帝的美梦。

一九七〇年，林彪再三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抛出他的反党政治纲领，叫嚣“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急于要当“国家的头”，阴谋篡党夺权。接着，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了未遂的反革命政变。

一九七一年，林彪一伙炮制了《“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急于“夺取全国政权”，并于九月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在列举了这些事实之后，文章分析说：“这些事实充分证明，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是林彪反党集团‘复礼’的首要目标，是他们反革命战略的‘当务之急’。”这段文字摆了事实，又讲了道理，做到了观点和材料的有机统一。

2. 比较法

毛主席教导我们：“有比较才能鉴别。”鲁迅也说过：“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正反两方一经比较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一种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理同反动谬论作比较，用真理战胜错误。比如《林彪与孔孟之道》一文中，在批判

林彪恶毒咒骂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是什么“过分”、“全左”、“做绝了”、“斗绝了”、“乱了套”时，用了毛主席的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揭露了林彪所谓“过分”的实质是用中庸之道来反对革命。

另一种是用历史上或当代的一些反动人物的言行同批判对象的言行作比较，看出他们原来是一丘之貉（hè 何）。例如《林彪与孔孟之道》主要是用孔孟的反动言行与林彪的反动言行进行对比，来揭露林彪的反革命嘴脸的。文章通过大量材料的对比后指出：“剥开林彪的画皮，暴露在我们面前的，正是一副道道地地的孔老二信徒的丑恶嘴脸。”文章在批判林彪鼓吹孔孟之道的反动的人性论，揭露林彪的“人性”的阶级实质时，还引用了蒋帮头目在林彪死了两年后哀悼他的一段话：“林彪……较有人情，这就是孔子的伦理学说潜在人心的佐证。”这个材料用得很有力，充分表明：蒋帮的这种赞扬，对林彪的“人性”是一种绝好的说明，蒋帮和林彪原来是一路货。

还有一种是用批判对象的言语同他的行动作比较。凡是历史上的反动人物，他们的言行总是不一致的，表面上仁义道德，实际上男盗女娼。我们只要把他当面所说的“好话”与他在背地里所说的黑话以及所干的反革命勾当一比较，就可以剥开他的画皮，露出豺狼的本相。比如林彪讲什么“仁爱之心”，可是在《“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中，却凶相毕露，暴露出他们要一口“吃掉”无产阶级、实行法西斯专政的狰狞面目。这样一对比，所谓“仁爱之心”的反动实质不就昭然若揭了吗？

可见，在革命大批判文章中，如果我们能够恰当地运用比

较法,就可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和战斗力。

3. 联系时代背景,分析其阶级本质、政治目的

有时,一句反动的话或一篇反动的作品把它孤立起来看,它的反动实质并不很明显,但如果同它的时代背景一联系,问题就很清楚。例如批判孔老二的“克己复礼”就要同春秋末期我国历史上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社会大变革时期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才可以看清孔老二的“复礼”就是复辟奴隶制社会,要把历史拉向倒退。而要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实质,则要同他在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〇年一月四次书写“克己复礼”的条幅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那时正是我国人民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的时候,正是在党的九大路线的指引下,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党的基本路线进一步深入人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正在这个时候林彪要“克己复礼”,就充分暴露了他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

又例如《三上桃峰》这个戏,为什么说它是为刘少奇翻案的呢?《评晋剧〈三上桃峰〉》^①一文的第一部分就通过对政治背景的分析,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文章指出,《三上桃峰》是从《三下桃园》改编而来的。《三下桃园》的主题是歌颂桃园“社教运动的胜利果”,是为刘少奇、王光美树碑立传,对抗毛主席发出的“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的。这个戏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革命群众的批判。事隔八年,《三下桃园》改名《三上桃峰》又搬上舞台。从《三下桃园》到《三上桃峰》,中心事件没有变,故事情节没有变,基本的人物关系没有变,而惹人注意的三处变动正说明炮制者完全知道《三下桃

^① 载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园》的政治要害，他们作贼心虚，害怕暴露马脚。通过对这一背景材料的分析，有力地揭露了《三上桃峰》的政治要害。这样的批判就打得准、打得狠，真正发挥了革命大批判文章的战斗威力。

第三，联系实际

我们批判历史上的或者当代的反动人物、反动言论，都是为了现实的阶级斗争。马克思曾要求“把我们的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情”。这就要求我们在写大批判文章的时候要密切联系实际。

《林彪与孔孟之道》一文就是把批判孔老二与批判林彪结合得很好的一例。如批孔老二的“克己复礼”同批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联系起来；批孔老二的“天命”论同批林彪的“天才”论联系起来；批孔孟的中庸之道同批林彪反对辩证法联系起来；批儒家的“德”、“仁义”、“忠恕”同批林彪的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联系起来；批儒家的一套反动权术同批林彪的反革命策略联系起来。文章最后说，“深入批判孔孟之道，批判尊孔反法的思想，对于彻底揭露和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对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都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段话说明了批孔的现实意义，也就是把批孔孟之道和批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紧密地联系起来了。

批判历史上的或当代的反动人物、反动言论还必须同批判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实际联系起来。例如有一些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如轻视劳动，蔑视妇女，瞧不起工农群众，看不惯新生事物和新生力量，崇洋复古，以及“开后门”之类的不正之风，这些除了有它们的社会阶级根源外，

都可以从孔孟之道那里找到思想根源。我们在批判林彪和孔老二的反动思想的时候，就要联系实际，进一步肃清这些流毒。在深入批林批孔的过程中，广大工农兵群众对宣扬孔孟之道的《三字经》、《千字文》、《女儿经》、《神童诗》、《弟子规》等所作的批判，都密切地联系了这方面的实际，从而使这样的大批判文章发挥了更强大的战斗作用。

总之，只要能抓住要害，充分说理，联系实际，这样的革命大批判文章就深刻、鲜明，具有针对性和说服力，就能成为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锐利武器。

短小精悍 一事一议

——小评论的写作

小评论,短小精悍,一事一议,形式活泼,语言生动,是工农兵喜闻乐见的一种文章样式。广大群众亲切地称赞它是“土生土长的家乡菜,吃起来合胃口,嚼嚼更有味”。小评论能密切配合党的中心工作,针对群众中出现的新思想、新问题,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是“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的一个好办法。

怎样才能写好小评论呢?这里提出三点来谈一谈。

一、题目定得小

小评论在形式上的特点是“小”。怎样才能写得短小精悍,这与题目的大小关系很大。小评论一般只有几百字或千把字,不可能讲很多问题,也不适宜于评论容量较大的问题。小评论往往是抓住一个具体的思想、一件具体的事情,讲明一个道理,起到以小见大的作用。象《吃吃喝喝决不是小事》^①、《评“熟人好办事”》^②等小评论,它们的题目都定得很小,很具体,这样就容易在较短的篇幅里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把题目

① 载《红旗》杂志一九七〇年第二期。

② 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二年第九期。

改为《狠抓阶级斗争新动向》、《反对不正之风》，就不如原来的具体。因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不正之风表现在各个方面，内容很多，一篇小评论里容纳不了；如果硬要写成千把字的短文，问题就往往说不透。这个道理容易理解，这里就不多谈了。

二、问题抓得准

江苏省东台县六里大队是开展群众性小评论活动的先进单位，他们有一条经验，就是抓主要问题，开展小评论。他们紧密结合革命斗争的形势，抓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抓住有代表性的错误思想，抓住各种先进苗头进行评论，及时表扬先进，批评落后，肯定成绩，指出错误，使小评论发挥了巨大的威力。例如他们在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开展起来以后，有些人认为，“我一不贪污盗窃，二不投机倒把，运动与我无关”，有的管钱管物的人则由于没有很好地领会政策，心里有些紧张。针对这种带有普遍性的思想，他们写了《评与己无关和人人过关》的小评论，指出：开展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是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我们要揪出一小撮挖社会主义墙脚的阶级敌人，同时也要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受到教育；因此不是与己无关而是关系很大；但是，又不是人人过关，谁管钱就找谁，斗争的矛头应当始终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这个问题在群众中进行了广泛的评论，干部和群众很快提高了认识，使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①六里大队的经验告诉我们：小评论只有抓准问题，有的放矢，才能解决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收到实际的效果。如果抓不准问题，把次要问题作为主要问题，把个别问题当作普遍问题，把方法问题当成方向问题，这样写出来的小评论就说不到群众的心坎上，

^① 见《红旗》杂志一九七〇年第二期《小评论威力大》。

犹如隔靴搔痒，不会有很大的效果。

要抓准问题，就要深入实际，了解情况，要有政治的敏感性。当一个先进苗子或一种错误倾向出现的时候，要看得见，抓得住。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围绕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善于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观察和分析问题。如能这样，我们就能够在实际生活中抓准问题，写出有针对性的小评论来。

三、道理说得透

一篇小评论提出了一个问题以后，就要说道理。要把道理说透，首先要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这是写好小评论的关键。

分析好，大有益。分析，首先是作阶级的分析。阶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分析阶级社会一切现象的一种最基本、最科学的方法。例如有的知识青年当了清洁工，由于受了旧思想的影响，觉得“和粪便垃圾打交道，没出息”。到底是有出息还是没出息，很值得评一评。《有出息和没出息》^①这篇小评论评的就是这个问题。文章首先对有出息、没出息的问题作了阶级分析，指出有出息、没出息，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看法。在旧社会，地主资产阶级认为最有“出息”的，就是那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剥削人、压迫人的达官贵人，即剥削阶级的上层人物，而把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人民却看作“没出息”的“贱民”。但是无产阶级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是真正为人民服务，不管干哪一行，都是最有出息的；如果追求个人名利，好逸恶劳，不管干什么工作，都不会有出息。文章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从理论上批驳了那种把劳动分工区分为有出

^① 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三年第六期。

息和没出息的错误观念。接下去又举了一个具体例子，证明上述的观点。这里将理论和具体事例结合起来，就把问题讲得更清楚了。但是文章分析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又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指出：“怎样看待有出息、没出息，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认为对抱有清洁工没出息这种思想的人必须作阶级分析。阶级敌人叫嚷清洁工没出息“是妄图要我们青年去争个人的名利地位，这是地主资产阶级在和我们争夺下一代”；人民内部的某些同志有这种想法是由于受了旧制度、旧思想的影响。对于敌人，我们要及时地批判；对于人民，要启发他自觉革命，并热情地帮助他“清理”掉这种思想。文章对不同的人进行了阶级分析，并注意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样的分析就很具体，很有说服力。

其次，要对事物作辩证的分析。毛主席说：“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矛盾对立的统一，都是一分为二的。分析问题如能把一个事物矛盾着的两个方面都说透了，这样的分析就深刻、全面。

小评论《赞“笨鸟先飞”》^①就是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进行分析的。文章说的是有些文化水平较低的同志，认真看书学习，多读、多问，持之以恒，终于取得丰硕的成果。群众称这种学习精神为“笨鸟先飞”。文章从具体事例引出“笨鸟先飞”，指出笨鸟并不笨，“笨和巧是对立的统一。笨含以巧，巧寓于笨，在一定条件下，无不向自己的反面转化。“笨鸟”转化的条件就是“先飞”。这种“笨鸟先飞”的精神，就是老实态度，就是学习马列主义，不抄“近路”，不找“捷径”，不怕花力气的

^① 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二年第九期。

学习精神，这是作者所赞扬的。接着文章又从“笨鸟先飞”引出“巧鸟后飞”。所谓“巧鸟后飞”就是指某些同志在看书学习问题上，自以为聪明，不愿花力气，不抓紧时间，不刻苦钻研，结果是似懂非懂，收效甚微。文章批判了“巧鸟后飞”的不正学风，实际上也就进一步肯定了“笨鸟先飞”的可贵。把一个事物矛盾着的两个方面都说清楚了，这样的分析也就深刻了。这篇评论从事实出发，就实论虚，以小见大，抓住事物的矛盾对立面进行分析，从个别事例上升到普遍规律，话虽不多，却发人深思。

学会用辩证的方法去分析问题就可以避免片面性、绝对化，避免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例如《干劲和“年景”》^①一文，它批判的是“好收成全靠好年景，成事在天”的懦夫懒汉思想，赞扬的是“好收成主要靠干劲，人定胜天”的革命思想。作者在论述干劲和年景这对矛盾时，强调了“好收成是战天斗地‘斗’出来的，是力争上游‘争’得来的”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文章通过两次同样的年景，而三麦的产量却大不一样的事实说明：要有好收成主要靠“干劲”。但是也不否定“天气的好坏，对农业生产确实是有影响的”这一矛盾的次要方面。文章在批判成事在天，肯定人定胜天的同时，明确指出，干劲必须“要有正确路线的指引”，还强调指出，“大干并不是盲目蛮干”，“要把革命干劲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要总结经验，要掌握自然规律”。而且又进一步谈到，“敢干才能善干”，在实践中才能学会本领，才能认识规律。在强调人的作用时，不否定天的影响；在强调人的干劲时，不否定科学态度的必要性。这样的分析就很全面，没有片面性。

^① 载一九七三年七月三十一日《解放日报》。

有些文章，往往强调了一面，忽略了另一面，这是由于这些文章的作者不善于对事物作辩证的分析，分不清主流和支流，看不到一种倾向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不讲条件，不讲转化，把事物看死了。我们写小评论要克服形而上学的影响，努力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问题。

战斗在三大革命斗争第一线的青年同志，要积极地拿起小评论这个锐利的战斗武器，见到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支持，大力宣传；见到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就坚持批判，毫不留情。让小评论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迅速及时 报道先进

——小通讯的写作

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各条战线上都有激动人心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涌现出来。我们会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用各种形式来宣传这些先进事迹和先进思想，以教育和鼓舞人们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奋勇前进。小通讯，就是我们常用的一种文体。我们称它“小通讯”，是由于它和一般长篇通讯有些不同。那种长篇通讯，如《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铁人王进喜》^①、《“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山西省昔阳县人民抗旱斗争纪实》等往往是通过若干典型事例，比较完整地报道一个人物的先进思想，或一个单位、一个地区在某一方面先进事迹，它们报道的内容较丰富、反映的面也较广。而小通讯则较短小简练，便于更迅速及时地反映现实生活中的新人新事。小通讯有以写事件为主的，也有以写人物为主的；写人物为主的通常也叫小故事。小通讯由于篇幅短小，生动活泼，写起来快，看起来也省时间，因此深受工农兵的欢迎，被称为新闻体裁中的“轻武器”。

小通讯在写作上有些什么要求呢？

一、要迅速及时

^① 载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小通讯在报纸上常常三、五篇一组地从各个侧面报道现实生活中的新人新事新气象,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新面貌,或配合“重武器”(如典型报道,调查报告等)全面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因此小通讯要紧跟形势,迅速及时地反映情况,密切配合当前中心任务,以期收到更好的宣传效果。

如一九七三年三秋大忙季节,《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小通讯《路线指方向,“三秋”搞得好》^①,报道了金山县兴塔公社兴塔四队向社员进行路线教育,狠批林彪谬论,肃清“工分挂帅”余毒,宣传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大大激发了社员革命斗志,出色完成三麦播种任务的事迹。这篇文章发表得很及时,为如何在农忙季节抓好生产提供了经验,为各级领导如何“抓大事”树立了榜样,有力地说明了“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的道理,起了反映一点,带动一片的作用。

正当一批知识青年分配到新的工作岗位的时候,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一日《文汇报》发表了一组小通讯。其中有写全心全意为人民倒马桶的女清洁工的《我的名字叫清洁工》,有写决心当好人民服务员的七姑娘服务小组事迹的《为人民端菜送饭心欢畅》,有写以雷锋为榜样,干一行爱一行的青年工人的《把崇高的理想倾注在平凡的工作中》,有写身残心红的炊事员的《身残志坚干革命》……。这些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的青年人,胸怀朝阳,意气风发,不愧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出来的新一代!这些小通讯反映了他们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崭新的精神面貌,对正走上工作岗位的广大知识青年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和鼓舞作用。

^① 载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一日《解放日报》。

二、须真实准确

小通讯是一种新闻体裁，它报道的内容，包括人物、事件、时间、地点、情节等，都必须完全真实、准确。有些作者往往把小通讯与革命故事混同起来，这是不对的。革命故事属于文艺创作范围，不受真人真事的限制，它允许、也要求在生活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提炼情节，塑造典型。而小通讯则要求完全真实，不能虚构、添枝加叶。

有一次，报社接到一位知识青年写的一篇小通讯《一条围巾》。大意是这样的：一个青年到农村插队后向家里要一条围巾，不久母亲就寄来了，但却是一条补了又补的旧围巾。信中，母亲告诉他，这条围巾祖辈相传，凝着全家的血和泪。在万恶的旧社会，爷爷围着它在码头上做苦工；父亲围着它在工厂里做苦工；父亲死后，母亲又围着它女扮男装拉黄包车。现在寄给他，就是要他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后来经编辑人员调查核对，这个青年的父亲还活着，母亲也没女扮男装拉过黄包车，情节内容都是虚构的，所以这篇文章就不是新闻通讯。这个题材可以写成一个革命故事，但如果把它写成新闻通讯，那是不妥的。显然这是由于这个知识青年不了解小通讯体裁特点而产生的问题。

写小通讯，同写其他新闻报道一样，是不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绝不是一般写作态度问题，而是执行不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新闻路线的大问题。林彪一伙胡说什么为了“争取宣传效果”，允许“没有的加上”，“不够高的拔上”，“跟不上的变上”，提倡什么“合理想象”等等，无中生有，肆意捏造。这种弄虚作假的资产阶级文风是为其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反革命舆论效劳的，我们必须痛加揭露、批判，坚决用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指导新闻写作,真实地反映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准确地宣传党的路线和政策。

三、能以小见大

列宁在五十多年前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一幅说明大问题的小图画》,文中推荐了一本好书,说这本书把一个偏僻县份的革命过程描写得非常生动,用短小的篇幅说明了有关社会主义重要问题的严重教训。小通讯也如同一幅说明大问题的小图画,往往在很短小的篇幅里反映出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现场批判》^①写的是南汇县老港公社中港大队在仓库场上批林批孔的一个场景。会上生产队长指着两对用布包着的小碗首先发言,他说: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孔老二,叫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污蔑劳动人民是只知道“小利”的“小人”。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也学他的样,污蔑劳动人民整天想的是“恭喜发财”。究竟谁在想“发财”呢?这四只碗是最好的见证。

这时民兵排长起来揭发说:这四只碗是我们从一个反革命分子家里查获的。这家伙的儿子结婚,搞了这两对所谓“子孙碗”,碗里放着铜钱(意思是招财进宝)、白米(意思是白米满仓)和枣子(意思是早得子孙),妄想恢复他们已失去的天堂。接着贫协主任批判道:事实证明,真正想复辟旧制度,想“恭喜发财”的,不是别人,而正是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和他的社会基础地、富、反、坏、右!

这篇不过五百字的小通讯,反映了我国广大人民积极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一个侧面。文章以“四只小碗”为物证,揭

^① 载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五日《解放日报》。

发了当地的一场不见刀、不见血的阶级斗争。这个事实，不但有力地批驳了孔老二和林彪对劳动人民的污蔑，而且也揭示了林彪一伙妄图复辟的思想根源和社会基础。这篇小通讯，正是通过中港大队的一次生动的现场批判会，反映了我国当前批林批孔运动的广泛深入和广大劳动人民在这场斗争中的昂扬斗志，并且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四、应写出思想

小通讯，不论是写某一个先进人物，或通过某一典型事件来写一个先进集体，都要求写出人物的精神面貌和高尚的思想境界；如果见物不见人，见人不见思想，就起不到应有的教育作用。而要写出先进人物的先进思想，就必须反映人物的思想活动，特别是他们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的表现，这样才能写得深刻而有普遍的教育意义。

例如前面提到的一篇《我的名字叫清洁工》，写的是一位知识青年小胡当清洁工的先进事迹。当这位同志刚接到毕业分配通知时，她曾一度闷闷不乐，是妈妈以亲身的回忆对比教育了她。她又想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大哥大姐们向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开火，自己也跟在后面冲，现在也要发扬这种精神，向自己头脑里轻视平凡劳动的剥削阶级旧思想开火。这样，她取得了思想斗争的胜利，跨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有些人由于受旧思想的影响，看不起清洁工。当分配到这工作时，干，还是不干？这的确是两种世界观的激烈斗争。但小胡终于发扬了革命造反精神，战胜了自己头脑里的旧思想。当粪水溅到身上时，怎样对待这又脏又臭的活？小胡想到师傅跟她讲的话：“当清洁工人，就要有一人脏、万人净，别

人清爽我开心的高尚风格。”她决心以师傅为榜样，为了别人的清洁要不怕脏。在安心本职工作后，是只求过得去，还是力求做得好？小胡虚心向同班的小刘学习，处处为居民着想，积极主动，满腔热情。当工作受到群众赞扬时，怎样对待这荣誉？小胡的回答是：“我的名字叫清洁工。”——她把这一切都看做是自己应该做的事。这篇小通讯，选材不多，但却抓住了最能反映人物思想的关键问题，一步一步地展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使人物的思想不断闪耀着新的光辉。

当然，小胡的成长是和老师傅及同志们的帮助分不开的。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不但看到了她与剥削阶级传统观念决裂的决心，对工作的热忱和对荣誉的谦逊，也看到了老师傅和小刘的优秀品质。“一人脏、万人净，别人清爽我开心”，这是多么高尚的思想风格呵！这些从事着平凡劳动的同志，尽管她们身上溅上了粪水，但她们都有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她们的思想感情是多么高尚，纯洁！使人不能不深为感动。

小通讯就是这样，虽然它一般只写一两个人物，只选取某一个生活片断、一两个简单的情节，但正由于它能够深刻地反映人物的先进思想和崇高品质，所以往往能使读者受到较大的教育和鼓舞。从这点来看，我们也可以说，人物的思想就是小通讯的灵魂。

今天，我们正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祖国面貌日新月异，气象万千，三大革命运动中，新人新事层出不穷。波澜壮阔的革命现实，为小通讯的写作提供了广阔的题材和丰富的内容。我们只要有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敏锐的政治目光，积极投身于三大革命实践，就不难写出能正确反映工农兵的斗争生活和精神面貌的好作品。

总结经验 宣传典型

——调查报告的写作

调查报告是反映三大革命实践中的新事物、新经验、新问题的一种文体。按内容分,有典型经验的调查、新生事物的调查、社会问题的调查、斗争历史的调查等等。目前报刊上常见的以前两类为主,这里讲的调查报告,亦指前两类而言。

调查报告主要用于介绍、推广某一地区、某一单位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带有方向性的典型经验,和某一新生事物成长过程中的带有普遍性的规律,用来指导面上的工作。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这是党的工作方法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调查报告应当发挥的作用。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新经验、新事物、新问题不断涌现,这就需要我们去反映,去总结,写出好的调查报告,以推动我们各方面的工作,为无产阶级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实践而发挥它强大的战斗作用。

毛主席历来都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和典型经验的运用。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在《实践论》、《反对本本主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等光辉著作中,对如何进行调查研究,给了我们很多宝贵的指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又亲自批发了一批典型经验,批发

了一系列重要的调查报告，及时地为运动的发展，提供了经验，指明了方向。毛主席的这些光辉著作和重要指示，不但是我们革命的指路明灯，也是我们写调查报告的根本指导思想和光辉典范，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并用以指导我们的实践。

调查报告，是调查研究的结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是写好调查报告的前提。因此，写调查报告必须从调查研究开始，在调查研究上多下功夫。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充分体现在毛主席教导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著名论断里。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关于“注重调查”、“反对瞎说”的教导，向社会作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一贯仇视和反对毛主席关于对社会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的光辉思想，公开攻击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过时”了，就连写文章，他们也认为只要“不断地想”，“散步的时候想”，“在茅房里想”，就可以“想”出来，以此否定调查研究，妄图用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先验论来对抗无产阶级唯物论的反映论，为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制造反革命舆论。对此，我们必须深入批判。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铲除唯心主义思想，坚持调查研究，做好我们的工作。

要做好调查研究，首先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分析、研究各种事物，抓住路线、方针政策性的重大问题，这样，才能不被一些复杂的现象所迷惑，看清哪些是本质的、主流的东西，哪些是新生事物，哪些是有益经验，也才能为解决现实斗争中出现的问题指出正确的方向。如《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①这篇调查报告，由于作者能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调查研究，以路线斗争为纲，抓住事物的本质和主流，看到资产阶级虽然千

^① 载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方百计想扼杀工人技术队伍的成长,但“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还是冲破层层阻力,表现了自己惊人的创造智慧”,“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几乎所有新产品都是他们设计试制成功的”,因而能满怀热情地反映工人技术队伍迅速成长的过程;并从工人技术人员跟旧大专院校毕业生及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比较中,看到工人技术人员的成绩和优点,找出他们成长快、贡献大的原因,从而说明了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这条道路的优越性,为学校教育革命指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由此可见,只有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调查研究,分析问题,才能发掘体现无产阶级革命方向的新生事物,发掘有利于现实斗争的典型经验,才能使我们所写的调查报告对三大革命运动起有力的推动作用。

下面谈谈写调查报告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从指导当前工作着眼,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

我们写调查报告介绍新生事物或典型经验,是为了使大家学有样板,奔有方向,以利于推动三大革命运动的开展。所以这里就须注意两个问题: 1. 由于时间、地区、条件、行业的不同,一时、一地、一个单位的具体工作经验并非都具有普遍意义,往往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写调查报告时,就不能满足于一般工作过程和业务经验的介绍,要从具体的经验中找出事物的内在联系,概括出必然的规律来。只有规律性的东西,才能反映本质,才有普遍意义。2. 写调查报告不只是为了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为了改造世界。介绍一个点上的经验,或某一新生事物成长过程中的带有普遍性的规律,目的是为了推动面上的工作,离开了对面上工作的指导,调查报告就失去了意义。调查报告中所反映的问题,往往是对准现实斗争中某

个矛盾而发的,针对性很强,因而不是任何经验都适宜于写成调查报告。它所总结的经验,往往是带有方向性的,是在一个时期内需要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过来的那些问题。所以我们在调查材料、分析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抬头看形势,要有全局观点,从指导当前的实际工作出发,从广大工农兵最关心的问题着眼,看哪些是当前工作中迫切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从而决定写什么和从什么角度去写。这样写出的调查报告,才可能达到深入一点,取得经验,推动一般的目的。

人民日报推荐的两篇短而好的调查报告《走马岗大队正确处理林牧矛盾积极发展养羊》和《上华大队养猪事业大发展》^①,就是根据广大贫下中农在实际工作中提出的问题,总结出规律性的经验,因而带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所以文章发表后,反响强烈,深受读者欢迎。

《上华大队养猪事业大发展》总结出的三点(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认真贯彻集体养猪和社员养猪并举的方针,大力发展饲料生产),既反映了这个大队发展养猪事业的重要经验,又是当前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进一步发展养猪事业普遍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至于一般工作过程和具体做法,在原来作为汇报情况的工作总结中,曾有比较详细的叙述,改成调查报告,就作了大幅度的删削,或只作简要的概括,使规律性的经验反映得更加鲜明突出。走马岗大队养羊经验一稿,在原材料中写了五个问题,其中“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和“加强饲养管理”两个问题,不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全部删去,只保留了三个问题(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革命养羊;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正确处理林牧矛盾;羊多、粮

^① 载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

多、收入多、贡献大)。这三个问题中，“正确处理林牧矛盾”是目前发展养羊生产的主要矛盾，所以在标题和开头部分加以强调，作为贯穿全文的主题思想，使规律性的东西显得更加鲜明集中，文章也更加紧凑。

二、揭示执行政策过程中的有普遍性的矛盾斗争

毛主席说：“所谓经验，就是实行政策的过程和归宿。”毛主席又教导我们：“到一个单位去了解情况，要了解运动的全过程，开始怎样，后来怎样，现在怎样，群众是怎么搞的，领导是怎么搞的，发生过一些什么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人们的认识有什么发展，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在执行党的政策的过程中，在一个经验形成的过程中，总是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的。写调查报告，在深入调查研究、了解运动全过程的基础上，要着重写出这种矛盾斗争和人的认识的发展变化。这样，才能深刻而全面地、具体而生动地揭示先进经验中规律性的东西，从根本上给读者以启发帮助。要是就事论事地罗列许多具体经验，面面俱到，不得要领，写出的调查报告就没有深度，也缺乏普遍的指导意义。

走马岗大队养羊经验一文中，“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革命养羊”一节，着重写了他们排除错误路线的干扰，落实党的政策，积极发展养羊事业的经验：开始，在刘少奇鼓吹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影响下，集体养羊发展不起来。后来，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挫伤了社员养羊的积极性，养羊数量下降了。大队党支部针对这个问题，学习和落实了党的政策，养羊事业才得到不断发展。写出了这个斗争过程，就有力地说明了“养羊不抓线，方向道路必走偏；养羊抓纲线，集体经

济大发展”这个普遍规律。文章的第二部分“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正确处理林牧矛盾”,是写人们认识上的矛盾分歧,和经过斗争达到统一的过程。文章摆出了对立面,并且写出了他们怎样用毛主席哲学思想统一认识、解决矛盾,找到了林牧共同发展的办法。文章的这两个主要部分,都是抓住了不同性质的矛盾焦点,写出了矛盾斗争和人的思想发展过程,从而准确、鲜明、生动地揭示了这个大队发展养羊经验的规律性的东西。

三、主要让事实说话

我们认识事物的规律性的东西,有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但在写作时,又需要把抽象的东西具体化,使人对这规律性的东西看得见、摸得着。一个典型,一项经验,好,好在哪里?对,对在哪里?新,新在哪里?都要给人有一种亲切具体的感觉,所以写调查报告,虽然也不排斥必要的概括和恰当的议论,但主要应让事实说话,通过确凿的、有说服力的材料来说明问题。如《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①这篇调查报告的第一部分“贫下中农需要这样一支新型的医疗卫生队伍”中讲到赤脚医生平时有一半左右时间参加劳动,大队补贴不多,而为贫下中农看病则主动、及时、细心、热情,收费低廉。又从赤脚医生积极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等事例,说明赤脚医生是改变农村医疗状况的尖兵。赤脚医生给贫下中农带来的好处,与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救护车一响,家中一只猪白养”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通过这些事例,“赤脚医生”这支新型的队伍,好在哪里,为什么深受贫下中农的欢迎,读者一看就十分明白。

^① 载《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三期。

为了使读者获得鲜明的印象,调查报告在叙事过程中,常常采用对比的方法来说明问题。《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这篇调查报告,就多处采用了对比的方法。如为了说明“在实践中培养”这个办法的优越性,就将公社卫生院两位年龄差不多而经历不同的医生作了对比:一个是主要学习外科和内科的某医专毕业生,读书五年,参加工作四年,连脑膜炎和胸膜炎也诊断不出,为一个死胎早产病人接生时,死背在学校中记熟了的书本知识,急得手足无措;另一个贫农出身的医生,只有初二水平,在卫生学校学习十个月,到公社卫生院工作几年后,又经过七个月的外科进修,已能在医疗设备较差的情况下,进行疝修补、绝育等手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他又成了公社卫生院革委会的负责人。这个鲜明的对比,暴露了旧医学教育制度严重脱离政治、脱离实践的弊病,显示出“赤脚医生”这支新型医疗队伍的巨大生命力。俗话说,“比比看看,好坏自见”,通过对比,事情的高低、好坏,就一目了然,不必再化更多的笔墨去反复说明了。

在事实的对比中,调查报告还经常运用统计数字来说明问题。如走马岗大队养羊经验一文的最末部分,主要用了两组统计数字的对比。一组是一九六五年大队粮食平均亩产二百三十六斤和一九七一年的五百五十七斤;一组是一九六四年吃国家统销粮八千斤和一九七一年交售余粮六万六千多斤。通过这两组数字的对比,再加上集体储备粮三万斤,投资一万余元兴建水库、面粉加工厂和林场等数字,就把“羊多、粮多、收入多、贡献大”这个观点体现出来了。运用统计数字之所以有说服力,就是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工作的效

果和成绩,体现了路线的正确和政策的威力。它们具体的,又是高度概括的,用来说明问题,具有极强的科学性和鲜明性。所以在运用统计数字时,一定要严肃谨慎,要精选最能说明问题实质的数字,防止浮夸和滥用。

总之,调查报告是一种政治性很强的文体,它主要是通过典型事例、典型经验来回答三大革命运动中提出的问题,特别是有关方向、路线、政策的重大问题。所以写调查报告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反映的问题要有针对性,所总结出的规律性的东西要有普遍指导意义;要用客观事实说话,引用的材料、数据要精当、确凿而有说服力。这样的调查报告,才能在现实斗争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诗歌的构思和语言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世界革命风起云涌，祖国面貌日新月异，各条战线上新人新事不断涌现，我们的生活处处充满着诗意。这种绚丽多彩的现实生活经常感动着我们，激励着我们，促使我们用诗歌来歌颂我们美好的生活。青年同志喜欢写诗，想用诗歌的形式表达自己对党、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祖国、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无产阶级感情，这是很值得提倡的。但是，有些青年同志又往往为写不好一首诗而苦恼。那么，怎样才能写好一首诗呢？写诗要注意什么问题呢？除了世界观和生活实践等问题之外，诗歌的构思和语言是两个重要的问题。

好的构思，意境深远，形象鲜明，从而也就更能感染人、教育人，产生巨大的艺术效果。那么，诗歌在构思的时候有什么要求呢？

第一，要有无产阶级革命激情

写艺术作品需要有革命的激情，写诗歌尤其这样。鲁迅说过：“诗歌本是发抒自己的热情的^①”。诗歌与其他文学样式比较起来，它表达的感情更强烈，更直接。在抒情诗里，作者往往通过直抒胸臆(yì意)的办法表达感情。就是在叙事诗里，虽然主要以叙事为主，但有时也直接表达作者的感情，如

^① 鲁迅：《诗歌之敌》，《鲁迅全集》第七卷第344页。

《金训华之歌》^①的第一节这样写道：

英雄的歌呵，
多壮烈！
天上嫦娥
洒泪舞；
地上大江
浪拍天！
绵绵昆仑松涛涌，
巍巍井冈春雷激；
千山回响一个音——
学习英雄争朝夕！

在这一节诗里，作者通过嫦娥、大江、昆仑、井冈这些形象，把对金训华烈士的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直接表达了出来，写出了亿万革命人民和革命青年的共同心声：“学习英雄争朝夕”。

今天，我们写无产阶级的诗歌，就需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激情。为什么《金训华之歌》中表现的感情那么强烈？正是因为作者热爱金训华，并被金训华烈士的英雄行动感动了，正是这种强烈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激情，才使得这首长诗读来如此动人。

具有饱满的无产阶级革命激情是写好一首诗的重要条件。李有源创作《东方红》歌词的实践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李有源出生于陕西葭县张家庄的一个贫农家庭里。在旧中国，李有源和亿万劳动人民一样，身受三座大山的压迫与剥削，对万恶的旧社会有着深仇大恨。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解放了

^① 仇学宝：《金训华之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他的家乡，伟大领袖毛主席把广大贫下中农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暖了广大贫下中农的心胸，张家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李有源从切身的经历中，深切地感到共产党和毛主席是劳动人民的大救星。深厚的阶级感情使他产生了用诗歌形式歌颂党和毛主席的强烈愿望。他只念了一个冬天的书，就写出了一首首革命的赞歌。一九四二年冬天的一个早晨，他劳动时挑着担子走上山坡，这时，他看到一轮红日正从东方冉冉升起，朝阳的光辉映红了革命根据地，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大好景象。无产阶级的革命激情使他对这大自然的优美景色产生了丰富的联想，党和毛主席不正是光芒四射普照大地的红太阳吗？于是，李有源怀着极其激动的心情，用红太阳比喻毛主席伟大形象，写出了无产阶级的颂歌《东方红》。

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鼓吹写作要靠“灵感”和“天才”，在他们看来，广大工农兵群众根本就不配写诗。李有源和无数工农兵作者写出的数以万计的好诗，彻底粉碎了他们的这种谬论。写出好诗，并不是靠“灵感”，也不靠什么“天才”，而是靠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靠在实践中产生的对党、对毛主席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第二，要高度集中概括

集中概括是文学艺术反映生活的特点，但是诗歌与其他文学样式比较起来，在概括生活方面要求更集中、更凝炼。由于诗的篇幅很短，所以它不可能象长篇小说那样细致地刻画人物，详尽地叙述事件的来龙去脉。写诗要善于从生活中提炼出最富有特征性的典型形象来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反映生活的本质和规律。

诗报告《西沙之战》^①是一首壮丽的叙事诗。这首长诗热情澎湃，气势磅礴，是一曲海上人民战争的壮丽颂歌，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革命样板戏带动下诞生的一首优秀的革命诗歌。作者运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和“三突出”的原则，塑造了渔民老船长阿沙，年青的舰长钟海，黎族新战士李阿春三个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

诗中对钟海舰长的成长历程是这样写的：

钟海舰长，
出生在湘江畔，
韶山冲的阳光雨露，
培育了这新中国的青年。
曾记得：
在那上场屋边、
荷花塘畔，
他挂上了红领巾；
在农民夜校的旧址，
伟大领袖战斗过的地方，
宣誓加入共青团。
海上的风波，
舰上的岁月，
磨练了战斗意志，
锤打出钢骨铁胆；
刻苦的学习，
真理的教导，

^① 载一九七四年三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使他光荣加入共产党，

心与五洲共苦甜。

这节诗选择了钟海舰长成长过程中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情节：挂上红领巾、加入共青团、入伍当海军、参加共产党，非常概括地写出了钟海舰长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的光辉历程。如果写小说，那就要更具体、更详细。所以，诗歌的叙事是高度概括集中的。

诗歌的抒情，也必须通过具体的、最有特征性的形象来表现人物典型的思想感情。例如：

年青的舰长，

此时此刻，

思潮汹涌，

豪情无限；

彩云飘处，

仿佛望见：

天安门的青松、红墙，

中南海阳光灿烂，

伟大领袖毛主席，

瞩目天涯，

指点航线，

给我们革命真理的罗盘，

鼓舞着战斗的军民一往无前！

舰长的视线投向挂历，

挂历上一幅壮丽的画卷：

飞渡的乱云，

从容的劲松，
无限的风光，
巍峨的庐山。

.....

这是钟海舰长在奔赴战场前夕抒发的革命豪情，而这种感情是通过富有特征性的典型形象表达出来的。上一节通过钟海舰长仿佛望见天安门的青松、红墙和中南海阳光灿烂这样的典型形象，写出了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伟大领袖毛主席鼓舞着他们一往无前。下一节通过挂历上一幅《庐山仙人洞》照片的描写，抒发了革命战士不畏强暴、不怕艰险、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豪情壮志。这些富有特征意义的典型形象是作者对现实生活进行了选择、集中、概括的结果。

写诗要对生活进行高度的集中概括，同时又要形象地反映生活，但不等于说诗中不可以说理。不过诗的说理与论说文的说理不一样，也要求通过形象来说理。比如有一首民歌，说明只要干劲大，任何困难都可克服，它是这样写的：

干劲是榔头，
困难是石头，
榔头敲石头，
困难就低头。

通过榔头与石头的比喻，就把这个道理说得很形象。如果这样写：“只要干劲大，任何困难能克服”，道理虽对，但却不成一首诗了。

我们写诗要善于对生活现象进行选择、提炼、集中、概括，不要平铺直叙地表述思想。

第三，要充分发挥想象

上面说过,诗是强烈地抒发感情的,而强烈的感情又常常使作者浮想联翩(piān piān)。王进喜同志曾有“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的诗句。在现实生活中地球当然是不可能抖三抖的,但在诗中却是完全允许的,这样写就把石油工人的豪迈气概表达了出来。这就是作者丰富的想象。

想象是表达感情的一种重要手段。如《我是红色线务员》^①：

我是红色线务员，
脚扣送我上云端。
牵来金线织彩霞，
连接长白万重山。
一头连向中南海，
一端系在咱心田。
我为毛主席传号令，
笑看四海卷狂澜。

这首诗通过丰富的想象,写出了线务工作的革命意义,抒发了作者的壮志豪情。你看,一根普通的电话线,作者却想得很美,想得很远。它是一根彩色的金线,架在空中,织起了彩霞一片,把万重山都连接起来了。丰富的想象把平凡的工作诗化了,表达了作者对线务工作的自豪感。接下去,又从电话线联想开去,说“一头连向中南海,一端系在咱心田”,通过这样巧妙的想象,把线务员对党和毛主席的感情表达了出来。最后一句“笑看四海卷狂澜”,进一步从线务工作想到了世界革命,从而展现了线务工作者的阔广胸怀。试想:如果离开了想象,诗的感情又怎么能表达出来呢?

^① 载诗集《风展红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诗歌需要想象，但想象又必须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决不能毫无根据地凭空乱想。象上面一首诗，它的想象始终没有离开线务员的生活，而是完全建筑在作者对线务工作的革命意义有深刻认识的基础上的。如果不熟悉、不理解、不热爱线务员的生活，也就不可能产生这样真切的想象。对生活理解得越深，想象的天地也就越广阔、越丰富、越真实。

诗歌需要想象，但这种想象必须新颖，不落俗套。而要做到新颖，就必须从丰富的生活土壤中去发掘、去提炼。歌颂毛主席的诗有千千万万，但很多诗都写得不一樣。《东方红》用红太阳来比喻毛主席的伟大，显得新颖、贴切。而另一首《壮家最爱毛主席》^①是这样写的：

黑夜走路靠北斗，
千里行船靠艄公，
婴儿成长靠爹娘，
壮家全靠毛泽东。

花儿最红映山红，
树儿最青万年松，
丝织最美是壮锦，
恩情最重毛泽东。

葵花最爱太阳红，
船家最爱扬帆风，
秧苗最爱及时雨，
壮家最爱毛泽东。

^① 见诗集《颂歌声声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连用“黑夜走路靠北斗”等九个比喻来歌颂毛主席，它形象地反映了壮族人民对领袖的热爱，读来也新颖感人。

在写诗的过程中，作者往往通过一个贴切的联想，把散漫的生活现象集中概括起来。《壮家最爱毛主席》这首诗如果离开了“黑夜走路靠北斗”等九个比喻，作者的思想感情就无法集中地表达出来。所以，想象也是诗歌集中概括的一种重要手段。

我们有时把诗写得太实，没有丰富的联想，读来索然寡味；有时虽有联想，但又太一般化，没有特点。这些缺点，我们在写诗的时候要注意避免。

写诗还应该注意语言的运用，诗歌的语言要特别精炼、形象和富有音乐性。

诗歌语言要特别精炼、形象，这是由它的内容的高度集中决定的。写诗应该把那些可有可无的字、句删去，做到辞简而意丰。象《庐山颂》开头两句：“放眼大江东去，昂首万里云天”，仅十二个字就写出了庐山的雄伟气势，“放眼”“昂首”运用了修辞上的拟人手法，把庐山写活了，让我们仿佛看到庐山是一个巍然屹立的巨人。这样的语言就是精炼而形象的。

所以，写诗要特别注意语言的锤炼，有时诗中一个句子或一个词用得好，就可以将诗的精神传出来，使全诗增色。象“笑为神州主沉浮”，这个“笑”字就用得好。从表面上看，“笑”是一种神态，这里却表达了丰富的内容，它写出了毛主席对于中国革命前途的必胜信心和乐观主义精神，它具有传神的作用，把毛主席的崇高精神境界突出地表现出来了。当然，铸词炼句都是为内容服务的，如果离开内容去雕章琢句，追求用词的奇特，那就走到歧路上去了。

诗的语言还要有音乐性。节奏和押韵是诗歌语言音乐性的两个主要方面。

节奏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音步，例如：

石油——工人——一声——吼，
地球——也要——抖——三抖。

这两句诗每句都可以分为四个朗读单位，每个单位之间在朗读时都稍有停顿，并显示出强弱、快慢，这种朗读的单位就叫做音步。诗歌音步的组织要有规律，这样读起来就抑扬顿挫，琅琅上口。现在我们写诗，诗句的字数可以不等，但音步的数目还是要大致整齐的，例如：

遍山的——青松呵
在——东风里
显得——挺拔——苍劲
满地的——红花呵
在——雨露下
开得——壮丽——绚烂
山顶的——红旗
九天的——云霞
沐浴着——东方的——朝阳
登峰的——道路
革命的——征途
全靠——毛主席——指点^①

这一节诗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但音步却大致整齐（二音步或三音步），读起来有节奏感。

押韵是指诗句的末一字用韵母相同或相近的字（每个汉

^① 见《庐山颂》，载诗集《庐山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字的字音都可分析为声母和韵母两个部分，声母在前，韵母在后。如东[dōng]，[d]是声母，[ong]是韵母)。如前面引用的《壮家最爱毛泽东》这一首诗中，“公”、“东”、“红”、“松”的韵母都是[ong]，“风”的韵母是[eng]，声音相近，所以都是押韵的。在写诗时，如果某个字音的韵母搞不清楚，可以翻查字典。

古代的格律诗，不但押韵是极严格的，而且每个字的平仄都有一定的要求，所以初学写诗，最好不要学写旧体诗词。毛主席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我们写新诗，只要大体押韵就可以了。现在一般是双句押韵，在四行一节的诗里往往是一、二、四句押韵；在比较长的诗里，不一定要一韵到底，中间可以转韵。押韵押得好，读起来就顺口，听起来就悦耳，可以把诗的感情更好地表达出来。

节奏和押韵是诗的形式，它是为内容服务的，所以我们反对那种只讲形式，不讲内容的形式主义倾向。当然，形式的作用也是很大的。为什么有些好诗我们百读不厌，而且容易记忆和背诵呢？除了内容好之外，不能不说是形式的作用了。因此，我们要求：“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散文的寓意和联想

散文是一种选材范围很广，篇幅短小，形式活泼的文学体裁。人们常用它来迅速及时地反映当前革命斗争的实际，生动形象地表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丰富多采的生活，满腔热情地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广泛深入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时由于它表达方式灵活多样，时而可叙事，时而可描写，时而可抒情，时而可议论，比其他文学形式更便于直接表达作者自己的观点和感情，给读者以深刻启示或强烈感染。因此，也有人把散文称为文学的“轻骑兵”。

好的散文总以寓意深远，构思新颖，联想丰富，结构紧凑而取胜。一篇散文如果文意浅薄，平淡枯燥，读者必然感到索然无味。但要做到寓意深远，给人以新意，却又不是单靠艺术技巧所能解决的，而首先要求作者认真看书学习，努力改造世界观，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这样才能对广大工农兵火热的战斗生活有深刻的感受，对新事物有特别的敏感，能在三大革命斗争实践中抓住那些具有时代特征和典型意义的事物来写。鲁迅说：“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这就是说，我们在革命斗争中要多看多想；要善于去发现蕴藏在事物内部的深刻意义。只有感受得深，理解得深，才能写得深刻。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我们才能进一步去感觉。”

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这是指导我们构思立意的一把钥匙。所以当我们对某些事物有了感受，引起激情和写作动机的时候，还应该多想想，把它放到这事物和它事物的关系中，放到广阔的时代背景下，从本质上去认识它、理解它、表现它。比如上海海关的钟楼、钟声，是上海的人们所熟悉的，对来过上海的外地人，可能也不陌生；但《海关钟声》^①的作者，由于能把这个钟楼放到祖国东大门的广阔背景上，放到我国对外关系日益频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来认识它，使它与人民的生活、国家的命运，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紧密联系起来，深刻体会到“海关体现着国家的主权”的重大意义，因而在作者的笔下，俯瞰今昔的钟楼成了时代的见证，雄伟庄严的钟声成为胜利的象征。这是决定《海关钟声》寓意深远，调子高昂的基本原因。这是构思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步。

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三大革命实践中有许多事物，如果我们对它漫不经心，它也就会无声无息、无光无影地从我们眼前掠过；但如果我们注目一看，用心一想，会发现那又是多么有意义呵！例如坐汽车吧，这是很平常的事，但在《万里春光收不尽》^②一文中，在汽车运输工人眼里，闪闪发亮的反光镜，就象一架“永不止息的摄影机”，将一幅幅社会主义的壮丽图景，尽收镜底。小小的反光镜，映出了伟大祖国欣欣向荣、一日千里的景象。如果你漫不经心，也许什么也没有看见，或者只觉得反映到反光镜里面的不过是一些汽车后面的景物罢了；但如果你将这镜里所反映的瞬息变化的景物与社会主义祖国的

① 载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二日《文汇报》。

② 见小说、散文集《延安的种子》，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建设联系起来,这反光镜就变成有特殊意义的事物了。

再如摆渡吧,这也是很平常的事。以摆渡为题材的散文也有过好几篇,但有一篇却使人感到格外有意义,就是《桥》^①。文章写的是在薄暮的风浪里,一位老大爷为海防战士摆渡到海岛上去。路上,老大爷和这位战士谈起二十多年前的一件事:有一次,一伙“二鬼子”怕八路军来打,想溜走,就把老大爷抓去替他们摇船。当船摇到暗礁密布的狼牙礁时,大爷翻身跳入海里,用头顶着船底,双手一推,渔船便朝着礁岩飞奔而去。结果,“二鬼子”喂了鱼虾,大爷终于抱着撞碎的船板游了回来。解放后,大爷又驾着渔船,护送海防战士,风里来,浪里去,二十多年如一日……。这生动的故事,使作者不禁由衷地赞叹道:“是啊!渔船虽小,却紧紧地连着军民的心哪!……当敌人坐上它的时候,就寸步难行,葬身于大海;而人民的子弟兵在上面,纵有千难万险,也安然无恙!这是多么强烈的阶级爱憎,多么鲜明的阶级立场啊!”“橹把摇出鱼水情,飞舟架起海上桥”,正是人民对子弟兵的热爱,使狂风恶浪的海面“天堑变通途”!也正因为作者能看到这座飞架在海岸与孤岛间的无形的桥,使这篇文章摆脱了单纯的写人叙事,主题思想也就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如果听完故事,不去思考一下这些事情所蕴含的巨大意义,体会不到这深厚的军民鱼水情,那末,这篇文章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由此可见,散文要做到寓意深远,必须摆脱照物拟模、就事论事的做法,而致力于意境的开拓,事理的阐发,让读者通过所描叙的事物,由此及彼地领会到更多更深的道理。

如前所说,散文取材范围广阔,表现方法自由灵活,寓意

^① 见报告文学、散文集《这里永远是春天》,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深远而联想丰富,因而往往在同一篇文章中,时而可写现实斗争,时而可谈历史经验,时而可对敌人横眉怒斥,时而可向人民倾诉深情,有时候万里河山竞来笔底,有时候豪情壮志由衷而发,纵笔写来,自然活泼。正因为这样,如写得好,就如渔民撒网,能放能收,气势横溢,深刻动人;写得不好,就易散漫凌乱,不着边际。所以过去人们议论散文,有人就说散文贵“散”(即要放得开),有人却说散文忌“散”(意是不能漫无中心),又有人则说散文难就难在“散”而“不散”(指既放得开,又收得拢,有明确中心)。其实,其所以“贵”,所以“难”,又所以要“忌”,主要都因散文这种特点而来。因为在通讯、特写或短篇小说中,所描述的事件和人物都比较集中,也不可能有很多的议论和抒情;而散文则不然,当作者对生活中某些事物有了深刻感受后,常由此引起许多联想,很多与这事物有关联的事情,都会纷纷涌向脑际。这些联想,有的是当前现实生活里所见所闻的东西,有的是储存在记忆中的东西,也有的可能是由于受生活中某些事物的启发而展开想象生发出来的东西……。不过,散文的联想,往往都是在一种明确的思想的启发下出现的,作者之所以想到这,想到那,也因为它们之间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所以在写作时,作者越是能把握住事物所体现的深刻思想,他所开展的联想也越受这思想的有力支配,为表现这思想服务,而不至于使“想象的翅膀”乱飞。写散文,作者既要能展开想象,又要能驾驭(yù 玉)想象,这样才能做到“散”而“不散”。

如《海滩脚印》^①这篇散文,就是将脚印汇成的泥浪作为劳动人民战天斗海创造历史的印记而展开想象的。作者先从

^① 载《朝霞》一九七四年第五期。

青藏高原浑浑莽莽的泥石巨流和北国春天经拖拉机翻犁后的万里沃土谈起,开拓读者的视野,引起读者的想象,然后将读者引向东海之滨由密密麻麻的脚印汇成的一片黄泥浊浪——十万围垦大军用脚印踩成的泥浪。由这泥浪,又不由得想起来自公社、农场的各路大军围垦海滩的盛况,反映了英雄的人民“向大海争土地,向荒滩要棉粮”的昂扬斗志。泥浪,仿佛就是东海儿女战天斗海的乐章。接着又从这无数脚印汇成的泥浪,联想到过去劳动人民在这里留下的脚印,并通过老贫农金祥伯的今昔,反映了海滩的巨变,将历史与现实连缀起来,又从现实展望着未来。过去,“有多少四方逃来的苦命人,和金祥伯一样,长年赤着脚,踽踽(zhí zhú直竹)在东海滩上,一步,一步,一步一个凄楚的脚印,步步走向苦难和死亡……”。而今,“有数不清的金祥,铁骨铮铮,忠心耿耿,带领生龙活虎的革命小将,抗严寒,镇恶浪,挖海泥,筑堤防,奋战在围垦工地上。昔时海滩上苦难的脚印,如今化成了欢腾的泥浪。”“一代新人正沿着先辈的脚印,在大风大浪里奔向前方!”——从脚印到泥浪,谱出了劳动人民战天斗海创造历史的新篇章。

从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寓意深刻,联想丰富,这正是散文之所以带有诗意的缘故;但丰富的联想,必须受主题的制约,正如春天放纸鸢,既要让纸鸢高飞云天,又要紧紧拉住手中的绳线。这样才能做到既有深刻的寓意,丰富的联想,又能主题集中,结构紧凑。如果作者能站得高,看得远,在舒展想象的同时,将生动活泼的现实与远大的革命理想联系起来,则不但能处理好“散”与“不散”的关系,而且还可使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散文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是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的根本任务。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这是革命文艺作品的创作原则。小说的特点就是以工农兵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的火热斗争生活为素材进行提炼、概括，通过完整故事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形象来表现主题，反映革命现实。在通讯、特写和散文等文体中，虽然也有人物描写和事件的叙述，但通讯、特写严格要求符合真人真事，散文不一定有完整故事情节和典型的人物形象，而小说则要求不受真人真事的局限，以“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对现实生活进行艺术概括，努力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反映无产阶级的崇高品质和革命理想，使读者受到教育和鼓舞，以达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目的。

一、通过艺术概括塑造英雄形象

怎样才能塑造出工农兵的英雄形象？首先，胸中要有英雄谱。这就是说：塑造英雄形象，决不能凭主观的臆想，作不切实际的虚构，而必须要有深厚的生活基础。要在火热的斗争生活中，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去观察、分析一切阶级，一切人，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特别对工农兵英雄人物更要虚心学习、体察，要了解他们的先进事迹，豪迈的语言，以及

举止行动、习惯爱好等，而最重要的是要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探讨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行动和这样的思想感情。经过长期的生活体验，这些英雄形象就会栩栩(xǔ)如生地活在我们的心里，我们闭上眼睛也能想象出他们的音容笑貌、性格特点，这时候再经过一番艺术构思，人物形象也就会逐渐在脑海中孕育形成，然后去描写、刻画，就能塑造出血肉丰满而有典型意义的英雄形象。

在塑造英雄形象的过程中，要注意几个问题：

1. 要正确处理个性和共性的关系。

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典型，应该鲜明地体现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否则就不成为阶级的英雄；但由于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出身、环境、经历等等不同，他们又有各自不同的鲜明、生动的个性特征，他们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是通过鲜明、具体的个性来表现的，是寓于个性之中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如“越是艰险越向前”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英雄的一种本质特征，但在不同人物身上，又是和这些人物自己的个性特点结合在一起，是按照他们独特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象在《特别观众》^①里的季长青身上，这种无产阶级的英雄本质，便是和他特有的“进攻”精神结合在一起的。他在部队里能迎着艰险主动请战，复员后到工厂，也处处表现出这种革命的进取精神，“无论革命的浪涛把他推到哪里，他都知道怎样寻找自己的哨位，怎样寻找进攻的目标。”所以即使晚上看戏，也会象发现“敌情”似地发现音柱的毛病，并且马上汇报、请战，以向困难进攻的精神，主动提出在短时间内完成试制高传真调音控制桌的任务。

^① 见上海文艺丛刊《朝霞》，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再看《闪光》^①中的阿华师傅，何尝不是一个“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他长年累月在狂涛激流的海上，用自己的双手甚至生命点亮一盏盏航标灯，鲨鱼礁、犬牙礁的险礁恶浪，全不放在心上，他所想的是“作为革命的航标员，听到航标灯灯光熄灭，就应该象战士听到军号声一样，举着红旗朝前冲，尽一切力量恢复灯标发光”。但这种英雄品质，又和他那朴实、严肃、谦虚的性格融合在一块，所以表现出来的又有他自己的特点。在他们身上都体现着某些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共同特点，但又有他们各自的性格风貌；不通过他们血肉丰满的个性，无产阶级的共性就无从体现。

在塑造英雄形象的时候，要避免两种不正确倾向：一种是简单地把典型归结为阶级本质的综合，以为只要把一些阶级特征加在一个人物身上，就可使它成为高大的形象，而忽略了人物本身的个性，结果使形象陷于概念化；一种是片面强调突出个性，而忽视了个性与共性的辩证关系，掩盖甚至歪曲了人物的阶级本质。这两种倾向，都会破坏人物的典型性，都是由于在艺术概括过程中把人物的个性与阶级的共性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缘故。

2. 根据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形势和特点创造英雄形象。

我们创作小说是为了紧密配合现实斗争，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因此作者对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形势应有高度的敏感，要根据每个时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来塑造英雄形象，这样才能使人物形象具有普遍的教育意义。

^① 见《上海短篇小说选》，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这方面，短篇小说《目标》^①的创作，对我们很有启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农村中出现了很多具有高度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的基层干部，这种新型的英雄人物，激动着作者，使作者产生了创作的动机。但从哪里入手呢？怎样把七十年代的农村干部写得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不同呢？开始，作者围绕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写了好几个题材，但都没有成功。“后来在公社党委的帮助下，分析了当前松江地区（以种植水稻为主）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各种表现，意识到‘以粮为纲’与‘钞票挂帅’的斗争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如果从一个生产队、一个基层单位的利益来考虑，那社员可以说是丰衣足食，粮食绰绰有余了。但是，从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和解放全人类的要求来考虑，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要求出发，那就必须进一步贯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拿出更多粮食，来支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革命种田，把每一项具体工作都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总目标联系起来，这就是七十年代农村基层干部的路线斗争觉悟的一个具体内容，也就是时代精神。”^②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但是在各条战线上，各行各业里，这种矛盾和斗争的表现形式是各不相同的。小说的作者正是按照毛主席的“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的教导，对松江地区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各种表现作了深入的分析，抓住了“以粮为纲”和“钞票挂帅”这个带普遍性的矛盾，并且在矛盾冲突中刻

① 见《上海短篇小说选》，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 见《路线觉悟来自斗争实践》，载一九七三年一月六日《文汇报》。

划人物形象。作品中的副队长,基本上还是个好同志,与那种一心想搞资本主义的人不同。但他目光短浅,缺乏路线斗争觉悟,眼睛只看到生产队的小集体,只知为提高社员收入而动脑筋。而老队长却胸怀支援国家建设和世界革命的大目标,处处能从无产阶级整体利益着想,能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两人,一个想用船搞短途运输以增加副业收入,一个要用船去装粪积肥,为来年粮食增产作好准备。乍看起来这好象是指挥生产上的意见分歧,实际上是反映了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矛盾。正因为作者抓住了这具有时代特点的矛盾来创造人物,老队长的形象也就在矛盾冲突中不断闪发着共产主义的思想光芒,成为七十年代农村基层干部的先进典型,从而使作品具有更普遍的教育意义。

当前文艺创作上有一种错误倾向,就是不敢写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的矛盾冲突,或不敢激化矛盾冲突,不敢写矛盾的转化。这种“无冲突论”的表现,显然是孔孟的中庸之道和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散布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等谬论在文艺创作上的反映。我们必须深入批判,肃清其流毒,按照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努力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风口浪尖上表现我们时代的英雄人物。

3. 情节的提炼要服从人物性格的刻划。

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必须通过情节的开展显示出来,否则就会变成一幅平面图。情节是以作品中主要人物在矛盾斗争中的活动为中心的故事发展,它对展示人物性格、表现主题思想起决定性作用。如在《征途》^①中,正是通过钟卫华和他的战友们在雪地里用手扒豆、卧冰雪逮住逃亡地主马熊、上小岛

^① 郭先红:《征途》,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烧荒播种、在北大沟奋不顾身地打火道护山林、在老虎砬子崩山筑路的艰苦劳动、在熊瞎子沟抓住特务张山和彩豁嘴、以及为保卫双鹿河大桥而与洪水搏斗等情节，将他们的英雄形象表现出来的。可以说，没有情节，也就不可能写出人物性格的发展过程，人物形象也就塑造不出来。至于短篇小说，由于篇幅的限制，所以情节必须“少而精”，也就是要选择那些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的情节来写。

这里再举《目标》为例，来谈谈情节的提炼与刻画人物性格、塑造英雄形象的关系。

《目标》这篇小说，当作者抓住了七十年代初松江地区带有普遍性的矛盾后，根据表现人物性格的需要，在许多材料中选择了三个情节，即老队长与副队长大海的三次思想上的矛盾冲突。第一次是在生产上已经有把握达到指标的时候，大海由于思想上“钞票挂帅”而想用船去搞短途运输争取副业收入，而老队长却坚持“以粮为纲”要用船去装粪。这样，船到“三岔湾”，一个要“扳艄”，一个要“推艄”，引起了争论。结果老队长从农业生产同国家建设、世界革命的关系来说明积肥的重要意义，谆谆善诱地打通了副队长大海的思想。这个情节突出了老队长的高度路线斗争觉悟和坚持原则的精神，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第二次是在去装粪的途中，碰到兄弟公社运化肥的船被撞坏了，这时大海的思想好不容易才转变过来，一心想着去装粪，所以提出帮兄弟社把化肥搬上岸就行了，但老队长却怕化肥遭雨淋，认为兄弟社增产和自己增产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因此突然临时改变主张，建议要连夜替兄弟社把化肥送回去，然后再赶到装粪码头去装粪^①。这

^① 上海郊县农村到装粪码头去装粪要按计划规定的时间去装。

个情节表现了老队长先人后己、胸怀全局的高尚风格。第三次是给兄弟社送肥回来,不料忽然传来大风消息,农船不能出港,老队长便以革命传统精神教育大海,一起开顶风船出港,胜利完成了装粪任务,表现了老队长不怕苦不怕累、敢于连续作战的顽强精神。

这三个情节不但都有利于表现人物的性格,而且环环紧扣,步步深入,使老队长一心为公、坚持原则、立足本队、胸怀全局、自觉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高大形象,不断闪耀出光彩。整篇小说的情节很简单,这三件事也是生活里常见的,看起来很普通,但由于作者抓住了“纲”和“线”,使不同思想觉悟的人,在这三个关键时刻产生不同反映,引起矛盾冲突,因此对表现人物性格起了很大的作用;而每次矛盾冲突的结果,又都在同一个“目标”下统一起来,使主题显得非常明确、集中。

但这篇小说也有缺点,使人看后还不是很满足,总感到人物的形象不够丰满。这主要是这三个情节虽然选择得比较理想,但却没有把它们充分开展,往往是一有矛盾,通过老队长的一番话语便把副队长的思想打通了,这样就没能使人物的思想性格在矛盾冲突中得到充分而深刻的揭示。因此有了典型的情节,还必须运用各种艺术手法,把英雄人物的形象鲜明而生动地表现出来。

二、运用各种艺术手法塑造人物形象

当主题已经确立,人物形象初步孕育形成之后,就应集中力量运用各种艺术手法多方面地刻划人物性格,塑造英雄形象。在小说中,当然也允许有作者的叙述甚至议论,但主要必须依靠艺术描写,从行动、语言、心理、肖象、环境等各方面来

表现人物的性格，以具体生动的形象和画面，让读者自己去感受主人公在想什么，做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做。

请看《征途》“真金不怕火”一节中烧荒跑火后一个打火护山林的场面：

俗话说：“荒火快似马，有风赛过龙。”当还剩最后二十米防火道没打出来的时候，三百米宽的火龙带着无法抵御的火浪，遮天盖地横滚过来。火焰把与火搏斗的人们的眉毛都燎了。梅英姿的短发和柳疆的小辫子象烤焦了的草一样在冒烟，只有狄兰头顶上扎着一块头巾，稍觉好些。

钟卫华见情况十分危急，大吼一声：“撤！”呼地冲了过去，顺手抓下自己头上的旧军帽，唰地扣在梅英姿头上。……

……………

丈多高的火苗子窜过来了，它伸着血红的长舌头，贪婪地舔着钟卫华和他的战友们的衣服、手和脸。这还不算，又呼呼地咆哮着直往山坡上的榛(zhēn针)柴棵子里钻。钟卫华一见火龙企图越境，火焰里他把钐(shàn善)刀一扔，抓起地上的棉袄扔给身旁光膀子的黑胡子社员，振臂高呼道：

“同志们，只要我们还活着，就不能叫大火上山。

为了保卫国家财产，冲啊！”

这一段文字不多，却从环境、行动、语言等各方面对人物性格作了鲜明的刻划。这里有环境描写，但不是为写景而写景，而是与人物的行动、语言紧扣在一起，为人物性格服务；写“烈火”，正是为了写“真金”。当大火遮天盖地滚过来时，钟卫华，

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在行动上有什么反映呢？他一方面大吼一声“撤”，叫战友们急往后撤，一方面自己却“呼地冲了过去”。这一吼、一冲，充分表现出钟卫华在危急中只顾别人不顾自己的高尚品质。及至猛火卷上山来，他更是除了拚死保卫祖国财产之外，什么也想不着了。“只要我们还活着，就不能叫大火上山……”一句话，就把他那英勇无畏的气概和崇高的内心世界展示出来了。作品在描写这场紧张的战斗中，还插入两个细节：钟卫华抓下自己的帽子扣在梅英姿头上和抓起地上的棉袄扔给光膀子的社员。这两个细节描写，不但表现了他对战友的关心，而且也表现了他在勇猛中有细心、在紧急中能镇静的特点。在整个一场与烈火的搏斗中，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慌乱，始终处于主动和主导地位，以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和行动，表现了他“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的共产主义光辉品质。

一个人的说话，行动，甚至一个极细微的动作，都是受他内心的思想感情支配的，因此写人物的语言、行动，是反映人物思想性格的很重要的艺术手段。塑造英雄形象要选择人物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的表现，特别是在斗争的风口浪尖上或关键时刻的表现。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的行动和语言，最能反映出他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反映出他的革命理想和战斗热情；而这些，正是英雄人物性格中最本质的东西。

塑造英雄形象，不但要着重刻划无产阶级英雄的本质特点，而且还要尽可能地注意到人物本身所独有的素质、风格、语气、神态等特点。让我们看看《小将》^①里的几个片断。电机厂的会议室里正在讨论一项重要的国防工程电机生产任

^① 见短篇小说集《小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务，这任务能否完成，关键在于线圈生产任务是否能提前完成，这使得生产组长老郑感到十分为难。这时他的徒弟小姜进来了。……当大家都在为难的时候，小姜激动地跟师傅说想用计算测量来改进生产线圈模子的办法，老郑不觉粗声粗气地问道：“计算就那么容易？”可小姜说：

师傅，我们不去碰它，它永远是个谜！

但老郑却担心新办法没把握，坚持要用老办法生产，这时

小姜听了一怔，转过脸来，睁大了眼睛望着师傅，好一会儿，只见她头一扭，说：“我要提！”

当一个老工程师嘲笑她，说这不是做玩具，是科学！小姜

她偏了偏头，大声说：“洋人没做过的事情，我们就不能做？！过去不敢想的，现在就不能闯？！”

这里的语言不多，但朴实，简练，极富有个性化，生动地表现了小姜那种敢想、敢干、大胆、泼辣的思想性格，描绘了她在师傅面前带有几分天真的稚气、却又敢于坚持真理的神情，同时把她对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老工程师的蔑视神态也表现出来了。

在《金光大道》^①中，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性格、语气、模样，不用说作为芳草地的社会主义中流砥柱的高大泉，和剥削成性的冯少怀及一心想“发家致富”的张金发等人的思想品质固然绝不相同，就是和爱憎分明、立场坚定的朱铁汉相比，两人的性格也颇不相同。

譬如同样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朱铁汉说：

要是从我思想上冒出一丁点儿不搞社会主义的芽子来，你不用开除我，就用这把板斧把我劈成八

^① 《金光大道》，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瓣，十六瓣儿！

但在高大泉看来，就是党员、积极分子，脑子里也会冒出坏芽子来；搞社会主义，一方面要改造所有制，一方面要改造自己的思想。他笑着说：

你知道吗？资本主义思想的根子是私有制，那芽子就是私有观念。……

我们今后的任务，就是挖私有制的根子，掰私有观念的芽子；一边往前闯，往前拚，一边挖根，掰芽，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就胜利了，我们的思想也进步了。

那么，怎么搞社会主义呢？朱铁汉在听高大泉介绍了燕山区的经验后，马上趁热打铁，编了个互助组名单，把全村贫雇农和进步中农，编成二十七组，又以老互助组为基础，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按照他的说法是：

有组有社，这叫众星捧月；用不着磨磨蹭蹭耽误时间，赶紧干农业社，这叫三步并成一步走，一步登天！

急得高大泉赶紧拦住他：“同志，先收起你这一步登天吧！”照高大泉看来，社会主义不能等，但也不能三步并成一步走，且听听他的议论吧：

你们想想，社会主义，这是从咱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搞过的事儿，怎么能够在炕上等着，盼着，它就哗啦一声来到呢？依我看，这跟开火车一样，得有轨，得有站，还得有煤有火，才能开起来；一站一站，呼隆呼隆猛跑，最后到了地方。它哪能一翻跟头就能到达目标呢？

咱们农村搞社会主义就得象开火车那样，分开段，又连成线，一站一站往前走。这轨，就是毛主席的指示；这站，就是各级的领导；车头是贫雇农；还要挂着一串车皮，那是中农和要搞社会主义的庄稼人！

从这些描写里，我们可看出，朱铁汉虽一心向往社会主义，但还只是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他的谈吐、举动，也明显地反映了他那特有的莽闯而热情的性格。而高大泉却比他成熟得多，他从汶河庄逃荒来此，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芳草地，他的苦难经历和见闻，比朱铁汉丰富得多，加上党的启发和教育，成长很快，能够自觉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来观察、分析、解决在革命实践中出现的各种复杂的问题。从他的谈吐里，可看出他对毛主席的“组织起来”的指示，对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关系，对革命的阶段和革命的发展的关系都有深刻的体会，他的理智沉着、深思远谋的特点和语言风格，是和他那独有的经历与感受分不开的。由此可见，要生动地刻划出英雄人物的个性，不仅要熟悉他们的声音姿态，更重要的还必须熟悉他们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境界，这样才能真正抓住能反映他们个性特点的东西。

塑造英雄人物形象，不但可通过人物自己的语言、行动来写，也可以通过旁人的眼睛嘴巴来反映，即从侧面来写。象在《征途》中，不同的人对钟卫华就有不同的看法。

潜伏特务张山把钟卫华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他总觉得这个青年人身上带有一股逼人的正气。就象带着武器的猎人，使嗅觉灵敏的野兽在距离很远的地方就有一种威胁的预感一样。

而老贫农关爷爷却称赞钟卫华是“好根苗，好根苗，一棵

赛一棵，一代强一代。有你们这些好后代在北大门扎根、接鞭、磨斧子，毛主席就放心了。小钟，你们四个青年加入了共产党，我的心哪，更托底啦。”

这里通过正反两种人物的不同反映，更加鲜明地突出了钟卫华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可爱形象。人与人之间总是以一定的社会关系相结合的，又是根据阶级的利害而产生爱或憎，颂扬或诽议。因此，通过周围人物的反映，也是表现英雄人物思想性格的好办法。而且这样不但可看出被反映人物的思想性格，也可看出反映者是何等样人。如上面的两段话，既刻划了钟卫华的高大形象，也写出了特务张山的阴暗心理，又写出了关爷爷这老一辈共产党人的深思远虑。

在小说中，也可以通过作者的叙述甚至议论来展示人物的性格。如《艳阳天》(第一卷)中，写预分方案公布出来后，肖长春看到人们那股高兴劲儿时的心理活动和思想境界：

肖长春站在欢乐的人圈外边看着。他在那鲜红的榜文上，看到的不是一个个名字，而是一个个挂着汗水的脸；看到的不是一九五七年的小麦分配数字，而是几年后满山的果树、牛羊，满地的水渠、拖拉机，满村的电灯……；看到的是更远的共产主义新农村！

肖长春站在人圈外边听着。他从那一片欢呼声里，听到的不仅是胜利的喜悦，也是战斗的呼声；听到的不仅是表扬，也是督促；听到东山坞的社员们和他们的子孙后代对党支部的要求，要求所有的人永远作硬骨头，干到底！

年轻的支部书记笑了。你看他笑的多好看，脸上象是开了一朵大红花。胜利的笑容是最美、最宝

贵的笑容，然而，它是经过烦恼的周折、艰苦的斗争以后才得到的！

这里作者满怀激情地描写了肖长春在胜利时的神情姿态，叙述了他的内心活动，在描写和叙述中，又以带着评论色彩的笔调总结了这胜利的来之不易。整段文章以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展示了人物的崇高的思想境界。使人们想象到，肖长春和芳草地的贫下中农是如何挥着汗一步步战斗过来的，而且一定会以硬骨头精神继续向共产主义迈进。

在小说中，有时为了交代情节或对人物作某些必要的介绍，作者的叙述也是不可省的，但是切不可作冗长而枯燥的叙述，一定要和生动的描绘结合起来，议论也必须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这样，各种手法综合运用，互相渗透，才能鲜明生动地将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表现出来。

总之，要能成功地塑造英雄形象，首先必须熟悉、了解英雄人物的性格。要想象得出他在怎样的情况下，必然会产生怎样的思想感情，会出现怎样的行动，会说出怎样的话来。然后各种艺术手法才能发挥作用。

从前面这些例子中，我们可看出各种艺术手法在实际运用中，常常是互相联系、交融在一起的。在一篇短篇小说里，也不一定全都用上，要根据具体情况，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使用哪种方法为好。但不论用哪些方法，怎样运用，总的目的都是为了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突出英雄人物的形象，表现主题思想，加强艺术效果，使作品有力地是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戏剧中的矛盾冲突

戏剧是在舞台上演给观众看的，人物、时间、场面要高度集中。戏剧表现人物的思想主要是通过人物的对话或唱词（舞剧除外），所以语言必须明确、精炼、口语化，要具有动作性，唱词还要大致押韵。初学写戏往往是从写小戏开始的。小戏是文艺战线上的轻骑兵，它常常通过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侧面或一个片断，迅速及时地反映我们火热的斗争生活。小戏剧本与大戏剧本相比较，篇幅较短，人物较少，故事情节比较单一，所以在写作上它就更要求人物、事件、场景和时间高度集中。但是小戏剧本与大戏剧本在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组织戏剧冲突等方面要求都是相同的。下面主要谈一谈剧本中有关戏剧冲突的问题。

戏剧冲突是戏剧反映生活的重要手段。什么叫做戏剧冲突呢？简单地说，就是戏剧中人物之间的矛盾斗争。一个戏总要有几个人物，多的有几十个人物，这些人物中有正面的、反面的、先进的、落后的，人物与人物之间产生着种种矛盾和斗争，通过矛盾斗争，先进人物的崇高思想品质得到发扬，反面人物的丑恶本质才能得到暴露，落后人物才能受到教育，发生转化。人物之间的矛盾斗争的产生、发展、激化和解决的整个过程，就形成戏剧的情节。一个戏离开戏剧冲突，人物就无法塑造，情节就无法展开，因此，写好戏剧冲突十分重要。下

面就从三个方面简略地谈谈这个问题。

第一，从生活中提炼戏剧冲突

戏剧冲突是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在戏剧中的集中反映，它既不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也不是生活中矛盾的机械翻版。戏剧冲突从现实生活中来，但又比生活中的矛盾更集中、更典型、更具有普遍意义。这就要求我们“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把“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

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是纷纭复杂的，有人与自然界的矛盾，也有人與人之间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中又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在今天是大量的，表现的形式又是多种多样的。在纷纭复杂的矛盾中，应紧紧抓住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和两种思想的矛盾、斗争，进行选择、加工、提炼和概括，使矛盾斗争典型化。

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中，始终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但是，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大肆兜售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拚命贩卖无冲突论，鼓吹什么写儿女情，家务事；写“纯粹”的人和自然的矛盾，搞所谓“生产戏”，这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在文艺上的表现。在当前的一些文艺创作中，也存在着无冲突论的倾向。有的作品不敢写阶级斗争，不敢揭示矛盾，往往以并非反映事物本质的“误会”“巧合”来结构矛盾；有的作品写了阶级斗争，但写不出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尖锐性，不敢激化矛盾斗争；有的作品不敢写两类矛盾的转化。要克服这种无冲突论的倾向，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文艺思

想,认真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宝贵经验,必须按照党的基本路线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矛盾,正确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深刻反映社会主义时期的伟大斗争。

例如,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写的是龙江大队堵江抗旱的斗争,从表面上看,堵江抗旱是一场人与自然的斗争,但是作者并没有停留在生活的表面,去写人与自然的矛盾斗争,而是以党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为指针,深刻地分析了在这场人与自然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正确地认识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关系,把堵江抗旱只是作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背景来写,从而为《龙江颂》安排了全局观念与私有观念,也就是共产主义风格与本位主义、个人主义这样一对主要矛盾。这对主要矛盾是由剧中的党支部书记江水英与大队长、党支部委员李志田之间的思想冲突来体现的。江水英和李志田的矛盾是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以这对主要矛盾为中心,剧中还写了以常富为代表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与以江水英为代表的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写了以黄国忠为代表的阶级敌人妄图破坏集体经济与以江水英为代表的广大社员群众坚决维护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矛盾。这两对矛盾在剧中居于次要地位,它是为主要矛盾服务的。通过江、常的矛盾揭示了李志田本位主义思想的社会基础,通过李、黄的矛盾说明李志田的本位主义、个人主义思想必将被阶级敌人所利用,成为阶级敌人的保护伞。《龙江颂》中江、李之间的主要矛盾冲突以及为这一主要矛盾服务的其他次要矛盾所组成的戏剧冲突是现实生活中各种矛盾加工、提炼、集中、概括的产物。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共产主义风格与本位主义的矛盾不仅存在

于农村,也存在于工厂企业,这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个普遍存在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又主要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所以《龙江颂》中江水英与李志田之间这对主要矛盾具有典型性,它揭示了生活的本质和规律。

小戏往往是通过生活中的一个侧面和片断,“以小见大”地反映生活的本质的,但是“以小见大”是有条件的,并不是说任何的“小”中都能见“大”,这就需把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通过矛盾的特殊性反映矛盾的普遍性。例如农村秋收时节,小学生在课余时间拣点“地脚”花生,本来是一种普通现象。但是小戏越剧《半篮花生》对这一普通的现象进行了分析、加工、提炼,赋予了它深刻的思想内容,提炼了典型的矛盾冲突。剧中的“地脚”花生根本就不是“地脚”货,而是摘帽地主王有财故意在浮土里藏下的花生,王有财唆使他的儿子约晓华去拣,是“妄图把贫下中农作为挡风墙”。通过这具有特殊内容的戏剧冲突,揭示了农村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普遍性。也就是以“半篮花生”之“小”,见了阶级斗争之“大”。由于在这“半篮花生”中有着阶级斗争,所以它才在一个亲亲热热的贫下中农的家庭里掀起了一场矛盾冲突。围绕着“半篮花生”所引起的这场风波,并不是一些家庭琐事中的小风波,而是事关大局、事关路线的大风波,也就是说这场劳动人民内部的思想斗争是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现实斗争联系在一起。通过这场典型化了的矛盾冲突,塑造了晓华爹这样一个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有高度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的英雄人物,生动地反映了贫下中农认真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武器解决具体矛盾的新气象。《半篮花生》用一根阶级斗争的线索把戏剧冲突贯

穿起来，通过摘帽地主王有财利用“地脚”挖社会主义“墙脚”这样一个特殊的矛盾，反映出农村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使剧本的主题思想更具有普遍意义。

可见，一个戏的矛盾冲突选得典型，就容易使它的主题思想揭示得深刻；反之，它的主题思想就不会深刻。比如有这样一个小戏，写的是一个中学毕业生的父母亲为了一副床板所引起的一场矛盾斗争。父亲是一个工厂的木工，他想用那副床板给女儿做一个箱子，送她下乡锻炼。母亲是一个退休工人，是里弄的党支部委员，她却想用这副床板给里弄小小班的图书室做一只放书的箱子，教育青少年一代。这个戏通过父母亲之间的矛盾冲突，歌颂了母亲关怀青少年一代成长的先进思想，批评了父亲只替自己女儿着想的错误思想。这个戏的矛盾冲突是缺乏典型意义的，虽然母亲看得远，思想境界确实比父亲要高，但是看了这个戏，会产生这样的疑问：父亲鼓励自己的女儿到乡下去锻炼，也没有错呀，关心自己子女的成长同关心青少年一代的成长难道是矛盾的吗？这类矛盾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也存在，但是并不是大量的，典型的，用它来写成一个戏就不够合适，起不到普遍的教育作用。

一个剧的戏剧冲突是否典型、是否深刻，决定着它的主题思想的深刻与否，所以写剧本必须十分注意戏剧冲突的提炼。而要在生活中提炼出具有典型意义的戏剧冲突，根本的问题是要深入生活，积极参加三大革命实践，用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去观察生活、分析矛盾，舍此是没有其他捷径可走的。

第二，以主要英雄人物为中心展开戏剧冲突

戏一定要写矛盾冲突，反对无冲突论，但是一般地提出写

矛盾冲突还不是无产阶级文艺的主张。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在写矛盾冲突的时候，必须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突出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在矛盾中的主导地位，以主要英雄人物为中心展开戏剧冲突。革命样板戏创作中的“三突出”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所有人物中要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要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就是说，在戏剧冲突中要让主要英雄人物始终处于支配地位，成为推动和解决矛盾的主导力量，其他各种矛盾都要围绕主要英雄人物展开。

在文艺创作中是否坚持“三突出”的原则是区别无产阶级文艺还是资产阶级文艺的一个原则问题。创作小戏也必须坚持“三突出”原则。目前创作的一些优秀的小戏，在学习和贯彻革命样板戏经验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我们学习小戏创作提供了经验。

在《拣煤渣》^①这出戏中，主要英雄人物李海洲在戏剧冲突中始终处于支配地位。他发现张小虎对“节煤的意义还未认清”，就对他进行节煤意义的教育，并用自己在旧社会拣煤渣的亲身经历说明：“旧社会逼我拣煤为活命，今日里为革命拣煤乐无穷。”当张小虎与高红梅在煤渣重新“返工”问题上发生激烈矛盾冲突的时候，是李海洲看出了张小虎有“浪费一点点无所谓”的思想，认为只有“把这‘一点点’的道理说明白，才能够提高认识是非清”。于是李海洲进一步从路线和世界观的高度对张小虎进行勤俭节约的教育。在李海洲的教育下，张小虎终于提高了认识，使矛盾冲突得到解决。

高红梅在剧中也是一个英雄人物，她同张小虎也有矛盾冲突，比如，在剧的开头就表现了高红梅与张小虎在对待拣煤

^① 载《文艺节目》第四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渣问题上的两种不同的思想境界,张小虎认为“小小煤渣作用有多大,拣来拣去拣不出个啥”,高红梅则认为“煤渣虽小作用大,千万不能小看它”。高红梅从煤渣中发现了一号炉的问题,而张小虎却完全不理解。在煤渣“返工”问题上,高、张两人又展开了一场冲突,矛盾闹得很尖锐。但所有这些都是为进一步展开李、张之间的矛盾冲突作铺垫的。高、张两人的矛盾虽然也很尖锐,但并没有解决张小虎的思想问题,这里高红梅只是把戏剧冲突推向了高潮,最后让李海洲在激烈的矛盾斗争中去解决张小虎的思想问题。这样,高红梅起到了“绿叶衬红花”的作用,突出了李海洲在解决矛盾中的主导地位,使李海洲的形象更为高大。如果剧中没有高红梅这个人物,而是让李海洲一个人围绕着张小虎的思想问题转,李海洲的英雄形象反而会被削弱,不会象现在这样生动、感人。

要让主要英雄人物成为解决矛盾的主导力量,还要正确处理好言论与行动之间的关系,在戏剧冲突中,要让主要英雄人物有强有力的行动。在有些戏中,光有英雄人物的豪言壮语,不见他们的英雄行动,而离开了他们的英雄行动,豪言壮语也就显得空洞无力。李海洲这个形象所以亲切感人,不仅因为他说了勤俭节约的深刻道理,更重要的是用他的行动证明了他的这番道理。他对待节煤工作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踏踏实实地干。他不但要攻克“煤老虎”,创造余热锅炉,而且也不放过煤渣中一点点未烧尽的“二煤”。他从张小虎拣过的煤渣中发现了思想问题,并用“三看煤渣”的具体行动去教育张小虎。由于有了这些具体行动,最后让李海洲从路线和世界观的高度去对张小虎进行勤俭节约的教育,并促使张小虎的转变,就显得自然可信。试想,如果李海洲没有这些感人的行

动,让他光用豪言壮语去教育张小虎,这又会怎样呢?有人写戏时往往不注意通过人物的行动来展开戏剧冲突,而喜欢让英雄人物空泛地发议论,以为豪言壮语越多,人物形象会越高大。其实,实际效果却并不如此。

第三,选择中心事件,组织戏剧冲突

戏剧必须通过一个贯串全篇始终的主要事件(即中心事件)来组织矛盾冲突、塑造人物形象、体现主题思想。革命戏剧中的中心事件既是具体的,又是典型地反映了事物本质的,它都和重大的政治斗争、社会斗争联系着,蕴藏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之间的基本冲突。

革命现代京剧《海港》的戏剧冲突是由三对矛盾组成的,主要的一对矛盾是方海珍与钱守维的矛盾。方海珍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要支援世界革命;钱守维代表一小撮阶级敌人,妄图破坏国际主义精神,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之间的斗争,是敌我性质的矛盾。围绕这个主要矛盾,还写了方海珍与赵震山之间的矛盾以及方海珍与韩小强之间的矛盾。赵震山不懂得实行国际主义和进行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而韩小强则不懂得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平凡的装卸工作之间的关系,不懂得崇高的理想和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关系。这几种矛盾通过一个“散包事件”而巧妙地组织起来了。在抢运援非稻种的过程中,阶级敌人钱守维出于他的阶级本能,利用了韩小强不安心装卸工作这一思想弱点,故意制造“散包事件”,以破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以方海珍为代表的码头工人,把抢运援非稻种和出国小麦看作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任务,是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具体表现,因此把一个散包看得“重如天”,立即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群

众连夜翻仓追查散包。但是装卸队长赵震山却看不到这个“散包事件”背后的阶级斗争，一心只顾“生产指标”、“利润指标”，以致起了掩护敌人的作用。在这个追查散包的过程中，使上述的三对矛盾不断发展和激化，最后揪出了钱守维，教育了韩小强，帮助了赵震山。而在这场斗争中，方海珍的高度的阶级斗争观念，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善于帮助和教育同志的思想品质得到了完美的表现。码头上的一个“散包”，看起来只是实际生活中的普通事件，但是由于作者没有停留在这普通事件的表面现象上，而是把它和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和风起云涌的世界革命联系起来，透过现象，抓住本质，从而成功地组织了戏剧冲突，塑造了英雄人物，表现了作品的主题。

我们写戏必须根据主题和人物形象的需要，写好中心事件，如果不注意中心事件的选择，那末戏剧冲突就组织不起来，人物形象也就不能突出。

戏剧冲突是戏剧反映生活的重要手段。只要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经常进行创作实践，就一定能够掌握它。让我们为革命写出好戏来，给社会主义的戏剧园地增添新的花朵！

谈 文 风

人们常常用到“文风”这个词。文风是指什么呢？

文风是指文章或讲话的作风。它是人们思想作风的反映，是学风和党风的表现形式。文风不是单纯的语言表达或写作技巧的问题。文风总是同一定的阶级和政党、同一定的政治路线相联系并为它服务的。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政党、不同的政治路线都有自己独特的文风。老八股是中国地主阶级的典型文风，洋八股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典型文风，党八股是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典型文风，而“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则是无产阶级的文风。

文风问题上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重要侧面。毛主席说过，我们在和党内机会主义路线进行斗争时，“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各种错误路线和反动思潮进行斗争时，从来也没有放松过对他们恶劣文风的批判。马克思批判拉萨尔，恩格斯批判杜林，列宁批判马赫，毛主席批判王明以及胡风反革命集团，都曾经对他们的丑恶文风，进行了尖锐的揭露。

叛徒、卖国贼林彪的丑恶文风，就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文风在党内的反映，是和王明之流的党八股一脉相承的臭东西。林彪一伙常用一些言不由衷、装腔作势的过头话，当作油彩脂粉

来掩饰其反革命的真面目。他们的文章，花言巧语，哗众取宠，空话连篇，文理不通，大搞片面性、绝对化，大搞形式主义，甚至连文章的开头和结尾也有一套不成文的固定公式。他们专门搞那些空空洞洞的文字游戏和概念的堆砌。什么“最、最、最”，什么“政治中的政治，灵魂中的灵魂，核心中的核心”，就是他们腐朽文风的“代表作”。他们把一些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词语当作“闪光”的“宝贝”，强行推销，使之泛滥成灾。他们到处叫卖的“一字经”，只是抓住孤零零的一些单字，离开了事物的本质，挤干了事物本来所具有的丰富、生动、深刻的阶级内容，这怎么能够反映波澜壮阔的三大革命斗争和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呢？林彪一伙用这种腐朽文风作为他们修正主义反动路线的表现形式，他们藏在这种文风背后，施放谣言和诡辩，妄图迷惑群众，“把人们的思想搞混”，以便实现他们的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野心。我们必须彻底批判林彪一伙腐朽的资产阶级文风，在斗争中大力发扬毛主席多年来倡导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文风。

革命的无产阶级文风，应当“尖锐、泼辣、鲜明”，“生动活泼新鲜有力”。这种文风的具体表现就是——文章应当具有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

准确性要求文章观点正确，材料真实可靠，观点和材料统一。一个人具有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写出符合客观实际、反映客观真理的好文章，如果他的立场、观点错了，即使他能妙笔生花，也只能写出一些表现错误思想、歌颂错误路线的毒草。真实可靠的材料是形成正确论点的基础，材料虚假，论点就不会正确。有时，材料的细微出入虽然并不影响整个结论的正确性，但也会使人对论据的可靠性发生怀疑，削弱

了文章的说服力。文章中那种弄虚作假、随意拔高、任意夸大的现象,是应该坚决反对的。有的文章,罗列现象,甲乙丙丁,开中药铺,没有分析,不出观点;有的文章脱离实际,只有干巴巴的几条筋,只有结论,没有论据;有的文章,“帽子”是套上去的,“例子”是挂上去的,观点和材料之间没有内在联系。这些都是不好的。写文章必须有材料,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并有明确的观点去统率这些材料。写作时掌握的材料应该丰富,但运用时只要拿出典型的,能够说明观点就行了。

准确性还要求文章合乎逻辑。做到概念明确,判断恰当,推理具有逻辑性。用词要确切,语言要避免模棱两可,前后矛盾,说理要有充足的理由,以理服人,注意事物之间内在的因果关系。写文章还要掌握唯物辩证法,看到客观事物是发展的、矛盾的、互相联系的,要避免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和绝对化。毛主席说:“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有人写文章,不留余地,爱作绝对的肯定或否定。这就违背了辩证法。

鲜明性要求文章政治态度鲜明。作者要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要旗帜鲜明,一目了然。人们喜欢读尖锐泼辣的文章,一是一,二是二,解决问题。有些文章,隐晦曲折,吞吞吐吐,扭扭捏捏,钝刀子割肉,回避了群众希望明确回答的问题,绕圈子,打迂回,读了,费时间,没收获。尖锐泼辣,旗帜鲜明,要建立在中肯分析的基础上;如果离开了中肯的分析,文章就没有说服力。

鲜明性还要求文章重点突出,能反映事物本质,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文章不要面面俱到,什么都谈到了,但什么也没

有谈透。鲜明性还要求标题醒目,结构谨严,脉络分明,语言明确而简洁。反对那种“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浮夸作风,反对言之无物的长文章。有人以为,文章越长越好,在长度上“你追我赶”,以“长”来表示自己写作态度“严肃认真”,以“长”来标榜自己体会“多”,收获“大”,质量“高”。这是形式主义的看法。文章的质量决定于内容,不决定于长短。写文章应该“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根据内容,“量体裁衣”。鲁迅先生的杂文大多是很短的,难道它质量不高、分析不深刻吗?

生动性要求文章能够体现朝气蓬勃、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一个革命者,坚信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必然胜利,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他写的文章一定是生动活泼、热情洋溢的。悲观失望、死气沉沉的人,写的文章必然是冰冷晦暗,毫无生气。朝气蓬勃、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是无产阶级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的反映。真正反映了群众实际斗争、具有深刻思想内容的文章,语言和形式就容易做到新鲜活泼;如果不反映热火朝天、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尽管词藻华丽,形式精美,也无补于事,反而显得华而不实,无病呻吟,令人讨厌。

生动性还要求语言新鲜、丰富、具体、形象,具有为工农兵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进行写作,要认真学习人民群众的语言,要注意工农兵的阅读欣赏习惯,要力戒公式化、概念化。有的青年同志读过一些作品,看过报纸上的一些文章,但是没有很好地消化吸收,而是盲目地模仿。人家文章开头用“东风劲吹红旗飘”,先谈谈“国内外形势”,或者由一首民谣引出新旧社会对比,在那特定的文章里,也许是很好的。如果不看场合,到处摹拟套用,就显得章法雷同,死板老套,没有新鲜感,缺乏创造性。有的人读过一些翻译小说,文

章里也沾染上了不少洋腔洋调。我们要避免生硬的欧化句式,避免用复杂的长句子。搞文艺创作的话,不宜有大段大段的景物描写和板滞冗长的心理刻画,故事情节要有头有尾,条理清楚,不要使人看了觉得“颠颠倒倒,没头没脑”。文章的语言和形式具有我们的民族特点,群众才会“喜闻”和“乐见”。

文风就是作者的世界观和思想作风在文章中的反映。因此,要发扬革命的文风必须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深入到实际斗争中去,向社会学习,向工农兵群众学习。在这个基础上,再学一点语言和写作知识。一个人具有无产阶级的远大的革命理想,坚定的革命立场,火热的革命激情以及科学的思想方法,那么,他写的文章,才能具有准确、鲜明、生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写作漫谈

作者 = 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写作漫谈》编

页数 = 159

SS号 =

DX号 =

出版日期 = 1975.05

出版社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书名
前言
目录

录

为革命拿起战斗的笔
根深才能叶茂
主题是文章的灵魂
一以当十
量体裁衣
标题的艺术
在繁杂中求条理
在条理中见周密
波澜起伏引人入胜
迈好第一步
最后的冲刺
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
语言要明确、简洁、生动
抓住本质击中要害
——大批判文章的写作
短小精悍一事一议
——小评论的写作
迅速及时报道先进
——小通讯的写作
总结经验宣传典型
——调查报告的写作
诗歌的构思和语言
散文的寓意和联想
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戏剧中的矛盾冲突
谈文风